

# 我亲历

● 张根生

## 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土改

从1946年到1953年春季,我亲历了毛泽东领导的全国三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共历时七、八年。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民族矛盾降为了次要矛盾,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坚持独裁专政发动内战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任务。从1946年“五四指示”开始,在老解放区一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土改。1947年9月,进一步实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土改复查,这是第二次或第二阶段土改。1950年冬季开始新解放区三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三)地区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部完成,这是第三次大规模土改。

### 执行“五四”指示动员农民

执行“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的土改主要是解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问题,准备国民党发动内战,发动农民起来,保田保家,发展壮大人民解放军。在政策上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贫雇农,开展反奸清算、打击恶霸的斗争,不动富农、不动地主其他财产,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照顾开明绅士和抗日军人家属,允许他们捐献土地。由于当时毛主席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为了不让国民党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我们党的身上,一方面政策很宽大,另一方面通知在公开报道时还是讲减租减息。由于形势需要,这是在解放区从上而下依靠政府、农会、群众组织实行的分田。

当时,我在河北省冀中区安平县任县委书记,直接参加了按照“一条批准,九条照顾”进行这次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给留下一份),使26739户贫雇农分到了人均3亩左右的土地,得到土地的人口大体上占总人口约65-70%,富农未动,中农不出不入。由于各种照顾,地主留下的土地稍多和好于贫雇农,没有没收地主阶级的房屋、牲畜等财产,这是不彻底的。还有就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进行诉苦运动,深入进行阶级教育。没有首先进行整党,很多党员对这场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少数人立场观点模糊,甚至发生包庇地主的错误。但是总的来说,这次土改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基本上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出兵出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大多数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阶级斗争观念。

当时大部分党员是在抗战中发展的,许多人入党动机就是打日本,不当亡国奴,对于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没有认识,对党的最低纲领即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在抗战胜利后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也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因此,即使这样平和的土地改革,也在党内引起了很大争论。

### 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土地平分

1947年9月,中央工委召开全国解放区的

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冀中各地委书记都去参加会议,回来立即作了传达。会议总的精神是反对右倾,纠正执行“五四指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部分。当时内战已经全面展开,人民民主革命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因而在土地法大纲中对政策作了重大修改。一开始就指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包括了半封建的富农的土地,而且提出了“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对富裕中农的土地都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所以群众称其为土地平分运动。还规定了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没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这是彻底地消灭地主、富农阶级的政策,使贫雇农多分得了一些土地、房屋、粮食、耕畜、农具和其他财产,生活有了较明显改善。但从事后来看,抽出富裕中农的土地是不必要的,没估计到分田后贫农也会产生怕露富的顾虑,当时的富裕中农是自己劳动、经营而生产较好的,是征收公粮的重要部分,他们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还有不少子女参加人民解放军。

在政策上产生“左”的偏差比较严重的则是土地会议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不纯问题估计过分,因而提出另外组织贫农团,作为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这就撇开了坚持八年抗战的基层党组织,在县、区干部中又实行唯成分论,排斥知识分子,对基层干部还提出了搬石头的口号,引起了很大的不满,造成一些地方的严重混乱。

在1946年10月,我作为县委书记,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改整党会议。会议共开了一个月,先进行整党,每个人都要查三代,定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批判右倾思想,后半段学习土地法大纲。最后作出部署,要求县、区干部组织成工作团,进村开三个会:一个是群众大会,宣布土改要一切权力归贫农团;一个是支部党员会,宣布支部停止活动,由贫农团审查谁够条件和不够条件;一个是民兵会,宣布民兵交出枪支一律集中保管,防止坏人进行破坏。这样一来,不少村庄开始土改时,把原有党员干部当成了斗争对象。会议上本来叫到会者学习了1933年划分阶级文件,但闭会时宣布收回不再下发,避免束缚

群众思想,一律由贫农团决定阶级成分,贫农团要划什么成分就划什么成分,由于没有政策规定,必然出现偏差。1948年1月至5月,毛泽东同志连续发出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和整党中“左”的错误,局面才得以扭转过来。实践证明:有条件搞土改的解放区中,绝大多数党的组织是纯洁、可靠的。

1947年秋季,我带20多名县、区干部在三个行政村,按照中央通报和土地会议精神搞了土改复查。先从整顿党支部入手,着重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明确阶级观点,也从组织上清除了个别不纯分子。然后依靠党支部、村政权,改选农民协会,由农会组织进行土改复查,普遍进行了谁养活谁和谁剥削谁的诉苦,开斗争会,没收地主、富农应被没收的财产,没有另搞贫农团,没有抽分富裕中农的土地,事后证明这是成功的。

我在参加土地会议回来后就调到平津附近的永清县任县委书记,这里在我到达前也按相同方法进行了整党,并在50多个村庄开始土改。由于这里是游击根据地,还不稳定,下乡不久国民党就大举进攻,幸亏没有停止支部活动和收缴民兵的枪,但还是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几十名县、区、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被杀害。经过县委研究讨论,在这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搞土改是不成功的。到1948年2月,县委就宣布停止土地改革,全力开展武装斗争,巩固我解放区。

##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1949年3月我南下到中南局研究室工作,后去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任调查研究处长,全力投入到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

1949年11月下旬,我随杜润生同志去北京参加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的会议,研究新区土地改革的部署、政策和起草全国土地改革法问题。会上我第一次直接听到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此时,全国已经打败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为完成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而在政策上中央主张适当放宽,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区别对待地主、重点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基本不动富农经营的土地的政策。

对富农的出租土地,中南局邓子恢同志坚持仍应征收,以使贫农多得一点土地。华东局则主张完全不动富农土地,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中央很注意听取各大区的意见,最后土地改革法上,还是写上了一般不动富农出租土地,但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也可以征收富农出租土地。

中南局对新区土改是十分重视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鉴于全国革命即将胜利,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这对全国来说是正确的。中南地区当时只有河南省有部分老区,其余都是新区,没有进行土改,上面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下面政权仍是地主阶级掌握的,因而提出了在一个时期如几年内,在占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区还应该先抓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得到土地,改造基层政权,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城市工业发展解决原料和市场。所以,要先重点抓农村工作,然后才能真正把重心转到城市。党中央批准了中南局报告并转发各大区。1950年7月1日武汉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报告会上,我听了中南局领导人对此作的论述,事后来看这是正确的。

还有一件事,中南局提出新区土地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杜润生同志从新解放区实际情况出发,建议土地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第二阶段再划阶级,分配土地,得到中央的迅速批准,并在全国执行(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1951年2月7日)。叶剑英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广东土地改革大都是这样进行的。

1950年冬,中南局派我带五六百人的中南机关干部到广东曲江县帮助进行土改。1951年5月结束时,叶剑英同志留我在广东工作,分配我到粤北韶关地区,先后任地委、区党委副书记,主要负责指导全区土地改革,一直到1953年春季完成了19个县市、4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

南方新解放地区按土地法进行了土地改革。这里绝大多数地区原来没有党组织,所以没有整党问题,但土改工作队大部分是新吸收的青年学生,没搞过土改。因此我们采取农闲时下乡发动群众,农忙时集中整顿工作队的办法,主要是明确阶级观点,学习政策,站稳立场,坚决依靠贫雇农。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房屋(按人口留下一份)、耕牛、农具、粮食,没有专挖浮财,但在减租退押中实际动了地主部分财产;保留富农经济,只征收其出租土地,其他财产不动;完全不动中农、小土地出租者,严格保护城镇工商业。南方与北方不同的是:北方地主户数较少,占有土地多,富农户数多,占有土地较少。南方地主户数较多,富农户数少,占有土地都比较少。北方地主雇工经营土地的比较多,富农出租很少;南方地主出租土地给佃农,自己不经营的多。富农出租部分

## 中央關於土地問題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党内文件發至县委及团级为止)

根据各地最近来送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新解放区,有广大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解决着手土地问题。有些地方运动的结果,甚至实现了平均土地,所有的人(地主在内)都得了三亩土地。另一方面,一部分没好清算,老霸地主的逃跑,到城市中,则大量解放区的群众运动。有些中间人士,则发生怀疑。党内亦有少数人感觉群众运动过火。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

田者较多,有些占到其耕地的20%左右。北方没有公偿田,南方公偿田占相当大比重,有些地方占到总土地面积20—30%。南方新区的土地改革,接受了前两次土改的经验教训,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既深入发动了广大农民,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又比较正确地执行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党的政策,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消灭封建的任务。

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曾经指出:

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应由省委、地委,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手里,那就好了。

根据这个精神来评价南方新区包括广东全省土地改革,可以说是比历次土地改革要好一些,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又较好地执行了政策,没有出大的偏差。

### 土地改革的意义

一、土地改革是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一项基本任务。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导致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这就决定了中国是处于民主革命阶段。革命的目标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就是要推翻的三座大山。在全国胜利后,首先实行和完成土地改革,就是因为封建土地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阻碍,它不但是发展农业,更是发展工业必须要改革的。所以土改是最大的解放生产力。亿万农民得到解放,才能给国家经济建设开辟道路,创造发展条件,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实

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土地改革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6年7月以前,人民解放军兵力为12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430万人,显然国民党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占很大优势,所以敢于挑起内战,妄图消灭我解放区。

党中央因此把土地改革作为解放区的最重要任务,使一亿农民得到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迅速掀起保家保田参军入伍高潮。到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扩大到了249万人,这主要是土地改革中广大农民踊跃参军的结果。

就以我工作的安平县来说,只有17万人口,在抗日战争中就有8689人参军入伍,牺牲的达2269人。1946年下半年执行“五四指示”,土改中有占65—70%农户,即贫雇农和下中农分到了土地。这一年12月半个月就有1804人报名参军,其中共产党员530人,县、区、村干部508人,从成分来看贫下中农就占有1787人,占99.1%。经过检查体格和年龄,劝回去390人,合格者1414人,编为安平县农民保家独立团,1947年1月编入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原为晋察冀三纵八旅),不久就参加了青沧交战斗和青风店战役,全部消灭国民党新三军。

三、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地主阶级人口只有6%左右,土地占有达40%,另有公偿田10—20%为其操纵。南方新区地主大部分采取出租剥削方式,极少进行投资修建农田水利,也不推广新的科学技术,单位面积产量很低,亩产稻谷只有一二百斤。富农经济不发达,其所有的土地也有五分之一左右是出租经营。土地改革之后,贫雇农都分得了低于富农、中农数量的土地,稍高或等于地主人均所有的土地。过去土地种植者与所有权分离,年收成中一般要有半数交地租,因而贫苦农民无力、也不愿投资建设,这是对生产力最大束缚。

土改后广大贫下中农耕种的田地是自己所有了,因而积极性空前提高,大多数农户都添农具、买耕牛、购化肥和养猪积肥,愿意学习推广新技术,特别是采用高产优质良种,政府对困难户还给予帮助,所以农业生产都有迅速发展。到1952年全国和广东省都超过了历史(1936)年最高产量,以后更兴起了水利建设高潮。虽然也

出现过缺点，甚至有个别失败的工程，但总的说，极大提高了灌溉、防洪、排涝的能力，提高了生产力，这对以后开拓工业品市场、为工业积累资金有重要意义。

四、在农村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促进了社会的变



革。刚解放的新区农村基层政权，基本上仍是地主恶霸、豪绅、宗法势力控制，与土匪勾结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如果只是依法分田，根本无法改变，这与老解放区是不同的。老区都建立了党组织和村政权，又经过了八年抗战的考验锻炼，只要整好党，就可以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土改斗争。新区就必须经过深入贫雇农，扎根串连，结合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组织起以贫雇农为骨干的阶级队伍，建立农民协会，领导进行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在此基础上发展新党员，建立党支部和村政权组织，这就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从根本上打掉了封建势力的统治。经过诉苦运动，算剥削账，开展究竟谁养活谁的思想教育，提高了贫雇农的阶级觉悟，这是对旧的封建宗法思想极大的冲击，对于农村社会变革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动群众，基层党组织和村政权、民兵、治保组织的建立，是巩固边防的重要建设。在1962年台湾国民党妄图利用我们暂时困难，派遣了十几股反动武装，在山区空投或秘密在沿海登陆，结果无一漏网，全部被歼灭活捉，这充分说明沿海地区和深山区，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天罗地网。

土地改革是一场四亿多农民参加的最大社

会变革，它不仅是从上而下地依靠政府法令，而且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这是史无前例的。土改必然会产生一些缺点、错误和偏差，尤其在政策的掌握上，往往是纠右必出“左”，纠“左”又出现束手束脚，所以就必须严格掌握运动的规律，正确进行指导。我们犯过右的错误，特别在形势和任务发生根本转折时，如贯彻“五四指示”时，一度发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也曾经出现过“左”的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如实行土地法大纲初期。但是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中，党中央总结了历次土改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适当调整了政策，更有利于团结多数的统一战线，依靠政府法令，支持农民，放手发动群众，避免了出现大的偏差。

千百年来土地一直掌握在农村少数人手里，他们用土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盘剥。土改是天翻地覆的壮举，实现了先贤们“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命运，满足了广大农民世代对土地的梦想和渴望，他们身上爆发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他们不仅做了土地的主人，精神世界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胜利的殊勋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责任编辑 吴思）

# “五四”民主的新特征

● 王法周

“五四”堪称是一个民主时代，民主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五四之前，民主基本上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思想专利。五四时期，专制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民主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广大学生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富有朝气与激情的宣传，更使五四民主主义思潮滚滚奔涌，一浪高过一浪。“五四”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前，对“五四”民主启蒙思想进行回顾，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 共和制度——“五四”民主的价值目标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在饱含屈辱中度过了自己漫长的风雨历程。因此，把中国建成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现代国家，是整个近代中国人的梦想。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和民初共和政治的尝试，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已在潜滋暗长，自由、人权、平等思想已为有识之士所认同。但是，民国的建立，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袁氏死去数年之后，北京政府依然是只能勉强维持假共和的局面，国家在名义上已经变为共和，但是，执政的人物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人物，执政的思想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脑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样式。（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五四时期，受西方近代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其主要目标就是要以科学与民主思想武装国人的头脑，使中国人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新国民，从而

为真正的共和制度奠立一个不拔之基。

这种认识基于“五四”民主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对中国民性的仔细观察。鲁迅把民初的现状描摹为密不透风漆黑一团的铁屋，他看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即生活在这铁屋中的国人们却是麻木的，令人绝望的，“是从昏睡而入死亡，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在很多作品中，描写了国民的愚昧、无知与麻木不仁，痛感专制思想长期独尊，化行天下，相沿成习，成为铸造国民性格的模具，造就了一个一个“死性”的国民。这一说法可以代表“五四”进步思想家对国民精神状态的基本判断。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开篇就揭出了国人少年老成、年壮而衰等“陈腐朽败”之性，痛苦地认识到社会上充满的是“窒息之绝望”的空气。他称这种民性是“行将就木走向死亡”的民性，这与鲁迅的说法如出一辙。显然，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国民的陈腐思想正是假共和与帝制复辟的心理基础。1917年4月，陈独秀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时又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实在在地填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着君主专制臭味。随后陈氏感叹地说，我们国民“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毫不掩饰他对“中华民国的政治人心”的深深忧虑。（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胡适也正是看到了家庭、社会对个人身心的严重摧残，因有感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写了《易卜生主义》等文，流露出对绝大多数人的迷信与暗昧的深切痛心。自创刊起《新青年》杂志即相继推出一系列的文章，对中国的民族性

格进行分析,汪叔潜、高一涵、高语罕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从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中,照见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弊端,以及中国民族性的阴暗面:懒惰、盲从、不思进取、毫无主见、死气沉沉……高语罕指出:“海通至今数十年矣,危亡至今,亦云极矣。而吾国人犹昏昏若不知有国家灭亡之虑。”并称这种昏惰之性为“吾祖宗相传之心理”,是中国一切问题之根本。(高语罕《青年之敌》)“五四”民主主义者纷纷揭露专制思想与宗法制度对国人的严重束缚,深望国人们能从暗昧中觉醒。显然,他们认识到,国民的愚昧思想与麻木的生存状态正是专制政治生存的社会土壤,帝制复辟也根因于此。

与此相应,共和制度必然要求国民具有与之协适的新精神。经过对民初共和失败的痛彻反思,民主思想家认识到,民国的建立未使中国实现真正共和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共和只是少数精英和政党的主张,而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而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否则“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的自觉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真正的共和立宪,完全取决于多数国民的觉悟。在《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与主要撰稿人中,高一涵是对民主理论进行过较有系统研究的少数人之一。高氏提出了与陈独秀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他认为“政治实质之变更,在国民多数心理所趋,不在政治之形式。”“立国精神,端在人民心理”“共和国国立国之精神”看作实现共和的根本所在。(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如何改变国民的愚昧思想与麻木的生存状态呢?或者说,如

何簇新国民的精神呢?新思想家认为,只有把专制主义思想从国民的心理中彻底铲除出来,代之以自由、平等、民主等新观念。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敬告青年》)陈氏认为,未来的国民是力排“陈腐朽败”的空气,不为旧社会“菌毒所传染”的新国民;是新鲜活泼而富有生气,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个性而又具有世界的胸怀、合乎科学理性的现代国民。这六条标准的中心就是“民主”与“科学”。新思想家们都一致地把宣传、阐发民主思想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们认为,只有让民主思想在国民心理中生根,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这一根本性的认识,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从大中学教师到学生,相当一批新知识、新思想的接受者都聚集到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下。

## 科学理性——“五四” 民主的学理依据

科学与民主作为提升国民现代素质的主要价值标准,自然也是以思想启蒙为特征的新文化



“五四”运动中学生在街头演讲

运动的主要内容。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宣言:“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指出,民主与科学之于启蒙运动,其密切有不可分割之牢固,中国要想从落后的封建蒙昧时代进入现代文明,就要靠科学与人权。此后近十年时间中,民主和科学作为国民启蒙的两大旗帜,一直是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主要目标。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风靡全国,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它激动、奔走、呐喊。

“五四”批判蒙昧主义,与批判专制主义基本上是并肩前行的。除了王星拱、任鸿隽、周建人等一批以宣传科学主义自任的作家之外,相当一批民主思想家对科学理性也都有自觉的追求。即如对旧传统批判最为激烈的“老革命家”陈独秀,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性自觉意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即揭出科学的价值标准,以后又进而提出“事事求诸实证”的科学原则,指出不论是祖宗遗训、圣贤垂教,还是政府所提倡、社会所崇尚,凡是“不切实用者”,虽然是“金玉圭璋”,都是“一文不值”的“虚文”,一切都需经事实的验证,对一切事物都要持一种科学实证的“决疑”的态度,认为“对科学之信仰”,将是人类“幸福之正途”。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发表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要坚决拥护“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先生,他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及其他民主思想家认为,专制与蒙昧是一奶同胞,往往相伴而生,相依而存;而民主与科学也如一对战友,并肩作战则无往而不胜。提倡民主必然反对专制,提倡科学理性必然清除蒙昧。陈独秀树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标志着启蒙运动不仅获得了价值层面上的具体目标,也同时获得了具体的操作手段,这就是经由教育等方式向国人灌输科学知识,以现代民主思想与科学理念为武器,取代国民心理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了《实验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文章,对民主和科学理念作了相当深入的阐述。胡适指出,

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使科学的基本观念发生了重要变迁,它首先体现在科学家对于科学规律的“态度的变迁”,这就是:世上不存在“现成的”、“永远完全的”、恒久不变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待证的假设。(胡适《实验主义》)与此相应,胡适又把科学真理称为过河的“摆渡”与婚娶的“媒婆”,认为真理是过去走到现在,并从现在走向未来的桥梁,是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整修拓宽加固的桥梁。胡适指出,新文化运动或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实验主义则是教人们用自己的智识去怀疑、去判断。评判的态度不只适用于对传统的批判,也适用于当前的任何事物,不论是传统的儒学标准,还是现在的流行观念,都要接受理性的评判。总之,对于旧有的及现行的一切,如旧礼教、旧文学及政府与财产制度等等,都需进行价值的重新认定,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此说得到了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只要人人养成独立判断的习惯,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人们势必不再为成见蒙蔽。在他们看来,养成“智能的个性”,凡事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运用自己的思想力,有意识地去独立思考,独立观察,独立判断,这显然是破除蒙昧的良方。

按照这种真理观,原先的科学律例与“实在”的作用“不相符合,就需要拿下来换掉它”;“旧国粹”与现实需要不相符合,也要拿下来换掉它;以少数人的意志加之于广大民众的头上,最不合人类理性精神,也需要拿下来换掉它。正如鲁迅描写的死一样沉寂的国民,中国只有蒙昧与思想专制的传统,而没有近代理性自由的传统,中国人还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中国人所亟需的是随时有一种“存疑的态度”,凡事先问一个“为什么”。只要国民们人人学会逐渐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自不容专制势力对个人权利的四处侵吞。可见,运用理性是养成自治能力、实现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在胡适、陶孟和等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民主与科学息息相通,健全的民主方式必然符合科学的思想程序,民主是建立在生活经验之上不断调整完善其操作,而永远指向未来的不间断的过程。民主是一种生活方

式,它遵守着科学的精神和法则,说到底是科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

这同时就在民主与科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二者建立了一个有机的联系,在价值与方法上使民主与科学成为一种精神的统一体。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说法影响颇大,很能代表新文化主流知识分子的观点,即使在青年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北大学生罗家伦所说,个人主义观念流行,思想自由之风劲吹,与科学“求真的旨趣”、“试验的手段”有着莫大的关联。据记载,未受此一观点影响的北大学生“鲜为少见”。

有一点可以肯定:世上没有永远一成不变的真理,它对于克服专制主义的一元论价值观无疑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这种真理观同时赋予“五四”民主思想以学理性,为中国现代自由民主思想造就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平台。

## “人”的发现——“五四”民主的独特贡献

不言而喻,启蒙运动的顺利开展与共和制度的真正实现,都有赖于国民个人现代素质的提高,其落脚点还在组成国家的个人身上。但是,通过比较研究,“五四”新思想家们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容乐观的事实。在西方先进国家,个人权利已经得到基本的保障,人们得享平等自由的生活。西洋民族的一切,诸如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等,都只不过是“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平等而已”,这与中国历史与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个人权利与自由却从没有丝毫保障。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一直湮没于国家至上的观念之中,“率天之士,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对包括人们的生命财产及思想感情在内的一切东西,从来都是予取予求的,国人从不知个人权利为何物,一直处于黑暗的奴役状态而不自知。对此,“五四”民主主义者写了大量的介绍中西民族生活状况的文章,企图通过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国人意识到自己非人的处境,起而追求“人”的生活。

由此出发,“五四”民主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张扬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

观念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在思想界、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对广大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个人主义思想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半年以后,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个人主义开始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价值标准。周作人、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都强调把“个性解放”与“自我表现”结合起来,以“自我”为价值准星,蔑视一切权威与偶像,把18世纪以来的西方个人主义,诸如卢梭、易卜生、尼采等人的自由意识送给了中国民众,“个性解放”蔚成时代之风气。正如鲁迅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草鞋脚 小引》《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新文学运动极大地张扬了个人价值与个性自由的思想,其影响之深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五四”运动爆发后,个人主义借众多的刊物与社团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广大学生自觉地纷纷接受了个人平等与个性自由的观念,青年学生成为传播个人主义观念的生力军。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迅即为新观念的集结地,个人主义观念经由这些地区继续向全国各地传播。学校师生之间在互相砥砺,个性解放、个人权利观念很快激扬起来,个人主义观念与“自治”、“解放”、“改造”的社会潮流相汇,呈现出浪漫的特征,对一批青年的个人生活与群体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青年学生还走出家庭,追求婚姻自主,力争女权运动等,以切身的行动为个性解放运动推波助澜,这一群体行为对以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青年们为了恋爱自由而不惜与家庭决裂的故事,成为二三十年代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些作品所以能赚取读者们一把一把的眼泪,正在于它再现了作者们当时曲折而感人的经历。青年学生对生命意志的顽强追求,是“人”的被发现的时代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他们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民主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人”的发现。在儒家宗法思想与宗法制度长期统治之下,中国从来只有“民”,而没有个人,“只承认人民是民,不承认人民是人。”(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民的观念在我国自古已有之,个人则一直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代名

词。由于专制主义思想的长期浸淫,中国传统特别忌讳个人的字眼,公私之分、义利之辨成为国人严守的道德疆界,在中国树立个人主义观念是一件相当困难之事。个人的发现在中国只是五四时期始有之事。

“五四”民主思想的发展意味着个人的被发现,此说并不过分。与“五四”之前的中国思想家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五四”之前,康、梁立宪派与孙中山革命派都曾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思想。从1901年开始,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卢梭学案》、《新民说》等一系列文字,向国人大力宣介天赋人权论和主权在民的思想。约在同时及稍后几年,严复通过《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法意》等译著,系统介绍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法律和道德观,其中涉及到人的权利问题。梁、严等人对唤醒国民的权利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五四”之前的民主先觉分子强调的民权是以实现国家权利为最高目的的。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为了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强盛,号召人民起来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其最高目标是国家的自由权利。他们所说的“自由”也主要是社会团体的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有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之称的严复也认为,“小己自由,非今日中国之所急”,只有“国群自由”即国家与群体的自由才是当今所亟需。孙中山甚至强调,为了国家的自由,“要大家牺牲自由”。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都把实现个人权利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手段,把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看作是比个人自由更高一级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民权,主要是讲人民的共同权利,是人民大众的公权而非个人的私权,从根本上还远不是个人权利问题。

与梁启超、严复等人不同,“五四”民主主义者极力张扬的正是个人权利与责任意识,他们从法理上赋予个人私权以积极的意义。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陈独秀等人即打出了个人权利的旗帜。在《新青年》一至四卷数十篇文章中,陈独秀、高一涵、胡适、李大钊等人或从权利思想,或从功利主义思想,或从国家宪政民主制度的实现等角度,对个性自由、平等、民主、财产自由、意志

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等各方面的个人权利进行阐述与申论,号召青年们积极争取个人的权利,自觉提升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个人基本素质。陈独秀还明确提出:“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新时代价值标准,胡适强调,“智能的个性”以科学理性充实个人的生命,蔡元培、蒋梦麟等极力倡导“个人本位”或个性教育为中心的新教育思想,都企图在价值层面上簇新国人的思想观念。“五四”民主思想家强调个性自由,强调个人价值与尊严,主张个人要享有独立的权利,个人不依附任何其他个人与势力,在任何时候个人都享有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所强调的,正是每个人作为个体所拥有的权利,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个人权利的诉求。

### 自治团体——“五四” 民主的社会载体

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力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开展。五四前夕,部分学生已开始关心社会改造问题(《罗家伦答易君左信》)。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投入到团体自治的洪流之中,组织学生团体,推行自治。(五四时期到底有多少社团,现在已难以估计。据统计,无政府主义的团体组织在当时有110多个。全国各类团体的总数及参加团体的总人数,将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时,青年学生已经对北京政府的腐朽政治放弃了希望,开始走自下而上的革新之路,把革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基层的团体之上,希望通过团体自治来达到改造社会与国家的目的,以团体自治来继续寄托民主主义理想。学生团体作为“五四”社团的主体,成为“五四”之后开展民主运动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反过来又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学生社团首先是在北京、天津、上海等民主观念最集中的地方建立起来的,而北京大学及相当一部分大、中学校的学校自治又成为培育团体自治的肥沃土壤。北大于“五四”之前即相继组织建立了评议会、教授会、教务处、行政会议等机构,通过这些机构的设置,北大实现了立法与行

政的权力分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五四”之后，北大体制成为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竞相效仿的新模式，各校之内弥漫着浓厚的自治空气。

在这种背景中，众多的学生社团应运而生，并纷纷以民主原则而组建自己的团体。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例，该会1920年制定的《少年中国学会规约》规定：学会机关分为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评议部对大会负责，评议员数额由全体大会讨论决定；评议部有议决及监督全会会务权、议案提议权、审查预算权。规定评议部议事采用多数制民主决策原则，以评议员超过半数同意才能决定。规定执行部执行学会对内对外一切事务。所有主要干事都从会员无记名投票中选举产生。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规非常详细地规定了评议部、执行部、会员大会组织条例、议事程序及选举办法，具体地体现了民主评议与多数决策原则。其中，评议部相当于议会性质，执行部类似于行政职能部门，而会员大会则保障全体会员均具有有效的参与决策的权力，这又准确地体现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其他多数学生社团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用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模式，其中，不少团体的组织条例虽较为简明，但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民主原则。相当一部分社团对选举问题十分重视，并表现出多数决策与自由进出会的风气。

学生团体之外，其他社会团体也多依民主原则而建立，多数团体的成员都能比较自觉地遵循规定的民主程序。各社团都充满着浓厚的自治空气，团体成员自己管理自己，同时也管理团体，这在很大程度上训练了团体成员的民主作风，这在国家处于不正常的政治现状中是难能可贵的。

一方面，团体自治是“五四”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团体自治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弘扬了民主思想与精神。众多团体中，不少团体都有自己的社刊。据估计，仅1919年之中，至少就出了400种白话报刊。又估计，1917年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多种。甚至如浙江萧山、广东海丰等一些县区也出现了白话报刊。这些报刊大部分是学生或社会团体举办的，不少刊物明确地追求以“自由的和平等的生活”为办刊宗旨，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无孔不入，连偏

僻的地方如海丰，也被他流入了”。（《新海丰发刊词》）总体上讲，这些白话报刊拥有非常广大的读者群，通过这些刊物，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理性等新观念真称得上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除了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不少团体还组织讲演团，“到民间去”，向广大民众宣传科学、民主精神，由于当时团体数量很大，人数众多，其影响往往及于全国各地。

可以说，众多的自治团体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五四”称之为一个“民主的时代”。到了1919年前后，民主已彻底摆脱了非法的地位，并在观念领域逐渐取得了主流的地位。

## 权力真空——“五四” 民主的历史缝隙

“五四”时期，北京政府在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中国在形式上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各地大小军阀派系林立，相互对峙，实际上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执政期间，政治腐败，生计无能，加之武人干政，政客弄权，政府频频更换，经常处于极端无序之状态，实际上沦为军阀专制的工具。各派与各地军阀之间互相牵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其他派系军阀之上，为了争夺地盘及其它利益，相互攻伐，大小战争不断，而对舆论阵地经常无暇多顾。这种现实政治局面对“五四”民主思想具有重要影响：第一，军阀之间的派系争斗的结果，耗费了历届政府的主要精力，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些权力真空，使民主思想有了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民主思想得以在百家自由争鸣中得以光大、得到广泛的传播。第二，北京政府既没有条件实行民主宪政，新知识分子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政府的信任，对宪政实践问题考虑较少，而把主要思想集中到了民主的观念层次上，或者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民主、自由、平等进行宣传与阐发。第三，民主既然失去了政治实践的机会，心有不甘的青年学生则自下而上，采取以团体自治的形式进行具有实践意义的民主政治尝试。

（责任编辑 庄建平）

# 胡耀邦诚待起义将领裴昌会

● 廖伯康

裴昌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抗战胜利后又担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于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率领第七兵团宣布起义。我方负责联系起义的是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在裴昌会宣布起义的第二天，胡耀邦即到四川德阳和裴昌会见面，并作了一次坦诚的交谈。自此以后，在长达40年的交往中，虽历经风风雨雨，他们始终坦诚相待，信义相守。

1950年8月起义部队整编完毕后，裴昌会向接见他的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提出，对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感到厌倦，希望能到地方工作。刘伯承说：“你和胡耀邦不是很熟悉吗？那就到川北行署去工作吧！”那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军区政委和川北行署主任。裴昌会则去担任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一直到1952年川北行署撤销。在共事两年的时间里，他和耀邦同住一个小院，同在一个食堂用餐，裴老念念不忘的是耀邦对他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放心，有职有权；工作中出了差错，又以领导者身份主动承担责任；生活上则充分照顾，亲自过问，关怀备至。

1983年12月26日，耀邦同志来重庆视察工作，我当时在重庆市委任常务副书记。一天中午，耀邦同志要市委办公厅给他准备一辆能坐六、七个人的小面包车，说是去看望他的老朋友、爱国起义将领裴昌会，并说此事不要告诉廖伯康，以免影响他的工作。临走时，耀邦同志想带点礼物，于是他把摆在自己房中和随行工作人员房中的脐橙收集在一起，带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裴昌会。耀邦准备上车时，我正好赶上。耀邦说：“你忙你的工作，我自己去看望裴老。”我说：“如果我不去，司机连裴老住的地点、门牌号数都不清楚。”耀邦说：“那你就带我们去吧！”我们一行数人，直奔两路口裴老住地，敲门无人应，喊叫也无人答。等了一些时候，才有人来开门。进屋见裴老生病卧床，正披着棉被从床上坐起来。耀邦一手提着脐橙，一边风趣地对裴老的孙女裴丽珍说：“这些东西是给病人的，你们不要把脐橙吃了呀！”耀邦和裴老互致问候，亲密摆谈了一个多小时。耀邦回头对我说：“老年人病了，不能只是睡在床上，最好有一个活动的躺椅，可坐可卧可躺。再有，年纪大了听觉不好，大门上最好装个门铃。”这两件事情，我们很快就落实了。事情虽然小，却令裴老十分动情。1989年耀邦同志逝世时，裴老写的吊唁文章中，特别谈了这件事情。

裴老从1954年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直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到北京开会时，耀邦都要接裴老在家中相聚，听听他对地方社情民意的反映及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见和看法。耀邦同志说：“革命胜利了，共产党威信高，群众都说共产党的好话，有意见也不敢提，对你他们没有顾虑，你可以听到他们的真话，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有时候为了扩大接触面，耀邦同志还邀请在四川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振、鲁崇义和在重庆任副市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周钦岳等一起去他家里。耀邦同志总是胸怀坦荡，利用各种机会主动倾听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制造了两个大冤案,一个是“以裴昌会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另一个是党内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捏造裴昌会、鲁崇义、夏仲实三人于1967年8月,串连他们国民党的旧部,并被打成重庆市党内走资派的任白戈、李止舟、廖伯康三人同意,在民革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如此弥天大谎,不管怎样刑讯逼供,裴老坚信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因而对自己的历史和面对的现实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1973年后,经过两年的复查,证明罪名纯属虚构,予以全盘否定。1975年,裴老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时,耀邦同志还未完全解放,没有安排工作,许多人不敢和耀邦同志接近,裴老仍一如往常,到耀邦家中相聚。裴老因在“文革”中被打致残只能蹒跚而行。此情此景,耀邦见后一再地说:“文化大革命对不起人,真对不起人!”耀邦对和裴老相依为命的孙女裴丽珍说:“裴老是旧军人,有些旧军人还讲旧道德呢!怎么把裴老搞成这个样子。”耀邦还对裴丽珍说:“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我认为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就是对人守信用。我对你祖父(裴老)之所以现在关系还如此之好,保持这么久的友谊,关键在我们都守了信用。你祖父对共产党守了信用你很清楚,而我对裴老也是守了信用的。他起义时,我和贺龙司令员一起与他接头见面谈心,就谈了我们是守信用的。从他起义后,我们就对老人负责到底。”耀邦还说:“十年动乱,在我自身难保之际,好多别有用心的人来找我调查你祖父的情况,我的回答始终如一,你爷爷1949年起义参加到革命行列以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们是信得过他的。他起义时,我们对他是保证的,共产党说话算话,是最讲信用的,我们对他要负责到底的。”裴老此时接过话题谈了他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的那一段严峻的岁月里,也是始终实事求是回答前来搜集胡耀邦“走资派材料”的问题。裴老始终认为像胡耀邦这样坦诚相待、信义相守的品德,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品德。

裴老早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抗日战争时期转战于华北、华中抗日前线,解放战争后期毅然同国民党决裂,率部10万之众归向人民。1950

年6月毛主席单独接见了,对他的起义行动予以鼓励。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他真诚地接受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社会和祖国,满腔热情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裴老深怀党的知遇之恩,对党的感情十分真诚。他常说是党帮助他总结了前半生,是党指引了他的后半生。他满怀深情地多次向耀邦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得到了耀邦同志的鼓励。耀邦同志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待,你早就是自家人了。只是我们觉得你在党外,比在党内影响大得多,起的作用强得多,你作为国内外的知名人士,我希望你能留在党外为党作工作。你的入党申请书可以先写好交给我,在适当时候一定会让你参加共产党的,你放心好了,我说话是算数的。”

1989年,裴老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他最信赖的耀邦同志又已病逝,而入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感到很焦急,实在放心不下,于是找到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先余同志。1950年裴在川北工作时孙任南充地委书记,此时正与他在同一医院治病。他拉着孙先余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我的入党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了?不要等待我死了再来追认,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就成为共产党员。”孙先余说:“你的入党问题,耀邦同志向我讲过,这件事我立即向市委汇报。”孙先余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市委,转报了省委。省委及时召开常委会讨论此事。那时我担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参加了这次常委会,在讨论时我说:“裴老从1949年起义后,在长达40年的岁月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锻炼和考验,尤其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矢志不渝,说明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尽快地及早予以批准,不要在身后才加以追认,让生者和死者都遗憾终身。”

1989年8月22日,93岁高龄的裴老,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当重庆市委领导告诉裴老这一决定时,裴老连声说:“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感谢党组织,耀邦同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裴老入党后,心情十分舒畅,病情也逐渐好转,又幸福地度过了三个春秋。

(责任编辑 李云)

#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评析(下)

● 吴 江

记者,你谈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五种表现。可否再进一步谈谈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作者:关于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或者说它的积极作用,这本身不是一个新课题,人们在这方面已经讲得不少了。我不打算过多地重复大家讲过的话,只想概括地谈几点。

第一,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历史进步性,首先表现在它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消除了封建等级特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它是对愚昧、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直接否定。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落后,政治的反动,神权的压迫,构成了整个中世纪恐怖黑暗的漫漫长夜。文艺复兴以来新兴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主、科学、理性原则,经过斗争而

确立的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便是冲破这漫漫长夜的曙光。资产阶级民主的锋芒所向,直接就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身束缚、世袭特权、宗教蒙昧和陈旧的道德信条等等。封建秩序的瓦解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的确立,是适应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反过来成为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力量。列宁说过:“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页)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给予充分肯定。

记者:在一本叫《民主的历史演变》的小册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像资产阶级第一次把生产的社会化带入人类的经济生活一样,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也第一次把近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带进了

人类的政治生活,这是新兴资产阶级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之一。”

作者:以上是第一个表现。第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历史进步性还表现在它为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工人阶级是历史上进步的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最终消灭剥削制度的阶级。这个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虽然在同一社会形态的母腹中生长,但是唯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对它的发展最为有利。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消除了自然经济对人的束缚,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使社会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从而为工人阶级力量的集中和组织奠定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民主制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定的斗争形式和斗争场所。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法律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开展合法斗争,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并利用资本主义民主所提供的条件,发展自己的组织,

建立自己的政党,提出自己的纲领,增强自身的团结,使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担当起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历史使命。关于资本主义民主为工人阶级的成长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充分论述过的。

记者: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按照通常的见解,资本主义民主制仅仅保证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被排斥在民主之外的。

作者:正像国家除了政治统治职能还有管理社会的职能一样,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在法律上也给予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民主权利,特别是给予争取民主的条件,这是并不奇怪的,虽然法律上的东西并不都是实际上存在的,

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进步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它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形式。对这一点,上面所引列宁的那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列宁曾论述民主的质和量,按我的理解,所谓民主的质主要是指导民主的阶级规定性,民主的量主要是指民主的形式及其发展程度。

在这里,我想请你特别注意一点:正像资本主义胚胎中孕育新社会因素一样,在人民斗争和社会进步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胚胎内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人民民主的因素。现在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

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就是一例,这个问题很可以研究。时代越进步,民主扩大的趋势越不可阻挡。

记者:依你看,资产阶级民主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呢?

作者:比方说,(1)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资产阶级创立的民主共和国,既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直接否定,同时又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现成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9页)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肯定了的。(2)民主选举制,选举制是近代民主——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们是依据“人民主权”的进步思想建立的,是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民主制度。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在实现民主方面,首先重要的是推行真正的选举。这种选举制度不会老停留在村级,从基层到乡、镇、县、市、省逐步地有序地推开。当然要经过试点,慎重对待。但是,不要害怕选举,尤其不要害怕差额选举。(3)权力制衡的原则。虽然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不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但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以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从而保证政局稳定的一些经验和措施,也是值得借鉴的。(4)注重法制,强调“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借助政党的组织力、号召力,把民主

运作纳入有序状态的某些方式方法。(6)资本主义民主所创造的舆论监督方法。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监督自然有它的种种弊病,社会主义应当创造自己的舆论监督,使之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如此等等。

总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等级特权的否定,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这一点,那末我们就会从资产阶级民主中发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重要是在制度方面。我们不少人讲民主,常常把民主说成只是一种让人说话、肯听人意见的“好作风”(或曰“群众路线作风”),到此为止了。其实,这是不符合民主的原旨的,依然是居上临下的态度。如此谈“民主”,我们有些领导人已经习以为常了。

记者:我们说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进一步,社会主义民主自然应包括资本主义民主的积极成果在内。这种观点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与盲目崇拜西方的态度截然不同。但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民主确实还年轻,我们要使社会主义民主获得较完备的形式,看来不是一件容易事。

作者:这是一个艰苦的长期发展过程,因为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美国的卡尔·科恩曾在《论民主》一书中谈到充分实现民主的条件有五个:一是物质条件,即人们要有充裕的物质条件才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二是法制条件,就

是社会要有完备的足以保障公民有真正充分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三是文化、智力条件，即公民要有表达政治见解、判断政治是非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四是心理条件，指社会成员有适于民主政治生活的意识和习惯；五是防卫条件，指抵御外侮及内乱以防卫自己的能力。以上虽是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民主发展条件的一般论述，但也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知道，早在 14 和 15 世纪，在欧洲专制主义的堡垒中，新兴资产阶级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用理性和科学的武器砸碎封建意识形态的铁笼。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所赖以形成的思想文化条件——公民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法制观念等，就是从这里开始奠定基础的，这少说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当代资本主义尚有发展的潜力，随着资本主义经

济政治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在某些方面仍有发展的余地。社会主义民主在质上虽要高出资本主义，前程无量，但它毕竟才走了几十年的路程，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完备的程度。

记者：西方国家经历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较短，封建传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深厚，因而在经历了文艺复兴这样巨大的思想冲击之后，封建的铁笼较容易被打破，这恐怕是西方民主发展的一个特殊条件吧？

作者：一般来说，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积习很深的国家，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的确立，民主习惯的形成，要比建立民主制度本身还困难些，而没有前者，某些制度往往会流于形式。我们不应忘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指出，俄国的落后和它向社会主义民主的“飞跃”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这种矛盾，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苏维埃政权在理论上

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这点。实际情况甚至比列宁所说的要更严重得多，更令人痛苦和不堪。归根到底说来，经济和教育是发展民主的基础。因此，民主建设不仅要抓必要的制度建设，尤其要花大力气推进经济文化建设，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培育公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这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决不可把它看轻了。

（注：本文是从我和牛旭光同志合写的《民主与政党》一书中抽出来的，有较多修改）

（责任编辑 致 中）  
（全文完）

## 欢迎邮购 《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 通 告

2002 年合订本已装订完毕

1996 年合订本：简装 49 元 精装 52 元

1997 年合订本：简装 无 精装 52 元

1998 年合订本：简装 无 精装 56 元

1999 年合订本：简装 51 元 精装 56 元

2000 年合订本：简装 51 元 精装 56 元

2001 年合订本：简装 51 元 精装 56 元

2002 年合订本：简装 51 元 精装 56 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我刊编辑部从 1995 年以前 45 期的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 150 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现已全部售完，特此告知，请勿再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电话：(010)68532048 邮编：100045

# 共产党报人恽逸群多灾多难

● 韩 兵

恽逸群是中国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爱国报人。他不畏权贵,不为利诱,对祖国和人民披肝沥胆,对一切丑类无情鞭笞,就是这位共产党人赤诚的一生。

恽逸群,1905 年 1 月 24 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寿山村一个塾师家庭。他自幼饱读经史,16 岁时,他满怀科学救国理想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业,仅读了一年就穷困辍学,到无锡市电话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他在上海目睹了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血淋淋的屠刀告诉了他,救国必先反帝,于是他参加了刚改组的国民党,走上革命救国之路,回到武进担任县党部常委。1926 年 7 月他又参加了共产党。次年 3 月,北伐军随着浩荡的春风打到武进。他和同志们四处发动工农,抓土豪,斗劣绅;“四·一二”大屠杀的枪声又笼罩了中国大地,他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出狱后,他接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继续发动四乡农民抗租抗税,遭到国民党军警一路追捕,先后转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浙江萧山县委书记、浙江特委秘书长。

1932 年 8 月,遭追捕的恽逸群来到上海最大的民营通讯社“新声社”,当了该社记者,从此,他开始了“辛苦遭逢”的文笔生涯。

1932 年长江大水,鄂、皖、赣等省一片汪洋,淹死农民逾 500 万。国民党政府却视若罔闻,大笔“美麦借款”或用来“剿共”,或中饱私囊,真正修堤救灾所剩无几。“全国经济委员会”却装腔作势地组织了一个浩浩荡荡的“长江堤勘察



恽逸群

团”,由宋子文亲自带队溯江而上“考察”。恽逸群随团 20 多天,冷眼旁观,悉心查访。同行记者纷纷发稿,而他一字不写,最后却拿出一本细账,指出工程所耗与救灾款额严重不符,用事实与数字披露出国民党救灾的真相。

1935 年 8 月,恽逸群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兼社论主笔。随着日寇全面侵华野心日益暴露,团结抗战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为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他每日一篇社论,纵谈救亡图存,宣扬民族大义。1936 年 12 月 12 日突发“西安事变”,他立

即发表《御辱必须团结》等一系列评论分析文章,指出:“敌之所快,即我之所痛;敌之所痛,即我之所快。”“切望国内任何一方‘不为己甚’,干出‘敌快我痛’的事件出来!”警告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不要借机扩大内战。“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依旧四处央求列国调停。恽逸群怒不可遏,大声呐喊“应战的时候了”,接着他又写出《六年来的教训》一文,列数“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误国的罪行。揶揄道:“蒋委员长说,今天的北平,可以变成昔日的沈阳。则将来的南京,何难不变成今日的北平!”最后正告蒋介石“不能像南宋那样做偏安于小朝廷的梦想”。他还与范长江、陆诒、夏衍等 24 人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大批青年记者,壮大抗日宣传声势。

从这一年春起,国民党特务就开始寻机抓

他,后来更是公开围追堵截。他不得不躲进法租界,但他的铮铮言论依然见诸报端。

上海沦陷后,恽逸群坚守“孤岛”鼓动抗日,又上了日伪特务的黑名单。上海滩上,一些挂洋商招牌的中文报纸纷纷出刊。《华美晨报》主持朱祝同久仰恽逸群的胆识和文笔,抢先聘他主笔评论。英商创办的《导报》和《译报》,也由他分别担任主笔和总编辑,使他又有了“一片阵地”。他“下笔千言,依马立待”,抨击所谓“共存共荣”、“和平救国”之类强盗与奴才的哲学逻辑。1938年11月发表在《导报》上的《异哉汪精卫之言》,公开揭露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投降卖国嘴脸,斥责他所散布的“抗战必败”、坚持抗战是“不负责任”等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佛海拍桌大骂作者“曲解国策,自误误国”;“是汉奸”。飭令军统、中统合力“制裁”。日寇与之积极配合,及时向租界当局提交逮捕名单。

汪精卫气急败坏,命令李士群、丁默邨要用恐怖手段为“和平运动”扫除障碍。恐吓信一封封寄到报社,扬言“定将以武力制裁之,炸弹与

枪炮并来……”此时,朱惺公、张似旭、金华亭、倪蓝深、邵虚白等多名爱国报人相继被杀。《译报》、《文汇报》、《大美报》、《中美日报》停刊一周。就在这最艰险的时刻,恽逸群给几家报社同志鼓劲说:“今后的局势会更严重。不能办大报,我们就办小报;不能办小报,我们就办刊物;一切都不能办,就办壁报。”我不相信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说话!”几天后,租界当局又借查军火大搜捕,他立即在没停刊的报上回敬以《炸弹五百万》:“租界要搜炸弹,我们保证永远搜不完。因为租界上的炸弹有四百几十万。这些炸弹全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心的炸弹是永远也搜不完的。”5月底,伪政府发布通缉令,列名83人,恽逸群为首要。《导报》社又被炸,恽逸群险遭不测。党组织命他立即撤出上海,前往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中共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同年,夏衍为了表达对奋战在“孤岛”宣传战线上的同志“无法禁抑”的“感叹和忧煎”,在桂林创作了话剧《心防》,以恽逸群为原型,塑造了怀揣遗嘱、用笔构筑沦陷区人民心理防线的“刘浩如”的英雄形象,感动了大后方无数抗日军民的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恽逸群肩负党的特殊使命重返上海,在潘汉年安排下打入日军特务机关岩井公馆,明里为日伪《新中国报》编稿写文章,曲笔揭露反动宣传;暗中为地下党搜集军事情报。他还利用日蒋矛盾,在日伪报纸上批判蒋介石。有一段妙文这样写道:“(抗日)战争是共产党要打的,是共产党煽动了各方面的力量逼着蒋介石打的。战争进行中,蒋想停战谋和,又被共产党牵制着,不敢和,蒋的本意是反共,但受到战争牵制,不能放手反共……”活画出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使其幕后的“谋和”行动不能不有所忌惮。

1944年10月,恽逸群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逮捕,关在日军苏州监狱。八个月后,敌人因“证据不足”将他释放。

不久抗战胜利,他参加《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同时大量发文抨击时政,又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1946年3月,国共南京和谈,中共代表团邀他担任发言人,中途,华中分局急电阻止。为防不测,组织决定他与范长江调



任,回华中主持华中新华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并任华中新闻学校校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恽逸群重返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后又作为新闻协会代表出席首届政协,参加开国大典。

解放了,应该能畅所欲言了。恽逸群提出了新闻工作的“四基五性”主张,即四个基本训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知识积累和调查研究以及文字能力;五项具体要求:真实、正确、针对、时效、生动。宗旨就是要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依然要为求实付出人生的代价,成为不实事求是的牺牲品。1952年2月,“三反”中他被饶漱石借机横加陷害,以莫须有罪名开除出党,降职三级。1953年3月,国家出版总署负责人胡愈之、陈克寒出面将他调任北京新华辞书社副社长,并甄别错案。1955年5月,他又受潘汉年案牵连,受侦讯一年,尽管查无“叛徒、汉奸”实据,仍继续关押在监狱。1965年11月还是被以“叛徒、汉奸”罪判处徒刑11年。12月假释,发配江苏阜宁中学管理图书,月给生活费37元,无职级。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讲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对于频见于“两报一刊”的那些先引语录,认为是霸气十足的文章,他斥之为“新八股”,并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为它断章取义,妄加议论,且不容置疑。”“评法批儒”轰轰烈烈时,他讥讽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战者服上刑’一语是反对人民战争,不知哪一天在



解放后恽逸群的一家

梦中见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民战争……”

他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不以物移,不为己忧”,他坎坷的一生也反映着时代的悲哀,一个不给说真话、实话的时代必是一个腐朽、专制的时代。

1976年“文革”结束,恽逸群重获自由,已是羸弱之身,他仍壮心不已,定下了一个“为党工作十年”的计划:他想的全是为后人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其实他在1972年6月就在秘密着手一部《七十年实录》的撰写,其残稿前言中有这么几句话:“自己的事固无所讳避,别人也同样,既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凡事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万一被人看到,我也不怕惹祸,孑然一身,无子无女,祸无所延……焚骨扬灰,适符素愿。”

1978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恽逸群的志愿,安置他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正当他放手自己的计划时,遽于12月10日病逝。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函通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经复查核实,原定恽逸群为叛徒、汉奸是不能成立的,应予否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于1980年4月14日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和裁定书,宣告恽逸群无罪。”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反专制斗士光明甫

● 吴 晓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庆后,乘“洛阳号”军舰起航驶往芜湖途中,与陪同他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等人聊天时,他突然向傅大章问道:“安徽有一位名叫光升的老先生,还在不在?在武汉革命政府时,我和他同过事……”

毛主席问起的这位光升先生,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教育家、省政协副主席光明甫先生。

光明甫(1876—1963),枞阳人(后移居安庆市),清末秀才。面对清廷腐败,国事危难,民生凋敝,他内心极为痛苦和愤懑,嗣因维新思想的影响,慨然跳出故纸堆,追求民主革命。1903年他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参加了由赵声、章士钊等策动的南京进步学生“北极阁”反清集会(即震动苏、浙、皖三省,被称之为“北极阁风潮”)。清廷得知后,恨之入骨,加以迫害,光明甫被学校开除,潜返安庆,避入求是学堂任教。1905年,他考取安徽省第一届留日官费生,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时值孙中山在东京组建同盟会,经陈独秀等人的介绍,他结识了孙中山和黄兴,遂加入同盟会,紧跟孙中山投入了革命的征途。

1910年,他学成回国后,即以兴学振教为己任,任安徽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兼政治教员,并以学校为传播革命思想阵地。时值徐锡麟、熊成基起义先后失败,青年学生革命热情受挫,他积极向学生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培育了很多进步青年。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出任安徽省都督,邀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光明甫任都督府秘书。不久,他即辞职,仍回法政学堂任教,并与刘希平等创办安徽江淮大学,任校长,后改为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更成

为培养革命新生力量的基地,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了安徽早期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骨干力量。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时,他奋起响应,参与讨伐袁世凯斗争,失败后遭通缉,流亡宁、沪。

1919年,经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的安徽,教育运动蓬勃兴起,但窃据安徽军政大权的北洋军阀倪嗣冲,却安插亲信担任校长,控制师生,扼杀革命,引起安徽学界的无比愤慨,于是,开展了一场驱逐各校反动校长的斗争。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一马当先,愤怒的学生组成一道道人墙堵住校门,高举横幅标语:“强烈要求法专创办人、法学专家光升先生回校当校长!”军阀爪牙滚回去!”经过坚决的斗争,法专先后赶走两个反动校长。这样,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视光明甫如肉中刺、眼中钉的倪嗣冲,无可奈何,不得不电请流亡在沪的光明甫,返皖任法专的校长。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得知此事后,对光明甫说:“机会难得!升公应该返皖当法专校长,从那里打开缺口,把军阀安插各校的钉子全拔掉。”陈独秀又深沉地说,“倪氏祸皖,皖岂容有倪。升公返皖任重而道远也。”光明甫终于由沪返皖,重掌法专,受到安庆师生和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不久,各校“易长斗争”,如火如荼,安庆一师驱逐军阀亲信赵继椿,由李光炯掌校。芜湖五中赶走军阀爪牙潘先祖,刘希平出任校长。从此,光、李、刘并肩战斗,形成安徽教育界的中心,“团结全皖进步校长,组成安徽省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安徽教育会”,秘密策划了反抗军阀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尤为世人瞩目的是他面斥、怒打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的义举,一时被人们传颂。

这事发生在1921年6月2日,安徽称为

“六·二”学潮。

这天傍晚,安庆各校代表千余名学生,到省议会请愿,抗议当局挪用教育经费。此时,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和观阳关监督倪道烺(倪嗣冲的侄儿)正在省议会楼内欢宴,大门紧闭,警察严把,阻止学生入内,省学联主委方洛舟等12人带头奋勇冲破警察的阻挡,闯入议会。此时,被驱逐的原一师校长、副议长赵继椿怒气冲冲地出现,质问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如此胆大闯入议会,你们跑来干什么?”学生代表响亮地答道:“我们是一师的学生代表。”赵继椿想到当年被一师驱逐的羞辱时,大声喝令道:“给我狠狠地打,弄出事来,有我!”顿时,警察大打出手,手无寸铁的学生只得后撤。消息传出,安庆学生怒吼了,法专、一师、一农、一女师、一工等校1000余名学生赶来声援。正在宴饮的马联甲,遂下令调来城外驻军,吹着冲锋号,端着刺刀,冲杀而来,学生奋勇搏斗。然而,学生毕竟是赤手空拳,难以抵挡,结果重伤50多人,轻伤200多人,一师学生姜高琦伤重身亡,另一重伤学生周肇基,不省人事,被扣押于议会。

光明甫闻讯迅速赶来,怒气冲冲地冲进议会。当他看到被扣押、遍体鳞伤的学生周肇基时,勃然大怒,指着赵继椿厉声责问道:“两国交战,红十字会尚可医救受伤俘虏,学生被打伤,还扣押不让医。你赵继椿还有人性吗?”赵继椿从衣袋里掏出一纸条答道:“学生受伤,非军队杀伤,乃自相蹂躏,碰撞所致,现有学生‘自认书’为证。”光明甫当即询问周肇基,周呻吟着说:“当时,我若不写这字条,赵某即令士兵用皮带抽我,字条实系被迫写的。”卑鄙!”光明甫怒不可遏,指着赵的鼻子骂道:“看来学生被你们杀伤,这是铁证,就凭这纸字条,我们法庭上见!”赵继椿被责问得无言可说。此时,马联甲狂叫:“有事找我马联甲!你是什么人?”光明甫正气凛然地答道:“我是法专校长光明甫,你敢把我怎样?”说完,光明甫随手用伞敲了马联甲脑袋。马联甲恼羞成怒,逞其凶焰,上前揪住光明甫衣领,劈面就是一耳光,打掉他的眼镜和帽子。铁骨铮铮的光明甫,热血沸腾,一把扭住马的武装带,怒骂道:“打你这条军阀的狗!”随即“叭叭”,左右开弓,给马联甲连扇两个响亮的耳光。大刹威风的马联甲,气

急败坏地喝令士兵:“把他捆起来,拖出去枪毙!”光明甫面不改色心不跳,毫不畏惧地说道:“你敢!”此时,后续的学生愤怒高呼:“打倒倪道烺!赶走杀人魔王马联甲!向马联甲讨还血债!……”警察厅长程炎勋面对学生的怒吼,担心事态扩大,于是,将光明甫连拉带劝送出省议会。

光明甫一出省议会,就赶到教育会,连夜召开省学联、省教联和各校校长紧急会议,研究斗争对策。翌日,省城安庆沸腾了,怒吼了!各界人士2000多人,从四面八方高呼口号,云集教育会,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光明甫等人登台报告惨案实况,出示血衣,全场失声痛哭。由光明甫发起的“六·二惨案后援会”,在会上宣告正式成立,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立即分头行动,通电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各大城市,公开揭露“六·二”惨案真相,要求伸张正义,并选派120名学生代表,分赴沪、京、宁、津,报告惨案经过,争取旅外皖人的声援。安庆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学校门前均悬有白布书写的“议员军阀,残杀学生,全体罢课,誓与偕亡”的大幅标语。安庆学生挑血衣,进行示威大游行,一路上高呼“打倒军阀马联甲!”“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并推代表向法院起诉,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不日,芜湖、蚌埠、合肥、六安等地学生奋起响应,纷纷举行罢课,游行示威,声援安庆学生的正义斗争。一时间,全省反抗军阀的斗争风起云涌,席卷江淮大地。接着《申报》、《时事新报》等各地报纸均以大字标题和显要的版面,刊登了安庆“六·二”惨案的消息,指责军阀的暴行。全国学联、文教团体、旅外皖籍名流学者纷纷通电声援,遣派代表来皖慰问,有力地支持了安徽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在各界强烈抗争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反动军阀当局不得不答应增加教育经费,并抚恤姜高琦的家属。是年11月14日,安庆各界3000余人为姜高琦举行追悼大会。光明甫含着泪水,亲撰挽联:“天柱徒高,何如烈士塋?江流不转,长屹党人碑。”次年,周肇基因创伤复发而亡,光明甫又痛撰挽联:“扶伤吊死,奔命已疲,痛史相承,忍忘六月二日;伸法雪冤,吾侪有责,人权欲绝,誓争一发千钧。”

“六·二”惨案发生后,光明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军阀不驱,治皖无望。在此后的反对贿选省

议员、驱逐省长李兆珍以及废督裁兵等的斗争中,他奋不顾身,奔走呼号,不屈不挠,表现了反封建军阀争民主的大无畏的精神,受到世人尊重。1922年他被推选为安徽省地方自治筹委会会长。

1924年1月,他作为国民党安徽省代表之一,出席了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衷心拥护大会的决议和实行国共合作,决心遵循三大政策,联合一切力量,加速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中央明令指派光明甫、朱蕴山等九人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并派选他为执委中的首席执委,主持安徽党务,领导全省人民支援北伐战争和学界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然而,高涨的安徽革命运动,却遭到了北洋军阀、皖军总司令陈调元的镇压,他遭到通缉,临时省党部被迫撤往武汉。此间,他在武汉协助共产党人开办党务干部训练学校,为全省各县训练党务干部120余人。1927年3月中旬,北伐军占领安庆,临时省党部也随之返回安庆,为重建党的组织和召开“国民党安徽省(左派)第一届(次)全省代表大会”,他四处奔走。然而,此时蒋介石在打击赣州、九江革命的左派势力之后,于1927年3月20日将其总司令部移来安庆,并耍起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劝说左派和解,要把亲信、特务头子杨虎等塞进新的省党部,但遭到光明甫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蒋介石未达目的,气急败坏,于是,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3月22日上午,国民党(左)安徽省党部在安庆黄家操场举行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蒋介石应邀出席,当他在省党部常委光明甫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主席台,发现没有欢迎他的标语,看到的却是“清除总司令部里的反革命”传单,顿时怒色满面,拂袖而去。这天下午,光明甫等人到总司令行营晋见蒋介石,不料在行营门前,突然遭到一群流氓围攻殴打,光明甫衣服被撕破,眼镜被打落,颈部被打伤。进入行营后,光明甫示伤给蒋介石看,据理斗争,要求严惩暴徒。蒋介石当着郭沫若的面只得敷衍:“好啦,好啦,我警告他们好啦!”可是,当光明甫走后,蒋介石对郭沫若说:“安徽人顶拆烂污”!

次日,一群流氓组成的“敢死队”,在杨虎的

带领下,大打出手,捣毁了临时省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省妇联等进步组织,打伤代表及工作人员100余人。安庆城内一片白色恐怖,交通断绝,消息封锁,但光明甫凛然无惧,毫不妥协地转入地下,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光明甫等一批左派人士遭通缉,他只得化名光雷,只身潜往武汉,并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破坏国共合作。“七·一五”蒋汪合流后,他再次遭到通缉,流落上海。

光明甫是中国民主同盟会最早创建人之一。1939年,他会同张澜以社会贤达个人身份,联合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两党以外的三党、三派政团负责人黄炎培等,倡议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改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演变而开多党合作政治体制的民主党派的先河。当抗战烽火燃遍江淮大地时,他即返皖投入抗日工作,并出任“全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与张澜、沈钧儒等配合,呼吁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抨击蒋介石集团贪污腐化,消极抗日。他在重庆出席参政会时,记者看到他身穿补丁累累的大褂子,甚为感动。于是,重庆《新民晚报》曾在“场外花絮”栏内,刊出一篇题为《光参政员的大褂子——二十四个补疤》,一时被传为佳话。他的这种艰苦朴素、高风亮节的精神,与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淫逸侈奢,恰成鲜明对照。抗战胜利后,光明甫任《安徽通志》馆馆长。

新中国成立后,光明甫的爱国立场坚贞不渝,竭诚地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失为民主革命政治教育家的本色。他曾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代表、省教育厅厅长、省文史馆馆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委员会委员,1963年元月逝世,终年87岁。(责任编辑 仲文)

### 更 正

本刊今年第5期第31页图片说明有误,朱厚泽的位置应为左五。

本刊编辑部

# 父亲华岗坐牢 21 年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百年诞辰

● 华景杭

我的父亲华岗 1903 年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中学时代就投身于革命，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他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长、新华日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中共上海工委书记，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青岛市委委员。他一生度过了 69 个春秋，曾两次被捕，有 21 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其中 5 年是在国民党监狱中，还有 16 年是在共产党的监狱中，直至 1972 年含冤去世。

1949 年 8 月，由中央安排到香港边养病工作的父亲，接到任命——到中央某部担任领导工作，便带领全家北上，不料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开往青岛。船刚抵青，就有一辆小轿车将我们全家接到青岛市军管会，迎接我们的是身着军装的向明——当年与父亲一起坐牢的难友，现任军管会主任，谈话中，向明得知父亲要去北平赴任，便竭力挽留。向明说：“山东很缺干部，特别是文教



摄于 1938 年在汉口出狱后

界，希望你能留下来。”父亲说：“这要请示中央。”向明知道父亲当时肠溃疡又发作了，便表示：“你先留下来养病，中央的手续由我去办。”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回电，同意父亲暂留青岛养病。这时，青岛市委经常派人来向他汇报青岛的情况，特别是要求指导文教工作。父亲看到青岛市委如此重视教育，山东大学又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阵地，他们对自己抱有很大的期望，于是从 1950 年 1 月起，父亲以教授身份为山大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做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他的讲课和报告非常生动，深受师生欢迎。不久，在校委会的民主选

举中被选为校委委员，又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0 年 11 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与父亲交换意见，征得他的同意之后，中央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就这样，父亲留在了青岛，我们全家也在此定居下来。父亲将全部精力投入山大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山大的教学、科研工作成绩卓著，受到教育部的嘉奖。他还亲自创办了《文史哲》，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的校刊，在全国影响很大。人们赞誉他是“懂政策、有能力、会办

学的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

这样平静的生活刚过了6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5年8月,父亲突然被捕,“老革命”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这不仅使他本人,也使所有熟识他的人感到震惊。

### 二

在父亲的一生中,身陷囹圄,失去自由,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32年9月,父亲奉命去东北担任满洲特委书记,先到达青岛,等待南满派来的人接。不料交通员张永祥外出时遇到叛徒,等他回到旅馆时,警察已尾随而至,对华、张二人进行搜查,从张的皮袍夹层中搜出密信一封,便将二人逮捕。

中央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组织营救。华、张二人在青岛被关押近两个月后移送济南。父亲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叫刘少陵,是贩卖皮货的商人。敌人用尽各种毒刑,也无法从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口中得到丝毫线索。在这里他遇到了任作民和向明两位共产党员,从此三位革命者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开展狱中斗争。他们商定,父亲系统地给政治犯们讲授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斗争方法等,当然,讲课时要采取隐蔽的形式。他们三位还在狱中筹集资金,为生病的难友购买药品、营养品,并帮助每个政治犯写口供,使之在审判时能做到对己、对组织都有利。在看守所,犯人经常遭到打骂,伙食也极差,父亲与任作民、向明多次组织绝食斗争,均取得了胜利,使犯人处境得到改善。难友中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人经过学习和锻炼,出狱后都成了抗日救亡的骨干分子。

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当局仍对华岗、张永祥判刑5年。11月底,父亲被送到青岛山东省第五监狱服刑。这里的条件比看守所更差,住处狭小,光线极暗,吃的是牙碜的窝头、咸菜,犯人带着脚镣劳动。父亲在此被关押了两年多,于1937年1月再次被移送济南第一监狱,他欣喜地又见到了任作民和向明等人,大家交换了情况,得知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几次谈判中都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这对狱中的

同志们无疑是个好消息。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律,犯人被关押时间达到刑期2/3后,应送到反省院去。1937年2月17日,华岗等几十人被押上火车,送往武昌反省院。

在反省院,父亲号召难友不写反省心得、不吹捧院方,使院方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按规定,父亲应在1937年9月1日出院,但院方却以“表现不好”为由,不许他出院。

1937年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父亲通过组织送信给董老,告知狱中斗争情况。董老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任作民。迫于形势,反省院于10月16日,通知二人出院。当华、任离开监狱时,难友们都高兴地夹道欢送。

### 三

组织上对父亲在狱中的表现经过考查,做出结论,认为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无任何自首行为,表现很好。考虑到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决定让他先休养一段,再分配工作,但父亲却一刻也不肯休息,迫不及待地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新的工作。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的革命战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却被投入“自己的”监狱。

事后得知,这一次父亲是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向明反党集体成员”的罪名被捕的。当时,“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被“揭露”出来,有人从胡风的日记中查到,胡与华有过来往,于是,华就被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实际情况是:解放前,父亲曾向胡风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对胡的影响很大。解放后,亦有接触,但关系并不密切,更谈不上“反党活动”。就在这一年,担任山东分局代理书记的向明,忽然成了“向明反党集团”的“主帅”,而华与向明一起坐过牢,现又在一起工作,那当然就是这“反党集团”的成员了。某负责人要父亲揭发向明的“罪行”,面对压力,父亲不愿诬陷好人,于是,就成了“反党分子”。

专案组不顾父亲正在生病,日夜审讯,要他交待“罪行”。9月中旬,山党委宣布召开“批判华岗大会”,连续开了三天,父亲只说了两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希望大家要相信事实。”专案组内查外调,仍查不到任何“罪

证”，便企图用“高压”政策，让他屈服。父亲义正词严地说：“要毁掉我很容易，不必这样兴师动众，如从实际出发，我的问题很容易查清，我没有罪，你们硬把罪名加在我头上，还要我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父亲给中央写上诉材料，均被他们扣下。请看从专案组材料中摘引的1956年3月11日，父亲一段动人心魄的自诉：

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文规定……如果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就应该立即纠正，而不应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这样的话，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字：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无论父亲怎样摆事实，讲道理，一切都无济于事，专案组必须执行早已设定的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957年秋，父亲将被转押北京。临行前，上面允许母亲带我们去看他，只见他已是双颊深陷，满脸病容，想到此行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见，我们不禁潸然泪下。父亲却安慰我们：“不要难过，我的问题去北京也许能比这里解决得快些。”父亲就这样离开了青岛。他本应在1949年去北京赴任，却在8年之后被押赴北京秦城监狱，这真是历史的误会。

父亲原以为到了北京，问题会得到正确解决，但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在这里他继续受到的审讯与在青岛时别无两样，他仍旧没有申诉的权利。当时，监狱为改造政治犯，有不少马列著作、书籍、报刊可供阅读，父亲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一面了解外面的形势发展，一面开始潜心写作。他说：“真正的悲剧可以使痛苦变成力量。”监狱当局发现他在写作，便规定：不许涉及政治，不许用钢笔。这一切都难不倒他，他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中省出一部分，托人买了毛笔、墨汁、笔记本，以惊人的毅力开始写作。

针对1957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他写了《美学论要》（20万字），对当时社会上的主要观点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对美的追求，对真理的希求，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的关怀。在文艺批

评方面提出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容许批评还得容许反批评，那种只许自己批评别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的做法，实质上仍是反民主的作风。”他认为：“艺术批评也要首先分清敌我，不可搞庸俗的宗派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只能有害于文学艺术事业。”

他在狱中的另一部著作——《规律论》（35万字），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规律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光荣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而不是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把差别看成是矛盾的观点，是导致阶级矛盾扩大化的一个理论根源。”他在阐明自己的看法时，虽迫于处境没有引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例，只是充分发挥哲学着眼于战略思考的作用，这些论点所具有的时代性和现实感是显而易见的。

他的思想已飞出了监狱的围墙，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失去自由的囚徒，忘记了自己个人的悲剧，忘记了自己的周身病痛，废寝忘食，奋笔疾书。他高度近视的眼睛，因劳累过度而几近失明。冬天，手脚生满冻疮；夏天，挥汗如雨，浑身被蚊虫叮咬，他全然不顾，像一个勇敢的斗士，把全部心血都凝聚在那犀利的笔尖上。为了坚持狱中写作，为了出狱后能重新为党工作，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 四

当父亲被囚于狱中时，外面的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1962年“向明反党集团”的冤案已获平反，向明已被释放，其他成员到1963年已先后甄别；“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已定案，经查，父亲与此集团的“反党活动”毫无关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时逮捕父亲的两条罪状都已是子虚乌有，为什么他仍未获释？原因只有一条：“态度极端恶劣。”1965年3月19日，经报中央批准，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父亲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此时，父亲已经被关押了10年，若不判10年以上又该如何收场呢？他们花了10年



1948年摄于香港

时间,用尽各种手段都未能使他屈服,于是便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整死在狱中。审判是秘密进行的,父亲当庭拒绝接受这一判决,按照法律程序,他要求公开审讯、请律师辩护、上诉等,一概被拒绝,因为这已是“最终判决”。

判决之后,1965年底,62岁的父亲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正是他30多年前曾被关押过的地方。狱中政委定期对他“精神训话”,要求他写学习心得、思想汇报,除了一个姓孙的工作人员外,禁止他与任何人接触。他在“检查”中说:“我虽然已届暮年,但区区之志,仍想为社会主义建设添加一砖半瓦。”

在这里,母亲去监狱探视过父亲。一别十年,再次见面之时,他已是满头白发,身体虚弱,仍穿着十年前离家时穿的衣服,破旧不堪。母亲伤心落泪,父亲劝慰道:“不要为我担忧,我的刑期不长了,只要我活着,还可以继续为党工作。”

看管的小孙与父亲朝夕相处,逐渐熟悉。父亲常给他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己的革命生涯,鼓励他学会读书,学会思考。他们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小孙开始尊重他,关心他,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他帮助。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对父亲来说,无疑是更大的灾难。监狱当局竟怀疑父亲对山东大学的运动有所影响,在他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

造反派批斗他,要他低头认罪,每每因“态度不好”,受到处罚。父亲已是多病之躯,每天必须与其他刑事犯一起干重体力劳动,他咬紧牙关,坚持着。经受着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 五

1968年8月24日,本是父亲被释放的日子,但却仍被关押着。直到1970年3月5日,军管会才签发了释放令,给他办

理了刑满释放手续,但仍不许走出监狱,将他安排到了监狱里的就业队。这个决定使父亲出狱的希望再次破灭,长达15年的狱中生活,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终于病倒在床,失去了自理能力。为卸包袱,1971年1月,监狱派人把他送往青岛家中,责令家人负责看护。

自1955年父亲被捕之后,全家老小及亲朋好友无一幸免,均受株连,我们背负着反革命家属的重压,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熬过了25个春秋,受到的歧视、迫害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母亲早就因“包庇华岗”的罪名,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行政连降四级。“文革”中,母亲一面被批斗,一面在仓库劳动改造,全家被赶到一间10平方米的斗室中居住。尽管如此,父亲回到家里,全家总算团圆了。16年的监狱生活使父亲改变了许多,他已不像当年那样精力充沛,行动敏捷,谈笑风生,而是面色浮肿,行动迟缓,沉默寡言,这使我们欲哭无泪。父亲虽然走出了监狱,但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公安局宣布:不能出门,不能会见他人,不能发表政治言论,不能……要定期汇报思想,继续接受改造,民警则奉命经常上门训斥:不准乱说乱动。还规定,家人必须严守秘密,不能向社会散布有关他的消息,全家时刻处于严密监视之下。父亲看病也须公安局批准,不能私自去医院,医生为他看病开药须在公安局监视下进

行,处方须经批准,方可取药……他虚弱的病体需增加营养,而副食品也是定量供应,只能靠家人仅能买到的一点食物,维持基本的生活。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1972年初,父亲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进医院绝无可能,只得重回济南山东省监狱,要求治疗。回到济南,进医院的要求仍遭到拒绝,只能靠一点简单的药物维持生命。三月,他的病情继续加重,母亲赶到监狱探望,多次要求允许他住院治疗,仍旧无效,母亲只能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细心照料,忙个不停。一天,父亲对母亲说:“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的时间已不多,不要再拖累你了,回去后,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母亲见他病情沉重,不忍离去,但监狱不许家属长住,只得与他挥泪告别,不料这竟是最后一别。4月,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但未通知家属。5月17日,父亲在医院去世,第二天,噩耗传到青岛,全家人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因只允许一名家属去济南料理后事,母亲只身一人,强压悲愤,匆匆赶到医院。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自己政权下的铁窗中。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母亲打开破旧的柳条包,里面除了几件破旧衣服,其余都是一本本父亲用毛笔认真书写的手稿,这便是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写下的笔记和遗著,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

## 六

1980年3月28日,在父亲离开人世8年后,被颠倒的历史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他生前坚持的“实事求是、还我清白”终于实现。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7月5日,山东省委召开“华岗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英雄山革命干部灵堂。罗竹风同志在悼词中写道:“……华岗同志虽死犹生……历史岂容捏造,是非自有公论。而今平反昭雪,还君本来面目……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著述等身,遗惠后世,华岗、华岗,永垂不朽!”

在父亲的冤案平反之后,他的遗著《美学论

要》和《规律论》相继出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将此作为“对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的一种纪念”。

林默涵同志评论《美学论要》时说:“在华岗的许多著作中《美学论要》有着特殊的意义。”像华岗这样一位“为了打碎旧中国这座黑暗牢笼而英勇战斗的人,解放后却被关进了自己的监狱,在人间所有的不幸和不平中,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不幸和不平吗?要说创伤,又有什么比这更深的创伤呢?然而华岗同志不是用眼泪来敷抹伤痕,而是以自己特殊坚强的品质和独特的方式来经受这种特殊的考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创作来战胜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林默涵称“这是用生命写成的书”。

熊复同志在读过《规律论》后,感慨道:“写一部有创见的哲学著作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尤其是作者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的时候,长年累月地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事这样艰辛的脑力劳动,没有极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顽强奋斗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华岗同志在这部发愤之作里,已经很好地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本色。我们从他这本哲学著作中清楚地看到,他丝毫没有一般人经受不平等待遇之后容易产生那种在思想理论上的偏颇,而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态度。这一点对于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党性锻炼来说,是特别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

他的早期著作,如《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历史的翻案》已经再版。历史学家尚钺在再版前言中说:“华岗不是预言家,他不过是在阐述他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但他35年前所说的这些话,竟然应验在后来的事实,足见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功力之深。”父亲在狱中完成的遗作,除《美学论要》、《规律论》已经出版外,还有《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科学的分类》、《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共计100多万字。这些文稿思想精深,见解独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八一厂“黑楼”纪事

● 严寄洲

拙文全系真情实录,除部分人物隐其真名实姓外,并无虚构成分。

## 一

“黑楼”并非黑色之楼,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区内西北一隅新盖的尚未竣工的约莫五六百平方米的浅色小楼。由于在这座二层楼房内关押着一批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册封为“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故而群众给小楼起了一个挺瘆人的怪名“黑楼”。

“黑楼”进门处,赫然张贴着一张“看管犯人条例”的布告,这就是说造反“左”派已经公开把这儿变成一座监牢了。

## 二

1966年5月31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作为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电影厂首当其冲,一些平时游手好闲、看风使舵、蝇营狗苟之辈闻到了异味,立即“轰轰烈烈”地跳将出来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中指出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志是好的或较好的。这个比例数字可真害人不浅,“左派”先生们有了这个根据当作尚方宝剑,厂里1500人,就该揪出60多个反革命了。于是厂里除几个“走资派”之外,被称作“臭老九”的艺术创作人员

大部分被当作“黑帮分子”揪了出来。在他们之中有著名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等等,给他们戴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大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等等,统称“牛鬼蛇神”,简称“黑帮”。他们的妻子叫“黑老婆”,子女叫“黑狗崽子”。

但是,真理终究是压不服的,渐渐地一些同志站出来,各自成立起各种名称的战斗队组织,和那些所谓最最革命的“左”派针锋相对地进行据理辩论。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响彻云霄。

就在这种极端混乱的风暴中,那些自封“最最革命”的“左派”,一时难以压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在对立面中,那些立足于保一批艺术创作人员的战斗队的能量和影响很大,他们的大字报有据有理很难驳倒。于是就有了诬陷和造谣。

“左”派们经过精心策划,一个罪恶的计划出笼了,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最初,捏造这桩子虚乌有的冤案,起因于一个所谓“坚定的工人阶级”,他年轻时曾经跟随当了还乡团的父亲到附近村庄敲诈勒索,解放后其父被我公安部门逮捕法办了。他的两个哥哥和叔父因作恶多端全被枪毙了。这位“工人阶级”长期隐瞒这段丑恶的家史,混入八一厂内,当了工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唯恐败露,急于想方设法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他挖空心思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说自己半夜爬到厂内故事片

室主任、导演冯一夫所住二楼窗外的树上,偷听到屋内有人商量要杀人夺权的谈话。他将这个捏造出来的离奇神话故事,献给了“左”派先生们。

“左”派头头们请来了几个秀才共同编造,把这件事编得有鼻子有眼,有人物还有不同的个性,很有点儿像电影剧本。内容是走资派陈播,于8月16日深夜12点钟,在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家中召开了由故事片导演严寄洲、王冰,纪录片导演张加毅,摄影师蒋先德等12人参加的杀人夺权黑会,会议讨论内容:夺回失去的党、政、财、文大权,欺骗外单位两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进入厂内挑起大规模武斗,在混乱之中杀害“革命”派勤务员甲某、乙某和已经休养的丙某。

9月20日傍晚,广播喇叭里突然声嘶力竭地叫唤了起来:“特号战报!特号战报!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怒向全厂公布一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1967年8月16日零点10分到3点20分,我厂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播,伙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一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及另外一些受蒙蔽的人,在冯一夫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策划已久的反革命黑会。经过几天的核查,已掌握了全部情况……”

与广播的同时,早已作好了准备的一批如狼似虎的打手们,分头冲进预定的各家抓人。一个头头根据江青说的“文攻武卫”、“文武结合”、“先文后武”的指导思想,喊出了

“好人打坏人是路线斗争觉悟高”的口号,把“杀人黑帮”劫持绑架而去,在我家中还顺手牵羊,偷走了一些较值钱的东西,有派克笔、手表和人民币,连写字台和台灯也搬走了。

### 三

他们把绑架的人分别安排在生产区的一些破屋里,然后统统关进了那座尚未竣工的“黑楼”。

“黑楼”的每扇窗户都用粗铁丝拧死,无法开启,房门上的把手也都卸掉,使关押在屋里的人无法开启。如要出去时由值班的看守用钥匙开门。房门上有一块玻璃窗,窗外挡上一张报纸,以使看守可以随时掀起来观察房内动静。每间空空荡荡的房内,摆着两只长凳架起一块床板,床头摆着一块空心砖,作为写“交待罪行”时的坐位,床板就权作桌子了。

被关进“黑楼”的“黑帮”不少,除了陈、冯、严、王、张,还有“左”派认为与他们作对的“危险人物”。下一步便是如何逼供这批反革命“黑帮”,首当其冲的是走资派陈播和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

陈播从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了,因为是头号



黑帮们在批斗会上

走资派,行动很谨慎,除了每天去看大字报之外,全天闭门思过,不和任何人联系,也闹不清形形色色的战斗队之间的斗争情况,因之也不很了解厂里各派的观点。这一天,“左”派揪他去审问,打手们摁着他的脑袋要他交待参加“杀人夺权黑会”的“罪行”,陈播矢口否认有这么一个“黑会”,因之也无法交待。“左”派一看他不交代,急得破口大骂,打手接连使劲摁他的脑袋往桌子上撞,只撞得头破血流,满脸是血,结果是一无所获。

接着提审冯一夫,冯一夫性格倔强,横眉冷对,怒斥这是有人诬告陷害,一口否认曾在他家开过任何会。造反派气急败坏,揪住他的花白头发往下拽,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厂内有一间小录音棚,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指标是关上厚厚的隔音门后,外头即使有喷气式战斗机从房顶上掠过也听不到声响。这个小录音棚外有一条通道直通“黑楼”,这正合乎“左”派的要求。从此每到夜静更深,便把要审讯的“黑帮”从通道揪到此地,进行毒打逼供,任凭惨叫呼号,外边是绝对听不到声响的。

“左”派们在狠打陈播和冯一夫后一无所获,又拿张加毅开刀。张加毅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贫农出身,是国际国内颇负盛名的著名纪录片导演、词作家。他编导的长纪录片在国际上多次获奖。“左”派们认为他头脑灵活,不像陈播、冯一夫那样顽固。但张加毅不像“左”派们想像的那么驯服,他针锋相对地和他们争辩。“左”派头头们无计可施,只有动武毒打,从深夜一直打到黎明仍一无所获。回到“黑楼”,张加毅浑身疼痛,满背上尽是伤,根本无法躺下,只得坐在空心砖上咬牙忍痛苦熬。

第二天夜晚,又继续把张加毅拖来审问,打手们先拧他的伤口,再由几个人压住他的双腿跪下,反剪双手揪住头发,另一女打手左右开弓猛打耳光,一连打了几十下,只打得两颊青紫,肿胀变形,几次打昏了过去,使用大头针扎脸,还用凉水往脸上洒,就这样一直折磨到清晨。张加毅由于嘴脸肿胀,几天无法进食,为了生存和斗争,他只得把窝窝头泡在水中,泡烂后勉强吞咽下去。

接着,另一受害者我,那天深夜提审时用的刑罚名叫“坐空心椅”。打手们先让我挺胸坐在

一张木椅上,双臂向左右两侧伸直,手心向下,然后抽走椅子成了骑马蹲裆姿势,这可是一种难度极大的姿势,没有一点武功功力的人是无法忍受的。当时我年龄已过五十,且患有低血糖症,很难支撑得住,加上两侧两个打手不停地用木棒敲打小腿肚子,当并举的双手稍稍下沉一点儿,就有另外两个打手用木板猛击手臂,手臂下边另有两个打手,各伸出一块无数铁钉钉尖朝上的木板等候着,手臂一下落就会碰着锐利的钉尖扎入手掌心。就这样折磨了不到五分钟,当时我已经头晕目眩,大汗淋漓,实在支撑不住了,喉咙里堵着痰气喘不畅几乎昏厥过去。幸好喉咙里的痰终于咯了出来,一个女打手恶狠狠地满嘴喷着吐沫星子指着地上的浓痰厉声喝道:“给我舔干净,舔了!听见没有?”就这样,我被整整折磨了四、五个小时。

被列入“杀人夺权黑会”参加者之中还有一个主要成员、故事片导演王冰,他年轻气盛,是一个初露锋芒的优秀创作人员。王冰从头一天关进“黑楼”就大声歌唱语录歌。打手们因为他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不敢禁止他唱,怕被戴上反对唱语录歌的帽子。王冰的歌声激励了被关押在这里的受害者们。

此外,被关押的人中还有一个摄影师蒋先德。他勇敢胆大,天不怕地不怕,比如他在航拍时敢把自个儿绑在机舱门口在舱外拍摄。在海上他敢冒着大风浪爬到最高的桅杆上拍摄。在战场上他经常出没在炮火连天的最危险的前沿拍摄。他小时在四川长大,家庭贫困,所以能吃苦。只因他不屈服于那些“左”派,敢于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故“左”派头头们对他恨之入骨,因而把他也编造进“杀人夺权黑会”的参与者行列。尤其是由于他的倔强不服气,所以挨的打、受的罪也比别人更厉害。

## 四

再说关押张加毅的房子左隔壁关押的是冯一夫,右隔壁关押的是我。我们被关在又憋闷又无聊的牢房里,张加毅不甘寂寞,无奈之中用手指敲墙壁,和隔壁的难友进行无言的交流,借此表示互相慰藉和鼓励。

“黑楼”刚关押“黑帮”之时,尚未最后完工,其中厕所还不能使用,谁要解手还得敲门向看守报告,然后由一看守带领着下楼到楼外小院里的墙旮旯方便。这一天,无意间我正对着窗外无聊地呆望,忽见张加毅到墙旮旯解手,他抬头望着我在窗前,趁着看守不备,掏出一个拇指大小的小纸包,对我举手摆了一摆后迅速将小纸包扔在高高的高草丛中。我心里纳闷不明其意,张加毅做了一个让我去收捡那小纸包的動作,我心中仍不明白这小纸包里是什么玩意儿。过了一阵我也敲门报告要解手。看守带我到了小院,当我走到墙脚,佯装提鞋,敏捷地拾起高草丛中那个小纸包藏进了口袋。

不久我方便完毕,怀揣着小纸包,往回走的途中,忽然一眼瞥见一个小窗户里王冰瞪着双眼,激动地用双手互相紧握,举过头顶不停地晃动,示意要坚持,要团结斗争。

我快步回到屋里,急忙打开冒着风险捡回来的那个小纸包,只见里面包着一小片约莫0.5厘米宽的小薄铁片。我反复看着这小铁片怎么也猜不透给我这玩意儿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忽听得张加毅又“咚、咚、咚”敲墙了,我就回敲了几下,可是张加毅这次敲的声响总觉有点儿异样,他敲的位置总是从半人高处往墙根方向引导,一遍,两遍,三遍,总是这样从上往下敲,我突然发现那响声最后的落点是墙根边的电插头盒板。我陡然醒悟,这是不是张加毅要我打开电插头盒板呢?可是盒板四角拧着螺丝钉,怎么打开呢?噢!明白了,那小纸包里的小铁片不就是拧螺丝的工具吗?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那电插头的位置正对着房门,万一拧螺丝的时候被发现,至少会遭到一顿毒打,而且张加毅苦心经营的联系方法也给破坏了。但机不可失,也只有冒这一次险了。我连忙端了一个浸泡衬衣的脸盆放在电插头盒板前,用后背冲着房门挡住了大门上玻璃窗上的视线,就是外边往里看也只能看到我在洗衣服。事不宜迟,我迅速用小铁片拧开了螺丝,取下电插头盒板,露出墙里一截装电线的黄铜管子,铜管里头没有安装电线还是空的。此时铜管内突然有一根细塑料管子伸了过来,塑料管的头里露出一截小纸卷。我迅速抽出小纸卷藏在衣袋里,又赶紧拧上了电插头



盒板,整个冒险过程仅仅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接着我稍稍调整了一下急剧跳动的的心脏,才坐下来掏出那张小纸片夹在“毛选”中偷偷细看,纸条上写着:“这个通道非紧急之时不要使用。楼内厕所即将完工,今后联络可写在手纸上,扔在手纸篓里。去厕所之前敲房门时以两长一短为号。”

我看完之后忙将纸条点燃捏碎放在自制的烟灰碟中,心中窃喜在这与世隔绝、极度苦闷之际,难友之间终于有了秘密通气的渠道,这是十分难得的呀。

张加毅也用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和冯一夫接上了关系,不过冯一夫要打开电插头盒板比我更危险些,因为他房内的盒板是在床板底下。

## 五

这些日子里,那帮“左派”头目非常焦急,因为自发布了“特号战报”和非法抓人关进了“黑楼”之后,搞不出这个所谓“8·16杀人夺权黑会”的有力证据,广大群众疑窦丛生,颇多非议。

这一天夜色已深,再一次提审张加毅,主审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阴阳怪气地说:“怎么样呀,这两天想通了没有呀?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彻底坦白交待你的罪行才有活路。”

张加毅用锐利的目光直逼“红眼”：“我没有罪,你们要我交待什么?”

“红眼”冷冷一笑:“我问你,你参加了8·16杀人夺权黑会没有?”

张加毅哼了一声:“谁参加了杀人夺权黑会,谁就是婊子养的。”

“红眼”一听火冒三丈,一挥手两个打手冲上来将张加毅踩倒在地,另外两个打手用橡皮钢丝鞭猛力抽打,一个人打累了另换一个人,轮换着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把张加毅打得浑身上下体无完肤,还不许出声呼喊,只要一张嘴想喊叫就用军用大头皮鞋踢牙齿。“红眼”声嘶力竭地喊:“你不承认参加黑会,铁板定钉,打死你白打,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布你畏罪自杀。”

此时,一个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什么特种兵的,解放战争中被解放过来的人物,施展他特有的伎俩,一种名叫“背猪”的刑罚。即双手拧住张加毅的胳膊往身后一背,从肩膀上摔过来扔在地上,接着紧抓脚脖子快速旋转,疼得张加毅只

好跟着滚动身躯,否则腿骨会折断。这样折腾了一阵,“红眼”一看火候到了,假惺惺上前阻止打手继续用刑。接着便把他们预先编排好的“黑会”故事,断断续续抛出来诱使张加毅入彀。张加毅当然无法承认这个天方夜谭,只是闭口不语。

无快亮了,一个头头假惺惺说:“好啦,今天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你也不好想想,坦白交待,从宽处理,拒不交待,死路一条。我们等待你悔过自新,你好好想想吧,机会难得呀!”

张加毅回到“黑楼”,带着浑身伤痛,越想越觉凶多吉少,于是他忍着疼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墙上那电插头盒板通道送到隔壁我的房中。我连忙展开一看,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看来狗日的非把我整死不可。老严,万一我被整死,望你照顾我的老婆孩子。”我一看不觉落下泪来,心想我的性命也不知能保得住否?

连日突击审讯几个人,都是用的这种手段,但都一无所获。

张加毅忍受着伤痛的煎熬,越想越觉得这道鬼门关很难过得去,看样子那些“左”派头头编造出了这个“杀人夺权黑会”的弥天大谎,骑虎难下,死活只有蛮干下去,自己如果就这样硬顶下

去,那只会弄得凶多吉少,怎么办?他伺机从秘密通道给冯一夫送过去一张纸条:“这样下去,看来王八蛋们是不会罢休的,我们非被打死不可,怎么办?”

冯一夫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回了一个纸条:“现在他们狗急跳墙,弄不出咱们的口供他们就会完蛋。我们就这样硬顶着很难过关,生杀大权在他们之手,将来非死即残很不值得。为了斗争策略上



严寄洲重访自己住过的牛棚

的需要,不妨暂时先承认下来。你可以将他们所透露的诱供内容编个材料,把材料告诉我和老严统一口供。还要设法和陈播、王冰、蒋先德他们联系上。”

此时我也通过秘密通道写了一个纸条:“如果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坚持斗争牺牲了还算个革命烈士。可是如今要是死在这些王八蛋之手,还落个反革命的名声,实在不值得。”

张加毅根据冯一夫的建议,立即将那些诱供中对方提供的“材料”,很快编出了一套交代“罪行”的内容,并抄写给冯一夫和我,让我和冯一夫把内容背熟,以便应付再一次审讯时之用。

不久,“黑楼”里的厕所全部完工了,按照老“王法”,上厕所要敲门,然后开门去方便,完毕后回房锁上房门才允许第二个人再去。张加毅立即通知冯一夫和我,停止使用电插头暗道,改在厕所内,联络纸条可放在手纸篓里,并嘱咐在手纸上还要抹上粪便,以免被发现,暗号是敲门时先两下后再一下。

事有凑巧,这一天我按规定走进厕所,刚进门抬头一看,意外发现蒋先德正在洗手,我一下子先是愣住了,但立即机警地指了指手纸篓:“纸条扔在这里,抹上大便,暗号敲房门先两下再一下……”话音未落,厕所门突然被推开,大概看守发现我进去时蒋先德还未曾出来。一个看守凶狠地大吼:“快滚!”蒋先德连忙溜烟跑了出去。我心中暗喜。这意外的巧遇终于和蒋先德联系上了,接着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张加毅。

自从我们四个人联系上之后,经过一番议论,最后全都“低头认罪”,承认参加了那个“8·16杀人夺权黑会”。只苦了陈播、王冰等人,和他们联系不上,他们只好多吃些苦头,还埋怨我们四个人没有骨头。

## 六

再说在全厂广大职工中,9·20那天发布“特号战报”时,把“走资派”和“黑帮”一抓,当天除了一些不明真相者,左右摇摆者和看风使舵者纷纷投向“造反左派”的怀抱之外,仍有不少头脑清醒者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个“黑会”,因之仍坚持进行说理斗争。可是如今冯一夫等的认罪

书一出笼,犹如给那些和“左”派不同观点的群众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于是又有一些人倒戈投降,另一些则半信半疑暂时缄默。这使得“左”派们得意洋洋,胜利夺权已经在望。

“左”派们紧接着乘胜追击,继续逼供以便不断充实伪证词。而我们这些“罪犯”也不断串供,不断“交待”罪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待罪行”,使那些得意忘筌之徒欣喜若狂,可是却引起一个老谋深算的头头的怀疑,他和另几个头头商量:这“8·16杀人夺权黑会”分明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神话,可是怎么会逼供出来的口供却基本一致呢?答案只有一个,“黑楼”里一定有串供的秘密渠道。为了摸清情况,马上命令那几个得力干将仔细侦查。

这天一个头目走进张加毅的住房内,两只贼眼骨碌碌地往门上、窗上、上下左右仔细察看,突然他的眼神停留在床边墙根的电插头盒板上,他眉头一皱若有所思,迅速离开了房子。这一瞬间的情景,机警的张加毅全都看在眼里。他立即敲门报告上厕所,迅速用密信通知冯一夫和我,要我们立即把电插头留下的指纹擦掉,再洒上尘土,冯一夫和我当即照办不误。

不一会儿,果然头目和两个看守戴着白手套,神秘兮兮地走进冯一夫、张加毅和我的房内,二话不说,轻手轻脚把电插板上的插头拔了下来,用白布小心翼翼包上插头走了。当然这些笨蛋们一无所获。

“左”派头头们虽然为挖不出“黑楼”里的秘密串供渠道感到不安,但这也无所谓。反正“黑帮”们已经承认参加了所谓“8·16杀人夺权黑会”的罪行,而且在“认罪书”上签名画押公布于众,铁板定钉,再也翻不了案了。

“造反派”有了第一阶段的“胜利”,尚不甘心,还必须对所有关押在“黑楼”里的“黑帮”和“走资派”加紧逼供,为他们稳坐宝座扫清道路。于是他们施出了浑身架式,把日本法西斯的、国民党特务的以及从电影中看到的德国盖世太保们的各式各样酷刑,一一如法炮制。而且他们还有不少发明创造,试举几例。

盛夏时节,他们在冯一夫屋内换上了一盏100度的大灯泡,打开全部铁窗,把冯一夫的双手反剪,脱光衣服,只剩一条裤衩。不久已经满屋



复职后的严寄洲

蚊子,他们立即关闭窗户扬长而去。此时屋内无数蚊子围住冯一夫猛力叮咬,咬得他全身到处是红肿的小包,不久小红包连成片形成一层半透明的大脓包,痛痒无法忍受。

另一种刑罚更是新奇,在“黑楼”外有一片桃树林,桃子熟了,几个“造反派”摘了一些桃子,还端着一脸盆清水来到冯一夫的屋内,一个“造反派”宣布:“今天文斗不搞武斗。”说毕把冯一夫捆住双臂,几个人拿着桃子往冯一夫光着的身上来回磨蹭。等对方已痛痒难熬时,他们在清水里把桃子洗净,一边啃吃,一边观赏冯一夫痛苦的表情。

再一种刑罚是审问行政科长王全(因为他同情陈、冯、严、王、张,公开说没有8·16黑会),四、五个人各拿一枝大头针往他的光身上扎,只扎得浑身红点,气氛非常恐怖。

这些“天才的发明”,真叫闻所未闻。连国民党反动派在“上饶集中营”和“渣滓洞”中的刑罚都难以比拟。

“黑楼”可谓暗无天日,不少好同志被折磨得半死不活,有的被打得腕部骨折,有的腰部被打伤,有的耳朵被打聋,有的眼睛被打坏。而那些动刑的凶手中,有些原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有些是有杀父之仇、对共产党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反动分子。其实这些人才是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可是如今却居然被选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有的入了党,有的进了基层领导班子。冯一夫讲了一句最典型的话:“咱们厂里,如今是国民党专了共产党的政。”

## 七

在这整天整夜无休止的刑讯逼供下,蒋先德这些日子心境特别不平,前几天虽然同意了冯一夫等提出的斗争策略,承认了自个儿也参加了那个“黑会”,心中总觉得不是味儿,不甘心就这样屈服。他写条子告诉冯一夫、张加毅,自己有想逃跑的意思。冯一夫的回音是“不可”,张加毅则“赞成”。蒋先德去意已定,下决心寻机逃出“黑楼”,以便在外头得到社会上的帮助,把厂里颠倒黑白的事公布于众。

这天机会来了,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当天色将黑未黑之时,蒋先德敲门要求解手,在卫生间里趁门外看守疏忽不备,迅速从厕所的窗户爬了出去。接着爬上围墙跳了出去,墙外是一片玉米地,他飞快从地里向远处奔跑。这时候“黑楼”里发现蒋先德逃跑了,顿时像开了锅似的叫喊开了,高音喇叭紧急呼叫几个战斗队集合追寻,可是为时已晚,蒋先德已经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头头们当然不能轻易放过,立即派人搜查蒋先德城里父母亲的家,并对过去和蒋先德过从甚密的好朋友的家进行监视。在“黑楼”里,两个头头率领一帮看守到关押蒋先德的小屋里查看,他们将蒋先德的被褥和枕头全都撕开了,不料竟在棉絮里发现了好几张纸条,这些纸条全部是冯一夫、张加毅和我写的串供条子。“左派”头头一看欣喜万分,在证据面前,我们只得承认串了供。

再说蒋先德逃到郊外,在一个好友家中隐藏下来,连夜赶写了几份大字报,揭露厂里恶人当道,制造假案陷害革命干部的内幕。分别张贴到王府井和西单等地方最显著之处。这下子可把厂

里的“左派”们气坏了,他们利用已经夺了权的势力,串通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一个姓李的头头,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各地下达了通缉令,分发蒋先德的照片,非把蒋先德捉拿归案不可。

与此同时,厂里又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特大陷害事件:厂里有一个本来和我们这些所谓“黑帮”毫无关系的行政干部,他在文革一开始就和那些“左派”观点不一致,而且言辞很尖锐,因而也被诬陷参加了“8·16杀人夺权黑会”,被关进了“黑楼”。这个行政干部的妻子是厂里的工人,站出来和“左派”说理斗争,因而对她也恨之入骨。为了打击这个“黑老婆”,“左派”挖空思想出了一个恶毒的绝妙办法。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一个搞专案的头目用甜言蜜语骗取了“黑老婆”的年仅四岁孩子的信任,把孩子骗到屋子里,拿出糖果和饼干给孩子吃,一面教唆孩子学他说的话,那头目说的是攻击毛主席的最恶毒的话,不懂事的孩子学说不误。最后还教孩子说:“这是妈妈教我说的。”头目和孩子对话时,旁边有人全部录下来,然后抹去头目的声音部分,只留孩子说的话,并接连在一起,于是一个反革命攻击毛主席的铁证出笼了。

在这段时间里,陈播、王冰不了解冯一夫、张加毅、蒋先德和我串供的情况,因而他们也无从交待,再用刑也逼不出任何口供。“左派”们迫于当前首要任务是集中全力捉拿蒋先德,先把陈播搁下,反正他是铁定的走资派逃不脱了。而对王冰,“左派”中一个老谋深算的头头出主意,针对他重感情和年轻气盛的特点,使用温和拉拢的方法诱其入彀。先是通知他的家里,可以经常送一些诸如萨琪玛、核桃酥一类平时他爱吃的食品,还送一些当时比较高档的牡丹牌香烟以及茶叶之类的东西。同时“左派”派头头会同军委办事组那个姓李的头头,经常半夜三更轮番来到王冰屋里进行“开导”。其内容则是:“你参加8·16杀人夺权黑会是被迫上了当,只要坦白交待就行了,你马上可以出去当导演拍片子,还保留你的党籍……”以此来软化王冰的对立情绪。

忽然有一天,“左派”们突然欣喜若狂地通过高音喇叭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说今天把“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蒋先德捉住了!”

“造反派”把他推进一辆车内。捆蒋先德的

是种名叫“法绳”的麻索,捆人的小老头是电影厂的杂役。他自称是袁世凯当总统时专门从大狱绑人到菜市口杀头的牢头。他熟练地把绳子勒在蒋先德的咽喉下边,使他的头不能稍抬,稍抬就痛得咽不下气,稍低就不能呼吸。对死囚押赴刑场时不怕罪犯喊叫,因为根本喊不出声来。这么一个牢头,“文革”期间却能在电影厂大显身手,可见掌权的“左派”们实在会挖掘人才。

回厂后,一批似狼如虎的打手们押着蒋先德连踢带推地进了录音棚,二话不说抡起棍棒劈头盖脸地一阵狠打,只打得蒋先德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就这样一连打了三天,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将一个小窝头扔在蒋先德面前的地上。此时蒋先德已被打得遍体鳞伤,还多次晕厥过去。但歇了一会儿苏醒过来时,他心中很清楚,必须活下去,唯有活着将来才有可能跟他们斗争。他咬牙忍痛伸手艰难地拾起地上那个染着灰尘的小窝头,在衣服上擦了擦,勉强张嘴强咽了下去。

三天之后,据说已经把蒋先德的傲气打下去了,才连拖带拽地把他押回到“黑楼”,关押在楼梯边的一间只有二尺宽、五尺长的储藏室里。这屋子本来是摆放扫帚、拖把等杂物的,如今要塞进一个大活人实在很困难,蒋先德只得蜷曲着身躯,侧面躺在水泥地上,身下没有铺的,身上没有盖的,也没有枕头,身上穿着结了血痂的衣服,强忍着钻心的痛楚,以臂为枕侧着躺在地上。这样假如天气不热时还能勉强忍受,可是到了炎炎盛夏,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将嘴凑到门缝呼吸到一丝微弱的空气。

总之,“黑楼”是一座惨绝人寰、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从1967年9月2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69年4月5日。尔后全体“黑帮”和“走资派”又被武装人员押送到山西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并继续“触及灵魂”的无休止的批斗。

在我们这个小小电影制片厂,在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中,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精神失常,单是不堪凌辱而含冤自杀的就有关剧和导演四人。厂里大批创作骨干不是遣送还乡,就是调到地方厂去了。这一段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血的教训,应该永远记取,使之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 吴思)

# 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

● 谷鸣

抗战的1938年初,在武汉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了拯救难童的母亲行动。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多次参加有关座谈会,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女共产党员安娥、陈波儿、曹孟君、沈兹九、徐镜平、杜君慧以及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四处奔走,争取支援。在多方努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于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推举李德全为主任委员。当时很多人希望孙夫人宋庆龄来领导保育会,但考虑到推动国共合作和更有利于工作开展,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和沈兹九去见宋美龄,希望她来主持保育会。宋美龄接受邀请,同时提出将保育会隶属于她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而这个组织的基础即是她先前创办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正式宣告成立。宋美龄在会上作了题为《谨为难童请命》的讲话,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拯救难童义不容辞的责任。会议选出了包括国共两党和无党派在内56名妇女界人士为理事。会后,宋美龄特意会见了邓颖超,表示要“真诚合作,全力抢救难童”。

3月13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昌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选出17名常务理事,5名候补常务理事。后来在9月中旬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宋美龄、李德全被一致推选为正、副理事长。为争取多方支持赞助,扩大影响,会议还聘请了286位名誉理事,其中包括国共双方的领导人、军政要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和侨界人士、国际友人和驻华使节等。

战时儿童保育会一成立,即面临两项紧迫的任务:一是募捐;二是抢救战区难童,建立保育院接收难童。由于当时国家所处形势和政府财政状况,拯救难童的经费基本上靠募捐。按每个孩子每月最低生活费5元计算,全年需60元,面对千千万万要救助的难童,所需经费可想而知。在保育会成立前后,已不断有各界团体和人士为难童踊跃捐款,上至名流,下至百姓,都表现出了炽烈的爱国之情。这期间,为募捐而多方奔走的黄琪翔将军夫人郭秀仪,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和女儿冯弗伐贡献尤为突出。从3月10日至4月12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募款总计94845.23元,其中宋美龄个人捐款英镑10镑、美元15元、现款26389.63元,数额居首位。

1938年4月底,中国军队在徐州、郑州一线奋力抗击日军,战时儿童保育会即派出两路精干人员前往战区抢救难童。一路由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带队,奔赴徐州、台儿庄地区;另一路由保育委员会副主任唐国桢和宣传委员会委员徐镜平率领,到达郑州和开封一带。她们历尽艰辛,先后抢救出400多名难童,从枪林弹雨中撤退至武汉。1938年3月,保育会在汉口原日本同仁医院建立了临时保育院,以后陆续接收了550多名难童。5月1日,临时保育院举行正式开院典礼,蒋介石、宋美龄出席了典

礼。

战时儿童保育，只是宋美龄整个抗战时期工作的一部分。她以所处的显要地位和充沛的精力，在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参与空军建设，争取国际援助，慰问伤兵，救助难民。特别是在妇女工作上，更是体现了她的领导意识。1938年5月底，宋美龄以个人名义在庐山召开了妇女座谈会，邀请40多人参加，包括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国民党方面的沈慧莲、唐国桢、陈逸云，救国会代表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安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邓裕志，妇女界知名人士李德全、吴贻芳、俞庆棠，以及各地妇女代表雷洁琼、熊芷、张素我、曾宝荪、劳君展、杨崇瑞等。会上宋美龄提出，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全国性总机构。经各方协商，会议通过了沈兹九起草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新运总会妇指会进行了改组和扩大，下设九个组和一个联络委员会，宋美龄仍任指导长。

从1938年4月起，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各地

分会和保育院陆续建立起来，接收难童。到1940年3月先后有江西、安徽、广东、四川、香港、福建、贵州、广西、成都、浙江、湖南、山西、陕西、陕甘宁等分会成立，下辖37所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也有9所保育院。另外还有接受总会领导、由基督教会创办的贵州伯特利保育院；由刘王立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丈夫，个人创办的湛恩儿童教养院等。总计收养儿童15000多名。1939年10月20日，宋美龄在重庆求精中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保育院长会议，会议交流了保育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加强保育工作管理的各项决定。宋美龄还数次亲自视察保育院。1938年12月25日，在广西桂林遭到敌机轰炸的第二天，宋美龄就在保育总会副理事长李德全和广西分会理事长郭德洁的陪同下，视察了桂林第一保育院。1939年8月28日，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孔祥熙、宋霭龄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参观重庆歌乐山山川一院。1940年2月，宋美龄赴香港短暂休养，特意视察了香港保育院。尤为难得的历史镜头是：1940年4月3日，宋氏三姊妹宋



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会主要成员在汉口合影。前排左起：赵一恒、吕晓道、陈纪彝、沈娘九、徐镜平、钱用和、陈逸云；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杨崇瑞、吴贻芳；后排左起：孟庆树、刘清扬、唐国桢、沈慧莲、曹孟君、郭秀仪、史良、邓颖超

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一起来到歌乐山的川一院,与孩子们共度儿童节。

1938年5月,日军对武汉轰炸加剧,保育总会开始分批将汉口临时保育院的难童由长江转运入川。6月保育总会在宜昌设置接运站,接送入川难童,由方雪琼、徐镜平负责。她们冒着敌机轰炸,克服运输船只紧张等困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至1940年6月宜昌失守前,成功转运汉口临时保育院和其他保育院的难童,以及在沙市收容的难童和在襄樊抢救的难童总计15000多名。1939年春末,日军向鄂西北第五战区进攻,均县保育院处境危险。院长罗叔章向保育总会请示后,带领500多名难童向重庆转移。一路上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大力援助,经宜昌转运站安排,乘民生公司轮船于30日到达重庆,正赶上敌机对重庆大轰炸,根据总会指示,马上又向江北大田坎转移,路遇宋美龄车队,宋美龄了解情况后,立即帮助拦截车辆,又让随从找食品给孩子们充饥,师生们乘车顺利到达大田坎。后来在1940年,香港保育院向贵州转移。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战役,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保育院纷纷转移。每次转移,保育院师生们都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艰难跋涉。

战时收养的难童实行“保教合一”,把他们培养成为抗战建国的接班人。宋美龄指出:“现在孩子们无家庭教育,全靠保育院,我们是对他们负了相当责任的,我们应使他们自动的有能力的做一个国民,才不负社会及捐款人的希望。”保育总会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主持制定了保育院“教导实施大纲”,保育总会据此编写了教育保育生用的统一教材《抗战建国读本》。各保育院首先强调“加强儿童的民族意识,增强其国家观念。”要“培养报效国家民族的英勇坚毅、刻苦耐劳的新生一代国民。”在具体方法上,“劳动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集体生活和健康卫生习惯的培养,针对‘问题儿童’的措施等,都是十分有特色的教育实践。宋美龄在保育院长会议上提出过具体意见:“一是必须注意儿童的健康和生活习惯,二是我们要培养儿童的人格和启发儿童的义务观,三是我们要使儿童们知道国家的困苦和物力的艰难,要使他们特别刻苦

和节约。”从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和分会所属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儿童29849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为国家各个领域里的杰出代表和合格人才,以自己的勤奋工作来报答当年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妈妈们。

战时儿童保育会集合了中国妇女界的精英,共赴国难,拯救难童,为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有不合谐之音,国民党右派的触角也伸进了保育会。在总会,据保育会总会理事、秘书处干事赵一恒回忆:“一到开会讨论经费的事,几个国民党人就拼命吵,说是不能给陕甘宁边区的保育院经费了。宋美龄不表态,我不怕鬼神,拿出记录说:‘每三个月发一次经费,凡是保育院,都享受平等待遇。’坚持要给边区保育院经费。”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各保育院一批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纷纷撤离。宋美龄在对待保育院内国共双方的矛盾时,保持了一种中立的姿态。因为她心里清楚,凡是被认为是共产党或左倾的保育院院长和老师,也都是全身心投入保育事业的人才,在她出面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事业中成绩卓著。例如宋美龄曾在第一届保育院长会议上公开表扬直一院院长罗叔章,说她带领500多名难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两千里跋涉,从湖北均县安全转移到重庆,是立了大功的。

从整个战时儿童保育事业来说,宋美龄的领导确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由曹孟君主编的1946年第1期《现代妇女》载文说:“全国保育工作,都在蒋夫人的领导之下。这是保育工作尚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有蒋夫人在上头,有些从政治上来的困难就比较好避免一点。”1988年,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邓颖超致函宋美龄,信中说:“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如今65年过去了,当年保育总会的理事,多已作古,而理事长宋美龄已是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岁老人,被她参与救助过的众多难童,也大都年过古稀,他们衷心祝福他们的蒋妈妈健康愉快长寿。(责任编辑 庄平)

# 郭小川的三起三落

● 许人俊

郭小川,我国文学界富有才华的诗人。抗日战争初期,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平,几经周折辗转,终于抵达山西太原,投笔从戎,成为王震将军三五九旅的一员,后任王震的机要秘书。在那火热的革命年代,他一手举枪,战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手拿笔,饱蘸一腔热血,写下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鼓舞部队奔向战场,英勇杀敌。人们赞誉他是战士诗人。

因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年轻有为,充满朝气,深受王震、胡乔木、陆定一等人器重。

共和国诞生后,他不负众望,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一度成为文艺界一颗光彩照人的明星。

然而,随后在数十年的风雨岁月里,他却屡遭磨难,时浮时沉,经历着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最终在57岁时英年早逝,令人极为惋惜。

## 红杏出墙受青睐 反右落马遭灾难

建国初期,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事业,党中央抽调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到中央宣传部工作。著名女作家丁玲曾任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任该处副处长。

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丁玲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结果遭上纲上线,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开展大批判。年仅35岁、风华正茂的郭小川天真地信以为真,在一次反丁、陈斗争大会上,他响应号召,积极发言。因语言尖锐,旗帜鲜明,斗争性强,很受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欣赏,认

为“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他年轻有为,有朝气,有才干,是左派人士,研究决定将他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任党组成员兼秘书长。

郭小川为人朴实,待人热情,没有架子。初到作协,公家为他派了小车,他不坐,天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风雨无阻。第二年,他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工作任务更重,面临的难题更多。丁玲等人不断申诉,要求复查、甄别就是一大难题。

中宣部和作协决定,成立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组,受理此事。张的资历比周扬老,他主持的甄别组曾找100多人调查,对1955年大会批斗发言中涉及的人和事逐一核定,发现许多不实之处,不少人都把原先发言中最尖锐的词句删去。核实后的资料,重新打印,初步结论为:丁、陈二人不是反党集团。调查组将初稿交作协党组,确定由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修改。

“丁、陈反集团”当初是上面定的,已闹得全国沸沸扬扬,人人皆知,如今查明不是反党集团,如何措词,确实让郭小川伤透脑筋。加之,通过一年来的工作实践,他了解到文艺界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深感实际情况并非像一年前批斗大会说丁、陈的那么严重。这时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文字经他改了一次又一次,始终还拿不定主意。他寻思:既然反党集团的帽子成立不了,那只能换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也许上面好通过。他又改了七、八遍,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为丁玲写了一个犯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甄别结论。谁知送到中宣部审查,通不过,郭小川一筹莫展。恰好,一次讨论会

上,周扬听到有人提出“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一词,颇感兴趣,示意郭小川可按这一折衷用语修改结论,他如释重负,迅速照办。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6月8日,周扬、邵荃麟、刘白羽一起宣布为丁、陈平了反。

此时,政治风云又突变,丁、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郭小川因在早先写丁、陈平反草稿中,有“向丁、陈道歉”的意见而遭批评,被认为在复查丁、陈反党小集团中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经不起考验”。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批判后,全国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郭小川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不得不被迫检查,承认:“我写的丁、陈结论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文件,我不仅把丁、陈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还要组织上向他们道歉。”

更让他迷惑不解的是,两年前他利用夜晚和星期天,呕心沥血创作的长诗《一个与八个》,内容是说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时,混淆是非,把一批好同志视为敌人关押审讯。一次白匪进攻,犯人奋起英勇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几人生还逃出。诗歌初稿完成后,他没有急于发表,先送著名诗人臧克家、徐迟过目,征求意见。他们均赞不绝口,说是好诗,富有感染力。半年后,他又送周扬审阅,周一一直未置可否,只是说有人不赞成这类题材。然而,一年多后,全国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大批彭德怀万言书时,作协机关却把该诗稿赶印出来,作为反面教材,开了大会小会七、八次,批判他是“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有的领导人甚至说:“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反右斗争的作协党组书记写的!”“如果当时发表了,可能划为右派分子。”

作协党组也严厉批判,认为郭小川的错误是:对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在反右斗争中有过右倾妥协的错误;在日常工作中有放弃政治领导的右倾表现;在创作思想上有严重错误,几次检查均不深刻等等。

他检讨:“这是严重的颠倒黑白,诬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但内心一直想不通。他曾设法调离这个复杂的环境,到湖北省委王任重书

记和广西刘建勋书记手下工作。王任重欣赏他的才华,曾劝周扬放他一马,去湖北省委当秘书长。令他伤心的是,不仅工作没有调动,反而被批判“背着领导搞非组织活动,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和党离心离德”。这一打击使郭小川更为心灰意冷。

### 战士诗人显才华 江青下令严追查

1960年春,我国受到天灾人祸的惨痛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政治气氛开始缓和。据说,当时有人曾把郭小川写诗受批判之事,传到了毛泽东耳边。毛主席主张诗人应勤于思索、幻想,多一些浪漫,因此表示:“应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此后,作协对他的批判就草草收场,大家见面都笑脸相迎,客客气气,只字不提昔日批判的右倾问题。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周扬亲自找他谈话,劝他不要调走。1962年6月,作协又以党支部名义向郭小川道歉,承认当初批判不当。

这些做法,虽然让他受伤的心灵稍有宽慰,但留下的伤痕毕竟太多,他仍然执意要求调走,寻找一个自由的生活空间。同年10月,他终于在胡乔木的帮助下,调到《人民日报》当特约记者。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长王震邀其同行,赴小兴安岭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使他得以深入基层,接触先进人物,搜集创作素材。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还安排他次年飞往大西北,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情况。走南闯北,使他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热浪。他创作热情高涨,沿途奋笔,先后写出了《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林区三唱》、《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他的作品充满激情,文笔优美,情节感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胡乔木曾向中央高层领导热情推荐他的《厦门风姿》,并相互探讨文艺创作问题。

郭小川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他的名

字更闪光彩,引人注目。他曾参与大型歌舞《东方红》剧组的工作,八一电影厂邀他撰写了《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1965年,他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健儿们,写了《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发表。文章充满豪气,情节动人,文采飞扬,轰动一时,郭小川三个字更是名扬海内外。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骤然而至,各单位都在划分黑线、红线人物,揪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因一直满怀政治热情,注重“突出政治”和“高举红旗”,故而被称为战士诗人,列为红线人物,初期未受任何冲击。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滚滚恶浪也开始向他奔袭而来。一天,报社贴出大字报,要求“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示众!”接着批斗、审查,让他写交待材料,然后又被揪回作协机关监督劳动,打扫厕所。林彪一号命令下达,他又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审查。他虽身陷困境,但充满政治热情和富于诗情、思索的性格并未改变,劳动之余仍不忘写诗。一次,他写诗贴在墙报上,歌颂《长江边上的五七路》。诗中说:“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军宣队却认为这是诗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他不安分劳动改造,梦想回北京搞复辟,于是组织大批判,弄得他哭笑不得。

郭小川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汉军区。当时是军队掌大权的时代,凡事只要军队领导机关出面,一切问题都好办。1971年,武汉军区决定向咸宁干校借他写《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说词,军宣队从命,郭小川也不推辞,他用诗人的激情很快就圆满完成了解说词的创作使命。影片放映后,军内外广泛赞赏,武汉军区赢得了光彩。兄弟军区羡慕不已,也争相到干校借调。那时到处时兴“借调”,不久兰州军区也借他写影片解说词,影片上还特地写了郭小川的大名。随后,沈阳军区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也不甘落后,紧追不舍,他又一次成了政治上的红人。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似乎已成了定律,郭小川也不例外。正当他在“文革”时期创作登

上新高峰时,等待他的却是可怕深渊。一天,深居首都钓鱼台的江青,突然心血来潮要看电影。工作人员匆匆忙忙为她放映军队新摄制的纪录片,她看着看着猛然发现影片上有郭小川的名字,勃然大怒,尖声责问:“郭小川满天飞,又窜到西北去了,谁叫他到兰州去的?要追查!”

从此,各大军区只得小心翼翼,对郭小川敬而远之,谁也不敢再冒风险借调他了。他收拾好行装,返回湖北咸宁干校,继续埋头劳动。好在他群众关系好,历史又清白,查来查去无任何问题,最终宣布恢复其党组织生活。消息很快传到国家体委机关《体育报》的同志精神为之振奋,大家知道他过去曾到《体育报》帮助工作。他回北京后,又满腔热情,精心撰写出《笨鸟先飞》,迅速在《新体育》上发表。不久,他写的《万里长江横渡》长诗,又在《体育报》上发表。

谁知这诗文又激怒了江青。她原以为上次发火后,郭小川已销声匿迹。然而一年后,他居然又登上新闻舞台,江青岂能容忍?认为郭小川不是孤立的人物,他与高层“走资派”有联系。他的出现,表明“走资派还在走”。于是江青再次下令追查郭小川是怎么借到国家体委的,指出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

《体育报》一听吓了一跳,原来还准备让他写庄则栋成长的续篇,现在只好放弃。不久,文化部根据江青的旨意,勒令他重返湖北咸宁干校,再次隔离审查。

前几年干校几经审查,本已无事的郭小川如今怎么重新隔离审查呢?正当他迷惑不解时,专案组根据江青的指示,要他交待与林彪、叶群的关系,这又让他哭笑不得。

##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原来,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学习时,与叶群在同一处山上的相隔较远的窑洞住,当时叶群是杜惠(郭小川夫人)的朋友,有过一般往来。不久,林、叶结婚,后来因战争,天各一方,两家再未见过面。1949年林彪率四野进军武汉,叶群也抵达武汉,安排在中南局宣传部工作。恰巧郭小川也在那里,有过短暂共事。1960年国庆节,郭、叶两人分别多年后在天安门观礼时偶然相

遇,曾有过一些交谈。叶群说林彪想找一些生动的语言教育战士,叶要郭介绍中国小说。郭也只说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书。后来,不知何年何月,叶群在笔记本上写了“文艺问郭”四个字。这个“郭”指何人,谁也闹不清。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认为这个郭就是郭小川,按江青批示专案审查。更荒唐的是,他们认为郭小川一首诗中“崭新崭新的太阳”是歌颂林彪。于是,他再度身陷困境,他知道这是江青利用“九·一三”事件借题发挥,企图嫁祸害人。查了一段时间,因查无实据,同意让他暂回北京看病。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郭小川心烦意乱,莫名的苦恼在心中理不清,挥不去。无奈中,他在北京看病期间,通过秘密渠道向老领导写信吐露难耐的忧郁。此时,王震在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列为国务院领导成员。他同情这位有才华的部下。这时,党内高层斗争极为激烈,“四人帮”正积极策划篡党夺权,两股政治力量暗暗进行较量。王震与纪登奎副总理通气后,多次找郭小川谈话,要他给中央写报告:要求转到女儿插队的河南农村长期落户,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力争在改造中为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郭立即照办,一份报告经王震送达纪登奎手中。

1974年1月10日,纪登奎在郭小川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并让中组部为他办理调动手续。一次,国务院开会,纪登奎对王震说:让郭小川到河南农村去锻炼,我已同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说了,让他安排。

事后,王震让秘书伍绍祖将有关材料立即转往河南省委,同时又找郭小川谈话,动员他迅速离开北京这个政治漩涡,到河南农村去避风,免让“四人帮”找麻烦。

这年3月,郭小川尚未来得及办理调动手续,他们就急令文化部于会泳责成郭返回湖北干校,随后又在内部刊物《文化动态》刊登《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江青批示组成专案组对郭进行审查。郭小川刚回干校,即被隔离审查,勒令交待搞复辟活动的反动罪行。但这时干校已人心涣散,缺少战斗力。年底,中央批示五七干校解散,文化部咸宁干校也匆忙收摊,

大部分人回北京分配工作。郭小川例外,他被从湖北咸宁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监控。好心人悄悄嘱咐他:平时不要外出,不要说话,不要写东西,免得招惹是非。于是,他在天津静海县干校整天装聋作哑,满腔愁云,闷头抽烟,过着一种孤寂、忧伤的日子。

幸好不久,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接着又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全国政治环境出现松动,天津静海干校对郭小川的监管逐步放松,家里人可以来干校与他同室交谈,他重新感受到家庭温暖。

不久,毛主席批评“四人帮”对电影《创业》“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主席还批评文艺界“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批评。”

郭小川在毛主席这些讲话的鼓舞下,精神昂扬地创作了《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之六》两首诗,还写了万言的批评文化组文艺政策的《学习笔记》。

1975年国庆节前,静海团泊洼干校到处人心欢畅,金秋果实累累,稻谷飘香。10月6日,中央专案组突然派人来到干校,向他宣布审查结论。令他奇怪的是,往日专案组总是瞪着眼珠,拍着桌子,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逼他交待问题,如今却和颜悦色宣布:经审查一切没有问题。不仅没有留任何尾巴,而且连缺点、错误之类的字眼都没有提。更让他吃惊和兴奋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还在审查结论上批示:“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纪登奎是想借此将他调离“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

郭小川一身轻松,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就匆匆去见王震。时任副总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终于摆脱了重重审查,获得自由,握住他的手表示祝贺。不久,又让他与纪登奎见面,郭与纪早就相识,是老朋友,两人交谈时又见到了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等几位副总理。几位副总理向郭小川了解文艺界的情况,郭小川如实谈了对江青“四人帮”扼杀文艺的看法。由于国务院领导已正式批准他调离文化部,故而安排他到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住下,并配了小汽车供他

使用。

尽管“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连续批评,但他们并不收敛,因此,纪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尽快离京,到外地避风。起先让他到河南,然后去湖南、广东农村搞调研,并特意嘱咐万万不要去上海。后来,因斗争形势出现新变化,又紧接着通知他,只能在女儿插队的河南林县活动,这样名正言顺,不至让“四人帮”找麻烦。

## 林县避风迎曙光 英才不幸逝他乡

他离京时,王震再次面谈,嘱他在下边言行谨慎,少讲话,少接触人,等候时机,听从安排。

林县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县城,那里的人民战天斗地,修建了著名的红旗渠,享誉海内外。由于省委刘建勋书记按中央指示,向县里打过招呼,所以,郭小川一到,就受到热情接待,安排在接待外宾的招待所吃住。他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加之,当时文艺界有些人在林县红旗渠搞创作,体验生活,大家常在一起就餐,有说有笑。慢慢地他就放松警惕。他曾向北京电影厂摄制组的朋友,谈论江青过去的私生活,说毛主席最近批评过她,还说邓小平同她有矛盾、有斗争等等。这些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都是当时忌讳的新闻,谈论时难免会让县里工作人员听到一句半句。他们认为这些新闻并非空穴来风,必有来头。于是怀疑郭小川是邓小平线上的人。尤其是当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调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后,县委对他更为警惕,态度也开始有些冷淡。在林县体验生活、搞创作的老作家华山,对此

较为敏感,暗暗为他的言行捏汗。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对郭小川大发脾气:“你对年轻人瞎说什么?!捅出去就得掉脑袋!”

果然,不出华山所料,不久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力追查政治谣言。郭小川后悔没按王震要求谨慎从事,给自己和别人添了麻烦。他连夜给一位好友写信,叮嘱他把不久前写的信烧掉。因为郭小川在信上写道:“如果,他们(指‘四人帮’)上台,我会上太行山打游击。我相信我拿枪杆子绝对不比拿笔杆子差!”

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不幸病逝。郭小川悲伤得肝肠寸断,在林县招待所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整天不思茶饭,他耽心“四人帮”会趁机把邓小平等赶下台。首都开追悼大会那天,他抱着收音机听实况转播,密切注视时局变化。当听到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时,他那颗久悬的心终于落地宽慰,然后长叹一声:“小平同志没事了!”夜里,他伏案写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接着复写、油印数十份,邮寄给亲朋好友。那时,全国政治气氛相当紧张,“四人帮”正在兴风作浪,好心人劝他不要印,不要寄,不要出声,静观事态发展。而他不以为然,坚定表明:“我就是要这样,这是我的声音,我的态



1963年郭小川(中)与王震(左)、贺敬之在苏州

度。你们别管！我这条命，过去打仗时没有丢，现在就得干！”大家佩服他的英雄气概和骨气，也为他的冒险举动捏一把汗。

在全国为周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与人民为敌，百般阻挠群众悼念活动。首都群众忍无可忍，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抗暴活动。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不畏强暴，冒险到广场抄录了许多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连夜乘火车赶到林县。郭小川一边猛抽香烟，如饥似渴地细读诗词，一边默默地思索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那时，他吃不下，神经严重衰弱，夜不能寐，终于积忧成疾，住进了医院，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又遇上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更是痛上加痛，伤感至极，整天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连续不断的精神打击，使年仅57岁的郭小川突然变得无比衰老。他举步维艰，行动缓慢，病情加重，心思重重，夜里长时间不能睡觉，要靠服安眠药才能入眠。

偏偏此刻，“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随从于会泳等，又派两人专程到林县找他调查有关情况，这两人赖在招待所迟迟不走，坚持要同他面谈。幸好医生同情郭小川，紧密配合，让他事前服了一点安眠药，调查人员谈话不久，他就昏昏沉沉，思维混乱，口齿不清。调查人员无奈，大失所望，悻悻而返。

于会泳等当然并不甘心，他们妄图从郭小川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向上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后台。他们明目张胆声言：“查郭小川不是目的，他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另一人则阴阳怪气地补充道：“郭小川只不过是上窜下跳的人物，把他调到中组部，在批邓反右时又放到河南，定有高人指点。放到哪里查到哪里，到中组部也可以追查！”气焰嚣张，杀气腾腾。

10月5日，正义和邪恶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的时刻，双方即将摊牌。文化部核心组紧急布置：把郭小川的有关材料整理齐全，直接送张春桥批示，让中央各部委全力配合，将郭小川的问题彻底揭开。

第二天，文化部火速召集300多人参加的学习班开会，宣布对与郭小川关系密切的钟灵实行隔离审查。会议主持人甚至公开宣称：“有人

问王震能不能议论？我们说以毛主席革命路线衡量，只要不符合，就要放手揭！重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对通天人物要追查到底！”

“四人帮”的随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就在他们召开大会宣布对郭小川追查到底的第二天夜里，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就采取断然措施，代表党中央将江青等“四人帮”一一逮捕，宣布隔离审查。郭小川也由此逃脱了一场即将来临的政治大灾难。

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凭着诗人惯有的敏锐感觉，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郭小川的病情似乎突然减轻，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赴省城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奇怪的是，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兴奋之情。作为一名战士诗人，他恨不得马上奔向北京，以笔杆子作刀枪杀向“四人帮”。

18日晚上，夜幕已经降临，热闹一天的安阳招待所四处沉寂、幽静，人们都先后进入梦乡。惟有郭小川躺在床上，点燃着香烟，用诗人思维的方式在反复思考。他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想了很久很久，翻来覆去，总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手上夹的烟蒂却未能掐灭，这万恶的烟蒂掉在衣被上，面积越燃越大，引发了火情，满屋烟雾弥漫，无人知晓。57岁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无情的烟雾中窒息身亡。他带着渴望同“四人帮”进行战斗的一腔热血，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成了他自己和所有亲朋好友的莫大遗憾……

噩耗传到了北京，老首长王震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极度悲伤，曾含着眼泪对郭小川的女儿说：“正要给你爸爸写信，让他马上回北京，而你爸爸却去世了……”

郭小川匆匆走了，但他生前创作的动人诗歌、散文、通讯和他经历的坎坷人生，将伴着他光辉的名字永留人间。

（责任编辑 洛 杜）

# 值得自豪的父亲秦川

● 友 苏

静静的时候,我在想着:

许多人说,我在父亲病危、去世以及办理后事的过程当中最为冷静。我没流泪,我毫不分心地去做那些应该着手做的事情;我没有茶饭不思难以入眠,也没有让他在我的梦中出现,得空闲也没有去想他。是一副没情感的心肠吗?不,不是的,我只是有种感觉,一旦我去想他、念他,我会伤心的。

“爸……爸!”……“爸!”……“老爸!”50多年里我们这样对他称呼过来。不过,真觉得叫“老爸”更为亲切。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不知道了。然

而,打从2003年1月22日凌晨,他因为脑内大量出血昏迷过去后,我们叫着“老爸!”也不知道他还听得到不,在2003年1月29日中午1点05分时,对着老爸,我们已是百般呼唤而他不能应答了。没希望,也不可能,他就这么忽然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他。老大,我的哥哥,心碎了,阳阳,我的妹妹,只要看她在伤心,我就想立刻抱住她,叫我不再看到她满面的泪水;老三,我的弟弟,我知道,背地里有他忍不住的哀伤。

送老爸走的这段日子里,有许多人到家里来,大多是熟悉的面孔。仰望他侧头似在聆听朋友谈话的彩色照片,那微笑的脸含着亲近,那注视你的目光有着机敏,人们叹声说着可惜,安慰我们要节哀。讲述从前,勾画着他的为人,即便是陌生的人们,那眼含热泪轻轻的叙说中,不断让我们感受到老爸的亲切,可爱,随之的敬佩中有我们的骄傲。



秦 川

他正直的人生,积极的耿直行为,可以体现在被冤屈的共和国领袖人物的亲人身上,还有那些普通的人们。刘源抽空来了,没有多少话语,深深地三鞠躬,紧紧地握手,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一位大学教授,两次到家中来,久久地坐着,湿润的眼角,口中不停地道出往事:“四人帮”横行末期,在怀念周总理的日子里,人们难以抑制的情感爆发了。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内外,广大师生们不同方式的表现,惹怒着“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们:“同南京事件没有差别!”“反革命性质!”面对严重的斥责和

警告,老爸站起身来:“我是党委书记,这些事我一个人负责!”……对于那些可能被拘捕的师生,他对派来的公安人员说:“我们校党委能够自己处理。”严正而又巧妙地对付过去,师生们安然无恙。……即便是曾被“四人帮”恶意利用过的“反潮流”的孩子,在“四人帮”垮台后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时,得信后他也及时地去解救。……老师下午早退!为什么?他亲自到校外地摊前了解情况:他们只是为抢买一毛钱一堆的青菜……为了生活,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大学的负责人挤着公共汽车去上班,被人粗鲁地踹下车门的情景,也让这位老师亲眼目睹并被深深感动。

……应当做的就去做,敢于负责,挺身承担着压力,在延安时期就被人称作“大侠”;一个不讲排场和不摆架子的“领导”,一位视上下级为平等的“普通人”,就被人们尊敬着。为什么是这样的?

其实,原来就是这个样子。60多年前,他的领导王若飞、李卓然、张稼夫、习仲勋,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等,就是这个样子的。二十出头做李卓然秘书,让“领导”左找右找找不到人。后来,赤脚挽裤手捧一罐小鱼的 he 出现了。“怎么搞的……”领导说。“这小鱼放些盐炒炒可好吃了!”他就这样回答。结果呢?没事!日子艰苦么。在为布置会场插彩旗的杆子无法运来而发愁时,过路的周恩来让出了自己的汽车。就是这样。某高层领导享有些特殊供应品,而他会炒菜,于是就去帮忙,于是就经常一起吃“特供”。就是这样。不分职位高低尊卑,自然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这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的传统,他没有改变它。中国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品格,他没改变它。只要在一定的岗位上,他就这样做。张志新烈士的事迹首先出现在辽宁《党的生活》杂志上,读得他心中震撼不已,惭愧不如,大笔写上《为真理而斗争》的题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是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忠于信仰的坚贞表现。以后,又发表了如陶斯亮纪念父亲陶铸的一些文章,再现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也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工作作风。为此,1959年他却被错误地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鲨鱼”。那是在他经过五省农村调查讲真话之后。你看,1959年初他在《四川省新都县桂湖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中,是这么讲的:“群众是知道虚报后的产量的,他们讽刺说:‘这是跃进数字’,是‘划码单上增的产’,是‘电话上增的产’。说:‘这是诓毛主席,诓共产党,诓自己的肚皮。’他们批评‘干部挣了顶子,整得我们饿了肚子。’”直接反映了农村广大社员群众对“大跃进”的实际看法,对虚报浮夸风的严厉批评。他讲真话,那就是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后,他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4年里,在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人民公社,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生产大队,住土坯房,与农村社员一道“享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劳动又算什么?穿草鞋,打赤膊,晒得黑黑的,锄地的动作……这样的照片有不少。往后看还有在河南西华黄泛农场“五七”干校时,也包括前几年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去考察时。这么多年里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什么“长”。他不愿接受前呼后拥,不愿享受“热情接待”,他喜欢自然。所

谓“领导威信”在哪里呢?不是让人家去树立起来的,是由于自己的言行而带来。这种人与人的贴近,直言不讳的沟通,如今是多么地宝贵。

当然,我们所感受的“老爸”,多是生活中的、家庭中的父亲。他的工作、政绩,甚或错误,我们不可能直接地接触到,只有在生活中时时有些感觉。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人不能重用”的阴影,也在我们成长道路中发生过“锻炼”的作用,即使我们的“前途”有些“不顺”。这些,当然不是他告诉给我们的。在我们从小成长到独立工作的人之前,他只是一位“家长”、“户主”,经常地不在我们身边:下放农村4年,参加社教运动3年,五七干校3年。不在身边的日子,我们尽情地玩耍,“自由”地成长,家里的桌椅被褥曾成为“战场”中的“壁垒”;大院里的孩子们相聚,自然有更大规模的“战斗”。但每当他回来时,就要检查我们的记分册,一个“2分”手掌上就要挨上一下。他没有说教——在我的印象中,细细想来他却时时都在注视着。1960年,他在“倒霉”的日子里,一次,一位同住机关大院里的干部在食堂排队买菜时愣说我“夹塞儿”,我哥和他理论起来。后来不久,爸爸回家来的时候批评了哥哥,说就是那位干部说了不对的话,他也不该说:“有你这样的党员,我就不入共产党!”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面对他的教诲。还记得上初中时,我曾是北京少年宫某体育运动项目的不错的队员,因成绩突出而被选送参加北京队的集训,以后,教练有意让我继续参加备战全运会的训练。我很激动,写了“为祖国争光”的决心书被妈妈转寄给他。结果,没获他的批准,还是让我“好好学习”,好不叫我心中梗梗。我想,你十六七岁就能从贵州老家只身跑到北京求学,以后又去了延安,我为什么不能自主自己呢?有点遭受打击。那么后来,1968年,我还是自主了一回,报名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不知他几时得到了消息,还到学校去反映过我有胃出血毛病的情况。但最终,他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包括插队回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纸盒厂当工人)。以后,我,还有我的在空军靶场当兵的哥哥,在新疆当兵的弟弟,在部队“锻炼”的当演员的妈妈,包括以后我的嫂子,几乎都会每周收到他来自五七干校或北京的信。每一封信都厚厚的,只不过,每页中那狂飞的字都写得很大。话并不是很

多,但内含深深的亲情关怀。看着几页大字书信,每回你都会很乐,心中感受着温暖。

在没有说教的家教下,我们都能从自己身上找到他的一些影子,脾气、品格,甚至一些特长。他的孙子出了自己的小说,送给他一本书。他说:这算什么!我14岁就写过一本侠客小说。不错,受新文化思潮影响,初中时,他就爱看《三侠五义》,爱看那无声的电影,“之江书店”里他是常客,去读中外名著、鲁迅等人的作品,还参与了

地下党办的文学团体“流波社”,在《少年大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晴川”是他的笔名。1933年到北平学习,1936年参加了北方左联,办杂志《榴火文艺》。小说、诗歌都能写。在延安,他表现了很强的记忆力,被领导派去参加会议,不用记录,就能准确转达内容。那才从苏联回来的“理论家”康生,口才加激情的讲演,让他着迷,以致用脑子记下了康生的许多讲话和经历——这也就成为后来他被康生“重视”为“大鲨鱼”的原因之一。到晚年,每每来了客人,不论是年长年幼的,都可以不遗细节地听到他描述当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的故事。生动地让人羡慕,可惜没有带录音机来。他被人夸做活字典、数据库,我想也可以叫“党史教育基地”吧!

人们庆幸他身体的健康。赤水河里长大的,游泳是一辈子的爱好,快60岁时,还参加北工大教职员工的游泳比赛;70多岁时,一天几千米地慢游令人称赞。他善行走,晚年散步也是十来里地。说来也叫我笑,一次到南方去,上自动扶梯,有人要搀扶这位“老人”,被他甩脱开,自己却又不幸跌倒,扭伤了腰。要强么!就这脾气,不服老呢。

这个星期天,我们兄妹们又聚到一起,看着一部刚刚收到的专题录像片。2002年11月中,党的十六大召开的日子里,老爸在广州。一位真心为老



全家福

同志服务的、做实事的青年人”,潘冬子”——大家这样叫他,在那里筹划建设“红军公园”,宣传红军的精神。80分钟里,我们又回到老爸的身边。镜头中,从机舱门出现的老爸,几分苍老,步履有些蹒跚。而跟着新的一天的到来时,我们又看到一位充满活力,一副童心,步伐轻松的老爸了。这里的气氛是他所喜爱,没有大堆人呼拥着,他高兴地说道:“这是回归自由,回归自然。”如同在家中,随意自如。他谈笑风生,好可爱的样子。要上山么?他犹豫了一下,又自信地迈出步子……看着他那么健康地行走着,我们却心酸了,这,离那2003年1月29日,不过才两个月的时间哪!

所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有许多人说:“不会吧?!……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他。那么棒,还游泳!”有的人,是在给他拜年的电话中,听到回答:“他不在了……”于是就半天没有声响……一个热情的问候,换得一个不可能的不幸。

老爸,他走了!离开我们36天了!真的让人难舍难分,想他、念他,于是重又去温习他人生的“轨迹”。啊,明白了,老爸他并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他还属于社会,属于党,属于人民。想到这儿,不由我们兄妹为他——我们的老爸而倍感自豪。

(责任编辑 方可)

# 李敷仁与《老百姓》报

● 傅国涌

在中国报业史上,李敷仁和《老百姓》报具有独特的魅力,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迄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曾攀上这样的高度,今天知道的人恐怕已不是很多了。

李敷仁原名文会,字敷仁,生于陕西咸阳县北杜镇一户贫苦人家,1913年考入咸阳县立高等小学校。1922年,他考入西安第三中学,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之一,参加了省学生会的工作,领导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1928年8月,他在上海一家叫《生华》的期刊编辑部做编辑、校对,边学边干,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闻事业,为他以后办报打下了一些基础。当年他应邀回到西安,在国民党省党部宣传科当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后升任宣传科长、报社总编辑,写过《地皮将透的咸阳》、《虎口余生记》、《空前的大荒旱》等文,指出“天灾的原因是人祸——人祸就是军阀!”

1931年6月,在杨虎城资助下,李敷仁东渡日本留学,1932年3月,回到陕西后,先后在省立二中、汉中五师等学校教公民课,一干就是十多年。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写了《以鲁迅的话悼念鲁迅》一文:

他像个莽原上奔流的壮丁。他瞧见许许多多的死魂灵!在热风冷草中彷徨,瞻仰着桃色的云,南腔北调地吟风弄月,他更瞧见坏孩子盗表,青年人苦闷的象征,工人绥惠略夫。他于是以自由之笔,在夜的故乡里,朝华夕拾,作成狂人日记,尽量地呐喊,要救救孩子!……

1937年7月,他被陕西省教育厅派到国民党举办的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10月,他却在西安师范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其实他早于

1932年起就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

1937年11月12日,在“七七事变”以后的烽火硝烟中,李敷仁和一群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办起了《老百姓》报,创办资金仅仅是两个新生儿满月的一百多元喜酒钱。这是他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在第二期的刊头语中,他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后他在1946年写的《忆《老百姓》报及其与读者的结合》文中说:“报纸要交给人民,成为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心中要说的话。”

《老百姓》报是周报,先是八开两版,后扩大为四开四版,内容有社评、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老百姓》报一共出版了113期,到1938年创办一周年时,共发行了100多万份,行销国内13个省,是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的通俗报纸,而且美、英、苏、法、加、瑞典、匈等国都有订户。

在李敷仁主持下《老百姓》报以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辛辣、犀利的笔锋揭发贪污,痛斥奸商,宣传抗日,嬉笑怒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产生了其他报纸无法起到的作用,不仅替老百姓说了不少话,老百姓也说了不少话。《老百姓》报因此被誉为“人民喉舌”,老百姓亲热地称《老百姓》报和编辑是咱“老百姓”。李敷仁索性以“老百姓”作自己的笔名。李敷仁的文章常常切中时弊,击中要害,1938年10月24日,他在42期发表社论《反对隔桌子打人》:

而今是民国了,老乡!不要说以民作主,就是拿官来作主,试问老百姓跑光了,你能打日本、建立新国家吗?你连白蒸馍都吃不进嘴了!孔夫子说:“做官人要使民如成。”孟夫子说:“民

为贵,社稷次之。”皇上不值一个“大板儿”。前次国民政府到汉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家商量好的议案,马上下令全国各省县政府;“如有违法滥权,侵害人民”,老百姓得依法上告或请愿,总要叫老百姓不吃亏才是。这是多么替老百姓操心的公事,所以我们大声喊叫,反对“非刑拷打!”“反对隔桌子打人!”

在《老百姓》报存在的不到三年中,它就经历了三次大收买、两次大分化。一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来是行动委员会和胡宗南的战干四团。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政治部、陕西省党部先后找李敷仁,请他干一份兼差,还继续主编《老百姓》报,他谢绝了。收买分化不成,等待着他们的就是禁止发行、检扣稿件、上黑名单、逮捕编辑(常奋、董秋儒、佟添等三位青年为此坐牢,有的被迫害致死)等等,先是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是战区政治部新闻检查所,一字一句都要经过检查,目的就是要置《老百姓》报于死地。

1940年4月6日《老百姓》报就预感不妙,在112期刊出紧急启事,称“现一面交涉一面出刊”。4月18日,他们倒填日期“1940年4月17日”出版了113期,也就是终刊号,李敷仁流着泪连夜写出《与读者告别》文,回顾了《老百姓》报走过的曲折艰辛的历程,表示:

中宣部下令各省新闻检查所,调验报社、通讯社的登记证《老百姓》在一九三七年冬季开刊时,只得到省政府教字一六六七一号指令“准予发行”四个字,而登记手续,从此就屡办不成。以至于四月十八日接奉长安县转下省府令,即日停刊!

《老百姓》报的停刊对李敷仁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对朋友说:“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1942年10月,李敷仁被派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签名照片,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心。

1944年10月16日,他在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主办的西安《国风日报》开辟《农村周刊》,为老百姓大声疾呼。当地老百姓奔走相告:“老百姓复活了!”在11月12日发表的《勿谈国事》中,他说:

原来在前清的时候,……不管皇上多么混

蛋,朝政多么黑暗,谁还敢放个屁!……后来孙总理起来革命,赶走皇帝,把专制政体改成“民主共和国”,就是说,国家大事应该叫老百姓来管,不应该叫皇上称孤道寡。……

现在世事变了,不但老百姓能够谈国家的大事,而且政府还要对这件事大加提倡;……大家越能谈国事,国事才能变好,大家也就能过幸福的日子了,反正国事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好景不长,不过一个月零六天,到11月21日《农村周刊》只出了六期就被绞杀。

1945年5月21日,陕西省教育厅所属民众教育馆创办《民众导报》,四开小报,每周一期,请李敷仁主编。《民众导报》继承了《老百姓》报的传统,语言通俗,笔锋犀利,详细报道了咸阳灾情、县长刘发珏贪污及当地人民惩办贪官污吏的要求,刘重金聘请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广告栏中逐条答辩。李敷仁亲自到咸阳农村深入调查,组织老百姓推出代表成立“控诉委员会”,还鼓动学生成立“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召开“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声援议案。这一切《民众导报》都作了报道。他以记者身份参加驱刘大会,刘终于站在了被告席上,当局也只得当场宣布将他撤职查办,退还赃款、赃粮。从此李敷仁的名字就更传遍了咸阳城乡,成为当地老百姓心中的偶像。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民众导报》出版了25期,在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下了功夫。1946年,当局开始追究《民众导报》的立场、背景及李敷仁和中共、民盟的关系。在当局的步步进逼下,李敷仁决定5月1日离开《民众导报》、离开西安。

但已经来不及了,国民党特务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在1946年5月1日对他下了毒手。他们把李敷仁绑架到咸阳西北的苏家庄,向他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打准,第二枪从背部右侧射入,穿过颈项两动脉之间,重伤未死,被当地百姓所救。

李敷仁惨遭暗杀,引起各界抗议,西安各界组织了自卫委员会,教育界组成“五一”李案后援会,通电控诉当局的罪行。民盟中央向当局提出严正抗议。重庆、上海、北平等地新闻界、文化界也先后通电抗议。李敷仁随后去了延安。

1958年2月19日,李敷仁因“心力衰竭”逝世。(责任编辑 刘家驹)

# 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

● 何方

李慎之同志走了,走得仓猝,走得利索,走得完全出乎朋友们意外,走得连他自己也毫无思想准备。

今年4月2日,他因咳嗽去医院看病,一检查,说是轻度肺炎,被留下住院。7日,来电话问我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仍然是谈笑风生,一如往常。我问他是否赶时髦得了“非典”。他说,恰巧相反,是典型肺炎。来时只当感冒,由于正好有空床,就让他住下了。现在已有好转,打算最近出院,只是院方还没同意。12日问他病情时,他虽然还是滔滔不绝,但已有点气喘,说是前两天又得了感冒,发高烧,呼吸有点困难。却又不无幽默地说了句:“看来也许大限已到,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开玩笑地说:“按制度规定,以你的级别,见马克思还不够格。”并劝他少说话,多休息。不想这已是我俩间的最后一次交谈,他的玩笑话也竟成讖语。14日得到他的病危通知,并告以病人已不能再开口说话。经抢救无效,4月22日10时零5分完全停止呼吸。真是突如其来,祸从天降,思想界一代英才就这样倏忽离开人世,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只是留下了他对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无限关怀,留下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计划,包括出文集和写生平。

朋友很早就建议他出本文集,但他总以文章不多为由相推脱,直到最近才改变主意,还同意整理一部生平,并应几位热心的年轻朋友之约作了口述录音,但未经过目修订,他总是放不下心来。至于想写的文章就更多了,他做学问涉猎甚广,对不少问题都想谈点看法,只是有如朋友们所说,过分“爱护羽毛”,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我们也曾谈到,鲁迅还不到六十岁,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所以对想

到要做的事随即得出“要赶快做”的结论(见先生1936年9月5日所写《死》,载《且介亭杂文未编》),何况我俩已是80年龄段的人。两人确有同感,又都叹“廉颇老矣”,写东西越来越慢。大约也与年龄有关,他还经常和我谈到死的话题。对此他倒很看得开,一再说死倒不怕,就怕病成残废或痴呆,不但自己受罪,更要累及家人。所以希望要走就走得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这次他还真利索地走了,虽使大家感到意外和悲痛,但在他,却总算实现了个人的这点愿望。而且他的夫人张贻和子女也和他一样,都表现得异常坚强和达观。在他走后的当天下午,我去吊唁,借以对全家慰问。没想到他们是那样的镇静,反倒劝我节哀。这真使我感动,也令人宽心。

3月17日,一些同志相聚一起,开了个有关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座谈会,我也接到通知,但因路远迟到。进门一看,真可谓“坐中多是豪英”,只可惜大半已白头。惟独慎之全部黑发,脸无皱纹,如果走路不用拐杖,谁也不会相信他已年届80。会后他送我回家,路上提到有关周恩来的一本新书。由于我们都曾跟随总理工作过,所以谈来很有兴味。他表示打算写一篇评周恩来的文章,只是思想还不够成熟。然后分手告别,互道珍重。不曾想到,这竟成了我们半个世纪之交的永诀。

我和慎之相识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那时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代表团文稿起草组的一个成员。日内瓦会后即各奔东西,分头忙自己的业务去了。1957年他得中“钦定右派”,倒是预料中的事。因为他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见事快、意见多、爱讲话、没遮拦,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他多半会是跑不了的。事实证明,他虽然参加革命

较早，但却一直没能改造成会听话的驯服工具。我虽然也没改造好，可遭遇过延安抢救，从此对政治运动不再那么积极，所以在反右派中竟安然无恙，还以当时所处地位帮助过几个同志免遭灭顶之灾，可是仍然在劫难逃。1959年虽没什么右倾言论，却因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工作而被扣上反党宗派和机会主义两顶帽子，在人造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几乎送了命。从此，我和慎之相互自我隔离20余年，直到1979年才再次见面，还被调到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的深交和友谊，实际上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

1978年底，中央成立了一个“国际问题写作小组”，胡乔木任组长，宦乡副之，从社科院、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抽调了包括李慎之在内的二三十人，进驻钓鱼台原江青住的11号楼，任务是写一本《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或《社会帝国主义论》的书。胡乔木只是成立之日露了一下面，后来就再没过问。宦乡开头还认真，但不久也忙别的去了，一个星期只来一次。正好这时我已恢复党籍，在邓力群的帮助下，挣脱出了外交部，随即被派去协助宦乡抓日常工作。大家先是集中阅读有关苏联的中外文资料，不定期地开点座谈会，出点反映研究成果和资料性的简报。后来觉得有些不好下手，也就逐渐松弛下来，座谈和闲聊已很难分清。慎之虽然还未恢复党籍，但早无“界限”可分，而他的谈锋既健，又无架子，常会吸引一些人聚集到他的居室。其实谈的内容也并没离谱，主要还是有关苏联的情况和中苏间的比较。这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倡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全国又都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因此不管讨论还是闲聊，都可畅所欲言。虽然争论常有，

也涉及到某些根本问题，但感到中央交给的任务实在无法完成，已逐渐成为大家的一致意见。因为以前断定苏联变修，这时已越来越感到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更多地是出于感情用事甚至个人情绪。按照康生主持写的《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苏联变修的主要标志是已形成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贪污盗窃、损公肥私、盘剥工农、肆意挥霍、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等等，这个阶层和人民的矛盾，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用材料都是出自苏联公开报刊上的揭露和批判。对此，慎之和大家都认为，和我们比较，这些材料不足以说明苏联变修，何况还是人家自己揭露出来的。至于对外政策，“文革”后胡乔木主持写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说苏联不但对内已是法西斯专政，而且对外实行疯狂备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阴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因此对两霸不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这实际上是在进一步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制造舆论。其实，无论是对苏联的定性还是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央不久就都作了根本改变。对苏联



1979年11月18日李慎之（左）何方摄于洛杉矶乐园



左起:李慎之、何方、布热津斯基、宦乡

和东欧国家已不再以修正主义对待,只是三个世界的划分却迄无公开说明。直到1982年,李慎之在参加十二大的准备工作期间还就此当面问过胡乔木。胡的答复居然是:“不要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李当时就告诉了宦乡、李汇川、谭文瑞和我。见他所著《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2002年3月在南京的讲话。)经过这段工作,反而加深了大家对反修不以为然的意见。慎之就常说,原来搞了20多年的反修,既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真有原则分歧,多半还是基于个人性格,为争国际共运(世界革命)的权威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

“写作小组”既无所事事又没人管,而1980年初钓鱼台又要搞经济核算,一座楼每天3000元,不交钱就得走人,批准我们进驻钓鱼台的李先念也不管了。于是我们就向上提出申请解散的报告,理由两条:一是批苏修会被认为是指桑骂槐地批中国,因为有些方面中国也不比苏联逊色,而且还不愿公开揭露;二是批苏修势必会涉及以经济集中、政治专制、思想管制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和这个模式又都是不能批的。但由于“小组”系中央指定成立,所以在无正式答复的情况下,也未敢贸然解散。后经胡乔木同意,宣布所谓人员先回原单位工作,只剩下慎之和我无单位可回,遂搬到毛家湾当年高岗住过的小院留守待命。虽上有宦乡领导,但实际上就我们两人自己管自己,过了一段“神仙”般的生活:早晨同去北海公园散步,回来在小摊上吃一

顿油条烧饼或豆腐脑,上班就各自读书或写作,晚上则利用当时有利条件,翻阅大量国内问题的文献和史料。休息就是闲聊,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慎之学识渊博,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但他有点狂傲,臧否人物没有几个是他看得起的。而他的某些刻薄言论也常遭到我的抨

击”,他却也从不在意。人们或许以为,慎之喜欢高谈阔论,时间大约多消耗在滔滔不绝的议论和与各方人士的交际中,其实这多少有点误会。他虽然天资聪慧,但也相当用功,他不但读的书多,还抄录了大量卡片和资料。1981年宦乡要我帮他起草一篇答复复旦大学一位教授谈帝国主义垂死性的文章,慎之那几箱卡片就大有用场。他虽只小我一岁,但思想敏锐,记忆力好,却胜我多多。古今中外一些典故,特别是人名,我往往话到嘴边还是想不起来,他却如数家珍,这当然与他的用功、常读不懈有关。

在钓鱼台和毛家湾这三、四年,虽然反修交了白卷,但别的方面还是有些收获。就我们两人来说,除连接上个人中断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外,更重要的是协助宦乡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在这之前,新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完全实行闭关锁国,几乎对外没有诸如互派代表团、举办讨论会之类的交流。在这方面,宦乡可说起了开山作用,慎之和我则是他的哼哈二将。例如单是1979年,我们就曾两次组团去美国,分别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讨论苏联问题、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会后又访问一些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联系并商定交流计划,每次历时一月。紧接着去日本,情况相同,只是气氛更为热烈。在这之前,慎之还曾作为随行人员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宦乡也率团访问过美国和日本。关闭了二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学术交流之门,就在这被打开了。慎之英文好、善交际,在这方面起了

很大作用。他对外活动也注意分寸,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例如在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合办的苏联问题讨论会上,他在1979年11月8日的发言中就有这样的话:“苏联霸权主义仍然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而且影响及于一切问题。”(见我和他共同主编的《苏联问题讨论》第1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内部发行)据我所知,对这一看法,当时他自己和不少人就已不大以为然了。大的方面倒还注意,但他不拘细节。那时出国,经费紧,限制严,每人只发零用钱30美元,而且电话费自理。这当然对他造成一些不便。一次宦乡提前回国,让我代理团长,继续参观访问。谁知在20来天的时间里,他给在美国的老同学和新朋友打电话就花了百余美元,只好要求公家报销。还有一次在洛杉矶一餐馆吃饭,席间他和一端盘子的小姐攀谈,得知对方是博士,就自行加倍地付了小费。后来发现开出租车的、搬行李的,不少是博士,也就见怪不怪了。慎之确有单纯天真的一面。我们头两次坐美国飞机,总要相约,飞机上供应的食品一定吃完。他说,自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美帝掠夺我国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能吃回一点算一点。一路上总是正经话和开玩笑混杂一起,嘻嘻哈哈,轻松愉快,减轻了二十多个钟头乘飞机的疲劳。和慎之同行,真是一件快事。

这期间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研究当前和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就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向中央写报告,提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次是在宦乡主持下写的一篇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意见,主要内容是拉开同美距离,改善对苏关系,实际上就是改变以苏划线、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因为这时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各国都忙于发展经济,显然我们也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支援世界革命只可量力而行,不可像以往那么打肿脸充胖子和只交“穷朋友”,而应当广结与国,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应该说,这些意见还有李一氓主持起草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站不住等重要报告),无疑对后来十二大许多新提法的形成起过一定作用。而慎之正好被胡乔木点名要去参与了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国际外交部分的起草,发挥应有作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他并不总住玉泉山,而是得空就

回毛家湾和我吹牛聊天,谈点内部情况“小道消息”。他说,国际外交部分只要求写四五千字,但却集中了一堆人在那里“磨时间”,实在没意思,还不如回来轻松轻松。这当然是我所欢迎的,否则一个院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要他一回来,就满院生辉,欢声不断,从不冷场。和他在一起决不会有寂寞之感。

我们办的第三件事,就是协助宦乡筹建社科院的国际片。以前社科院研究国际问题,只有一个从经济所分出来的世界经济所(所长钱俊瑞)。宦乡来后,在胡乔木、邓力群的同意下,就计划大刀阔斧尽快建一批涵盖全球的研究所。但他手下仍只有我和慎之两人,遂决定先建两个研究超级大国的所,指定英文好又对美国情况较熟的慎之筹备美国所,我因学过俄文并在驻苏使馆做过几年研究室主任而被内定搞苏联东欧所。胡乔木也还介绍他的清华同学施谷来筹建世界政治所(后与世经所合并成现在的世经政所)。正在这时,得知中联部长姬鹏飞对研究工作没兴趣,打算取消或让出有四五百人的三个部属研究所(苏联东欧所、西亚非洲所、拉美所)。社科院当即去中联部商谈接收,只是对方要求保留房地产。但三所驻地的张自忠路3号,曾是清朝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北洋时期的段祺瑞执政府、抗战期间冈村宁次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样重要的文物场所,有关部门大约是不会让他们去建宿舍的。事实上,中联部后来也再没提房地产的事。在这之后,又从北京大学接管了南亚所(原为合办,所长季羨林,接过来后改为亚太所),还在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基础上建起西欧所(现欧洲所)。既然有了二百余人、建制齐全的苏东所,当然也就不需要我去筹建了。于是拉着黄牛当马骑,我遂被改派去筹建日本所。

办所的头两年,美国所和日本所可说是两位一体,同患难,共进退,有饭同吃,有房同住。当时没所址,就到处找房子,一年多时间,搬家三次,最后落脚张自忠路3号。这期间两所真是不分彼此,亲密无间,连上大课、开讨论会、政治学习等也多在一起进行。慎之和我,更是遇事相商,经常交谈。大凡办所方针、研究范围、机构设置,甚至人事调配,都要互相商量,他常戏称为“早请示、晚汇报”。在学术上,我们都主张兼容并蓄,反对

研究机关染上官僚习气。此外,我们还有两项相约:第一,上班步行,不用车接。路太远时坐公交,所以都带月票。一次已到月底,我们被查出还用上月的月票,弄得十分尴尬,只得以忘记为由请求换票。人家一看是两个糊涂老头,也就没罚;第二,不评职称,甘做白丁。后来有变,他升任副院长,按行政级别行事。我归研究系列,工资和职称挂钩,只好在几年后接受大家评的研究员)。第二项只有他做到了。但第一条两人却真坚持了近20年。至于国际片,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筹建不过三、四年,就已组成八大研究所和千余人的研究队伍,成为社科院以至全国一个国际问题的重要研究基地。国际片设有特别阅览室,每两、三个礼拜召开一次所长座谈会,进行吹风和务虚,商议课题和分工。而且还提出各所不但要做本学科的排头兵,还有责任推动全国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在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也分别设了美国、日本学科的全国规划小组,慎之和我自然分任组长。小组还不定期开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分工合作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后来,各学科的全国性规划不搞了,慎之和我又商定筹组美国学会和日本学会,使之成为权威性学术组织,以便推动和协调本学科的发展。应当承认,美国学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学科,李慎之是出了大力的。在记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美国研究时,必须记上他的名字和他的贡献。

最后还有一事应提到,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慎之和我还担负过部分对台工作。那时两岸已有接触意向,但渠道不畅,遂先以学者名义联系,这就自然成了社会科学院的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人有好几个,但慎之属于主力之一。我单为这件事就跟他跑龙套去了两、三趟美国。他学识渊博、谈吐自如,能言善辩,应对如流,首先在气势上就把那些认为共产党都是“土包子”的人给镇住了。而且他长于交际,很快就结交了一批朋友,包括来自台湾本土的学者,著名的台湾留美四大金刚以至一些搞台独的人。后来这些人来大陆也都找他。由于他交游广,信息多,几次回来汇报还受到当时对台工作小组领导人杨尚昆的赞许。这件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出任社科院副院长后,还让我和李寿祺替他去了一次美国。再往后,两岸交流日渐频繁,渠道也随之增加,自然也

就用不着我们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开展两岸交流的道路上,总保留着慎之起步的脚印。

六、七年的相处,使我们真正做到了相互了解,也许称得上知音。不少人认为他孤标傲世、眼空无物。乍一接触或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来往多了,你就会发现慎之的主要性格还是待人以诚,完全平等,处世谦恭,毫无官气,和什么人都谈得来,有些还很快成为朋友。以我而论,既无学历,又少文化,真正的“土八路”一个,但承蒙他看得起,遇事不论大小,不分公私,都愿和我商量。我虽检讨了一辈子的骄傲,但对他却很尊重。因此几十年我们都算得上相处融洽,争论常有,却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每到一起,总是谈论不休;分开后,也还互相牵挂。例如有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只听念了两句杜诗:“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我除申明“不敢当”外,问他什么事。他说,没事,只是想念老朋友而已,然后扯了几句闲谈。当时没当一回事,可现在想来,心头就别有一番滋味,岂悲痛二字可解。

1985年,慎之当了社科院副院长,代替已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总干事的宦乡,分工主管国际片,成了我的上级。但他不像某些人,没学会用权和摆谱,见人还是老样。熟人不分上下,也照旧称他“老李”。他的管理方法与众稍有不同,更强调发挥研究工作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反对学术上逢事干涉、管得太多,还提倡创建不同学派。他不会讲那些老话、套话和不懂装懂的话,不得不发言时总还有点新意,会给人以启迪,不像有些人总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不是讲外行话,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馒头。他上任起,就几乎没再开过片会,国际片他也很少来,有点“文景之治”,倒还得到各所领导的好评。我的习惯却是无事不去上级机关和拜见领导,一贯采取被动制。因此我同慎之几年的整日相处、随时交谈的生活就自然渐行渐远,只是有事通个电话。后来连这也无法继续。1987年宦乡确诊为肝癌,不久到上海住院,我又被调去做他的副总干事,主持中心的日常工作。离开社科院,工作又挺忙,从此和慎之的联系就更少了,有时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见上一面,大有咫尺天涯之感。又过了一个时期,慎之从岗位上退了下來。我还继续搞国际问题,比他多忙乎了六、七年,直到八届政协换

届,才正式办了离休手续。

离休后我即改行学党史,写点读书笔记。对此,慎之极力支持,只怪我改行太晚。意思是担心我来日无多,知道的东西写不完。其实,开始时我并没有什么计划,只是想响应杨尚昆的号召,为被长期埋没和抹杀的张闻天做点“拨乱反正”工作。不想写到延安整风竟无法收拾,不能自己。要写的一部《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党史学习笔记,就形成尾大难断之势。因为说老实话,我不但有鲁迅的“要赶快做”的想法,而且担心写不完想要写的东西。这些笔记,我每写一篇,都必送几位友人审阅指正。可惜慎之对此,却不大内行。除少数文字,并提不出什么实质性意见,只是表示赞许,催我快写。这对我倒也是鼓励和鞭策,无形中增添了不少责任感。而我之所以热心于写延安整风,是因为对现有的一些书有些不同看法,想参加讨论。一则,我以为,现在我们从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管理,无不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因此值得刨根问底,探讨得失。二则,有些自己记得的事情也不愿其随着时间流逝。例如下面所举,我就没在别处见过,不及时记下,也许可能失传。至于是否真实,现在可能已找不到旁证,留下总还可供专家考据。1939年我的抗大一位姓董的同学,买了丈余白洋布送请毛主席题字。过了一段时间,主席派人送回。只见上面写道:“血气旺盛的人最容易性急心粗,主观的(地)片面的

(地)看问题。我们要冷静细心,客观的(地)全面的(地)看问题。单有自信心,容易犯左倾。单有不足心,容易犯右倾。自信心与不足心并有,那就不会犯错误了。”

这个题词我记了一辈子。在抗大当助教时曾恭录纸上贴于居室墙壁,不少人看后也照抄了去。其中就包括与我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陈唯实和经济学教授张庆孚,以及许多同学和同事(现在不知还有几人健在)。对这些,慎之也有兴趣,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对整风的历史性剖析和有关内幕的窥视。

近十年来,慎之写了不少文章,夕阳西照,显露出了他的才华。发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一般总会送我一份打印稿。看后,我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有的甚至不懂。说也奇怪,我和慎之可说搞了一辈子国际问题,但正是在这一领域争论不多,其他方面却是经常“抬杠”,互不相让。例如他有一阵竟对新儒学着了迷,时常同我谈起一些有关问题。对此我却坚决反对,认定儒学不论新旧,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后来我要在纪念李一氓的文章中借题发挥,批一下儒学,并征求他的意见。他来函不但表示支持,还作了点反思。他在信中写道:“大概六、七年前,李一氓曾给上海的蔡尚思写过一封信,反对新儒学与说传统文化好的人,认为不能从五四倒退。我当时也有点迷于新儒学(主要是我那时认为,“文革”破四旧反传统是五四的延续,是反传统过了头的表现,因此有此思想)。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人是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复辟最最反动的传统。五四精神对中国不是不够,而是没有扎根。因



李慎之等燕京大学同学小聚。右起:李慎之、谭文瑞、钱辛波、何方、张贻(李慎之夫人)

此幡然悔悟,力主发扬五四精神,重视启蒙,因而有了近年来的一些文章。现在回想一氓同志坚持五四精神不动摇实在难得。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正确之处。请考虑。”我没有保留别人来信的习惯,这一便函只是由于在写李一氓时作过参考,所以就夹在文稿中了,否则也会是进字纸篓的命,那就太可惜了。

又如,我也不大同意他在要求回归五四中抑鲁迅而扬胡适。过去对胡适的批判,不但过头而且有点不讲道理,现在进行拨乱反正是必要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确有大功,但在谈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时,也不必把他提得过高。我没研究过五四,不懂这段历史。但我凭直觉认为,谈五四首先应该大谈它的总司令陈独秀,是他大力倡导“德”、“赛”二先生,使之传遍全国,是他以身作则,把五四精神坚持到底。他的道德文章和不屈不移的人格风范,代表了中国的脊梁。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是名副其实和当之无愧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历史条件没能使他如愿以偿,回到党内,但是他最后思想和表现仍然永放光芒。因此,谈五四,讲启蒙,第一位应当是陈独秀,而不是胡适。说对启蒙精神的理解鲁迅不如胡适,我也想不通。至于他的“革命压倒民主”、“救亡代替启蒙”,我更不以为然。但由于缺乏知识、没有研究,所以很难说出一套道理来。只是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罢战言和”。争论虽无结果,但我却很受教益。原因不但是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可以听到许多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会促使我查书找材料,这又是一种学习。可见,即使在经常的争论中他也对我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帮我增加了知识,提高了文化。

我们经常相争,在熟人圈是出了名的。其实我们的相同意见并不少。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国需要现代化,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人类是共通的,这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我们多年来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当然,无论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得讲法治,既不能以权代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也不可压制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常在一起议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负责审批书报出版的同志,总不应忘记《马恩全集》第一

卷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普鲁士新闻检查法的。历史证明,压制言论自由不可能长久,何况现在处在信息时代,压制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慎之本人近年的几篇文章就是证明。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85页)李慎之公开向世界宣布了他的要求,无非是尽早尽快进行民主改革,“还政于民”,给人民以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知情权、监督权……以及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各种自由和权利,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自由、民主、富强的道路上迅速茁壮成长。现在慎之走了,但我相信,他追求的事业会有更多的人来继承,因此是一定会实现的。

慎之远行,使我失去一位知交。这些天来,我虽无伯牙碎琴之意,但却有丧魂落魄之感。我不能不写点悼念的文字,但又真不知应说些什么和能说些什么。在心神不定的日子里,拉杂写了这一流水账,慎之当能谅我。

(责任编辑 杜晋)

# 送别慎之

● 舒芜

—  
风雨苍黄五十年<sup>①</sup>,  
今朝不信隔人天;  
天人新策煌煌论<sup>②</sup>,  
电笑波腾万口传。

二  
回归五四喜同声,  
尊鲁崇胡细较评<sup>③</sup>;  
长记左家庄畔路,  
冲寒偕访散宜生<sup>④</sup>。

①《风雨苍黄五十年》,是慎之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②汉代董仲舒有《天人三策》,为传世名文。慎之晚年文章,常谈“天人合一”问题。

③慎之有文章与我谈论鲁迅、胡适。

④散宜生,是聂绀弩的别署。他曾寓居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乘公共汽车前往,在左家庄站下车。

2003年4月23日,慎之远行次日

# 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

● 李 普



另眼看世界——念慎之 朱厚泽 摄

李慎之走了。他4月14日报病危,24日去世。这是2003年,他刚刚八十岁。最初是何方告诉我,慎之报病危了,还不知道是不是“非典”。我把这个揪心的消息告诉了李锐、严秀、张宣三等几位老朋友。大家在电话里都希望他能闯过这一关,慎之不能死!他国学基础厚、读过不少中国古书,精通英文,古今中外能调动的资源多,这些都比我们强。所以他眼界宽阔,看问题深刻,需要他做和他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总之,他不能死,否则损失太大了,太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大家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后来只能盼望出现奇迹。其间我还通报过一个错误的信息,是于光远

的秘书小胡听错了又经过李锐传到我这儿的。

最后,抢救无效,慎之终于过早地走了。他没患“非典”,是感冒转肺炎,这是老年人最要提防的,现在说不清他是不是在哪个环节被耽误了。他比我们年轻好几岁。现年六十二岁的学者杨继绳说我国现在有一批“两头真”的人物。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头是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直面现实。李慎之是其中之一。这样说是很对的。

在我们这些朋友中,可能数我跟他相识最早。1946年11月,内战已经开始,新华日报已经不可能在上海出版,我们夫妇俩从上海到南京等美军的飞机去解放区。慎之可能比我们先到南京,也是去等飞机的。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来调处国共两党内战,三方面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我们夫妇在1946年1月离开重庆新华日报飞到北平。慎之是在我们走了以后才进新华日报的,因此直到这次在南京才相识。我们天天在一起闲谈,但是相聚的日子不多,不记得谈了些什么,只觉得谈得来,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谈,对自己的见解十分肯定,表现得自信心很强。侃侃而谈可以改为

夸夸其谈,这是个贬义词,不过我至今喜欢这种人。如果肚子里没有一定的货色,没有见解或者要隐瞒自己的见解,他夸夸得起来吗,特别是在我们这些人面前?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作为接管新华社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到了新华社总社,我们又相见了。他常来谈天,说到新华社里几个他认为很有学识的人,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也谈到他的住处太狭小,这方面我无能为力。有一次他说,中国社科院要他,好像是要他去当美国研究所所长。我赞成他走。他是所谓的“极右派”,我估计他在新华社很难再升得上去,这样的人才窝在新华社太可惜。我想他对当官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住房和医疗条件是年纪老起来不能不考虑的两件大事,而这在当时是由职位决定的。我建议他要社科院来调他的时候说明白是请他去当美国所所长的,这样我就好批准。那时我是新华社副社长之一,对干部的调动有审批之权。这时,我在新华社任副社长,对干部的调动有审批之权。他走了之后,我在党组会议上提出:人们说新华社是藏龙卧虎之地,在新华社是条虫,放出去是条龙。因此我建议,今后凡是有机会到别的单位去施展的,我们不要挡人家的路。没人反对,算是通过了。因此我就更加放手有求必应,包括一位译著等身的专家要求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工作,和刚进新华社又联系好了到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有人说怪话,说谁要想出国,去找李某人好了。我确实放出了一些龙,慎之是条特大的大龙。顺便说说,那时新华社早已人满为患,这是计划经济的恶果之一。国家计划委员会每年要分配来六七十个大学毕业生,我们曾经要求停一年,让我们先把去年新来的培训一下。回答说那不行,你们不收,难道叫我们计委把他们养起来吗?把人养起来就是给个铁饭碗,它的另一面是把人管起来。要养起来才好管起来,因此各单位很自然地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进不出,于是乎到处人浮于事。

这铁饭碗赛过孙猴子头上的花帽子,每当孙猴子被认为不听话,唐僧就念紧箍咒。好学深思、有独到见解、又喜欢发表意见的李慎之,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受苦20年,从此噤若寒蝉。经过毛老人家去世,四人帮倒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

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早春天气,慎之还是心有余悸,只敢动口、不敢动笔。直到九十年代初,他才开始写文章。不很熟悉他的人一看,可能要认为此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 二

我说不出他开始写的是什麼。我知道的是,从全球到中国、从文化到政治、从回顾历史到瞻望将来,他议论的面很宽;不过大体上有一个中心,如他自己所说:“总是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他当然十分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我看过他这方面的两篇文章,都是在《改革》杂志集会上的讲话。第一篇在1997年11月,题目是《也要推动政治改革》。第二篇里他说:“事隔8个月,我已经从当时觉得‘应当’变成觉得‘必须’了,而且紧迫感也大大增加了。”他说促使他这样想的是许多事实。他讲到东亚经济危机不断深化,被世人目为东亚经济火车头的日本竟落到了自身难保的境地,突出的事件还有执政32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竟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匆匆下台,持续几十年的每年高达百分之八的辉煌增长率也保不了他的权位。他还说到,一个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时代的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而我们不仅知道自己处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而且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

我抄下这些话来,还有另一层用意,是想借以说明他的眼界之宽阔和历史感之深沉。他确实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这是他的特色,我读他的文章常常感觉到这一点而自叹不如。

### 三

他寄给我的文章里有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文末用铅笔写了两行,请我阅后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我没有立即答复,因为几天以后就见面了。我说我赞成他的意见。他文章中提出的“中国专制主义”就是大家说惯了的“封建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多次,虽然每次不过三言两语。我的

文章里曾经用过“封建主义”，后来不用了，改用“专制主义”，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不过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说“封建主义”一词对中国不适合，那是日本人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只适合欧洲的情况。秦始皇改封建制为郡县制，中国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是专制主义。但是最近从《同舟共进》今年第4期看到理钊的文章，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认为很有道理，不知道慎之以为如何，可惜再不能听到他的高见了。

理钊说：“李慎之先生等专家学者对自秦至民国前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命名进行了质疑，指出中国历史中只有西周时期才能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封建社会。”理钊肯定这个质疑有理，也认为“所谓‘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确是个不伦不类的谥号”。接着笔锋一转，写道：“然而，从思想精神或文化传统上讲，这貌似不伦不类的封建社会，却又是由纯粹的‘封建精神’来支撑的。”他的根据是：“由‘分封建卫’的封建制度可以看出，它是典型的‘家长制’；‘天子’是老子，受封诸侯是儿子，儿子听命于老子。一级级封下去，梯次明显，当然是等级制。”“个人崇拜”更好理解，不将自己树成“天子下凡”、“半人半神”，其他人怎么会甘心做奴才，不生异心谋不轨呢？所以，“家长制，终身制，等级制，特殊化，特权和个人崇拜等既是封建制度的要求，也是其应有的表现。”

理钊的许多话很有说服力。他是在读了那篇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有名的《访谈录》——访李维汉谈他建议邓小平讲反对封建主义一文以后写这篇文章的。他希望随着这篇《访谈录》的解封，使对“封建”的解析也深入下去。这是我所赞成的，虽然我不是专家，更不是学者。我想慎之提出这个问题来，用意也在于

此。我现在还有所保留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确实等级森严，如理钊所说“梯次明显”。但是秦汉以来，郡县长官都是由中央派遣，而不是“一级级封下去”的。理钊说：“为了扫掉‘封建’，首要的是必须仔细地看清它是一件何样的东西。”我真诚地希望大家继续探讨。

#### 四

慎之可能是在现代中国从政治范畴重新提出自由主义的第一人。胡适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谈到胡适，也就谈到鲁迅，他们都是“五四”时代的名人，又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物。2002年8月19日晚李慎之来电话，称赞湖南《书屋》杂志第八期邵建的《事出刘文典》很好很好，很值得看。第二天黄永厚也来电话称赞这篇文章，说他读了好几遍。文章很长，主要是评论鲁迅与胡适，通过胡适等人反对蒋介石对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的非法行为，比较鲁胡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1929年，蒋介石国民党“北伐”成功，加上东北三省“易帜”、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表示归属南京中央政府，从而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局面。蒋介石国民党便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国民党来训老百姓，等到训好了，经过国民党还政于民而进入宪



李慎之（前排左二）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创刊20周年纪念会上与朋友们合影

政时期,那是将来的事。训政时期只允许存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胡适、罗隆基这些自由主义者便在《新月》月刊上公开表示反对,主张实行民主,保障人权。胡适开了第一炮,借刘文典一事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问难蒋介石国民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人权运动,是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面对面的冲突。胡适说他不用匿名方式写文章,他说“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结果是这些“人权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腹背受敌。正面是国民党政府的打压。胡适被国民党政府警告。罗隆基先是被抓、关了一天,后来又又被敲掉了光华大学教授的饭碗。在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千多份杂志被没收。这些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鲁迅。鲁迅本来应当是盟友,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不料他却站在这些人权派背后放冷箭,客观上站到蒋介石国民党那边去了。

我再三读了邵建这篇好文章,心情很不平静。几天以后我说,问题还在于我们这些“时代精英”、三八式(1938年参加革命的人)及其两头的三七式三九式,甚至还可以伸远一点的“这个时代的精英们”,何以毫无例外都那么崇拜鲁迅、都那么看不起胡适呢?是不是起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的世界潮流、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这是主要的。第二是不是鲁迅这支笔了不起。慎之随口答道:是啊,你看他那篇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得真好。后来我想还有第三,我们这些人太狂热,这狂热变成了宗教般的偏执,于是乎一叶障目而不见舆薪。从慎之的文章里我们看得到类似的更为广阔和系统的反思。

关于胡适与鲁迅,这两年我们多次谈起。我感觉到他思想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越来越看重胡适,对胡适的评价越来越高了。不记得哪一份报刊(大概是《炎黄春秋》)最近披露了抗战时期胡风在重庆发动他那班朋友批评姚雪垠的事。我也看了那篇文章。慎之说披露这件事很重要,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胡风。我说看来胡风“左”,宗派主义情绪浓。他表示同意。我说我觉得鲁迅也是这样,在这两点上他们两人气味相

投。慎之也表示赞同。他稍微停了一下,突然说道:“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他这个意见我也是赞成的。当然,我们并不否定鲁迅的伟大和胡风及其朋友们所受的冤屈。

## 五

他去世以后我重读了他几篇文章。他一再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说人生如果真有下一代子,他愿意再当个公民教员。他说所谓“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其实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的内容当然包括公共道德,主要的是民主宪政的知识,培养这种思想和习惯。这后一方面,我说过我自己就要补课,这些年我确实在认真地勤奋地补课。我读慎之的文章也带有这种补课的性质。前面说到的那场“人权运动”中,胡适、罗隆基们倡导的“人权”、“宪政”、“法治”等等,鲁迅实在听不明白,他读书的经历没涉及这一方面。瞿秋白、鲁迅《王道诗话》中引用英文“字林西报”所载胡适的谈话中说:“任何一个政府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这句话本身固然站不住脚,而且“权力”与“权利”也分不清。他们都是文化“泰斗”,犯这样的错误不是也应当补课吗?那一辈人早已不在了,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如何?报载最近“非典”高峰期间,北京和广州有些大学生不听劝告离校回家,弄得湖南很紧张。那些大学生何以如此,我想恐怕也只有缺乏公民意识因而缺乏公共道德才能解释。慎之当过中学的公民教员,我想他应当是我们大家这一课的教师,事实上他已经起了这种作用,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家的这位卓越的公民教师过早地走了!我们留他不住!他的女儿正在编他的文集。他的文集能够在国内出版吗?我希望现在就能!

2003年5月12日

# 聂绀弩识知冯雪峰

● 姚锡佩



丁聪画

月白风清身酒店，山遥路远手仇头。  
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干校曾经天地秋，归从干校病添愁。  
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

上述这首诗是聂绀弩在1986年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时写的，题为《雪峰十年祭（二首）》。“月白风清”、“山遥路远”二词形象地写出了名如其人的雪峰严于律己、不畏艰险的高风亮节。不少人认为此诗颂扬了雪峰身在“莫谈国事”的酒店（社会）中，却一往无前地手写革命文章，不怕杀了自己的头，此即谓“手仇头”

也！然而，审视全诗，我认为上述见解只是表达了绀弩识知“雪峰手仇头”的一个层面。令绀弩更为感叹、悲愤的手与头作对的事情，便是雪峰在革命阵营中所受的无数冤屈，为了顾全大局，写下了一些违心的文章乃至被迫检查。尽管结果他仍被无辜地开除了党籍，但他对党的忠诚丝毫不减，以莫大的勇气，决心书写一部由兴到衰的太平天国小说《小天堂》。诚如绀弩在《雪峰六十》中吟咏的：“酒边危语亦孤忠”，怎不让绀弩为这位有赤子之心的老友发愁？因为他们早已被打入另册，即使忠言，非但无人听，还言之有罪，故有“人不言愁我自愁”之叹。

第二首以“干校”喻文化大革命，雪峰深刻地感受到由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延及社会的自相残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目睹他曾为之奋斗半生的新中国竟是一片秋风肃杀的天地，怎能不忧愁？——“归从干校病添愁”，1976年1月31日他忧愤而死。虽说他死于肺癌，实为长期摧残所致。雪峰未死于敌人的枪下，却倒在各种“同志”的口诛笔伐中，怎不令人为之悲愤？又有多少像雪峰这样的“孤忠”之士，死于“自己人”的摧残？绀弩想起当年反清志士章太炎鼓励同牢邹容的诗句：“临命须携手，乾坤只两头”，不由问道：“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我最初读这首诗时，即为这一问语而震撼。因为它不仅肯定了雪峰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深深地引人反思：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了创造一个光明的中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1986年许多中国人思考的问题，而忠贞不贰的冯雪峰遭遇的悲剧性，更加深了这一思考和忧虑，正是：

“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二

文章注脚今天下，思想核心旧鲁公。  
千手观音千管笔，一行和尚一行钟。  
宋唐秦汉人揩眼，泰华嵩衡尔荡胸。  
底事流离兼坎坷，万原上党又雪风。

这是绀弩《赠雪峰（二首）》中的一首，从诗的内容看，可能写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1967年冬绀弩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之前。因为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了阮铭、阮若英夫妇的文章《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6卷的一条注释》，完全否定了1958年对鲁迅O.V.笔录《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成因的注释，使30年代以来有关“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问题出现在“天下”。不过，这次不是像1958年那样以一条偏向“国防文学”派的注释来批判冯雪峰（即O.V.），而是要借鲁迅这面大旗打倒原主张“国防文学”的“四条汉子”。至于1958年已被打成“右派”的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早就被戴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投入“牛棚”。绀弩的这首诗，正是对这种颠来倒去歪曲历史的愤慨，也是对历经流

离坎坷的冯雪峰的信任和鼓励。他相信已看清历朝变故的雪峰，心中定能承受五岳风起云涌般的震荡，会明白这次新的灾难，乃中国大地刮起的又一次暴风雪。

对“两个口号”论争这一历史公案，绀弩自有看法。他对雪峰最初的亲身“识知”，即来自《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对他的指名批评。在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那末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

这一批评无疑在绀弩的心灵激起不平常的波澜。记得1976年我第一次访问他，请教“两个口号”争论问题时，他刚从十年监禁中释放回家。这位历经批判、流放、刑狱的老人，貌已干枯，对30年代的旧账毫无兴趣，他久久不回答我的问题。但在难堪的沉默后，他竟十分认真地反问我：“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一直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可是鲁迅却批评了他。这个人名叫聂绀弩，就是我！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也就秉直相告：据新的《鲁迅全集》（征求意见稿）对《答徐懋庸》一文的注释，绀弩曾作《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强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同意胡风所说的，这一口号“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这种强调，实际上和“国防文学”的提倡者和解释者一样，都犯有“争一统”的宗派主义倾向。不过，我还看不出他的文章和鲁迅的意见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不是也跟鲁迅一样说过“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之类的话吗？我奇怪鲁迅和冯雪峰为什么独独点名批评他？于是请问他是怎样看待这一批评的？可是，他再也不开口了。

直到我成了绀弩先生的熟人后，他才跟我略说30年代那场纷争。他痛心地说：唯心主义的思想在我国文艺界有相当深的影响，因人立言，因人废言，因人而异的思想方法，往往造成文学界不必要的纠纷，也妨碍了后人对文学史上的问题作出正确的总结。当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本是冯雪峰、胡风和鲁迅一起商量形成的，但因为是由胡风首先撰



鲁迅与冯雪峰（中）

回想西湖湖畔社，九天阊阖一齐开。

冯雪峰 60 岁时，绀弩曾作《雪峰六十（四首）》，上述诗即其中的第一首。

绀弩一直尊雪峰为前辈、师友。其实，他们都是 1903 年同龄人，且几乎是同年以新诗走上文坛，又都早早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中，他们的性格还都以倔强、耿直著称。不过，从浙江义乌县南乡神坛村走出来的学子冯雪峰，有着浙东山民的坚硬刚直之风，而出身于湖北京山县市民家庭的聂绀弩，则有着散诞不羁之貌。

绀弩尊敬雪峰，是因为雪峰早在 20 年代初即与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一起以“湖畔诗人”之名著称于文坛，而且在 1927 年革命低潮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还因为雪峰有着坚定的信仰，在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白色恐怖中，依然以“画室”之名埋头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鲁迅所能信任的党内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1930 年之所以能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党就是通过冯雪峰做鲁迅的工作，以其特有的真诚品格，化解了鲁迅与犯有“左”倾错误的“太阳社”、“创造社”的矛盾。他后来又领导文艺界展开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1933 年 12 月他去江西中央苏区之前，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还是仅有几个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作家，具有很高的声誉。上述七律诗即描述绀弩最初通过各种媒介所“识知”的冯雪峰。

相对来说，绀弩在政治上走的是一条曲折的路。1920 年他因在报上发表新诗，得到他老师孙铁人的赏识，被召到上海学习英语，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参加“东路讨贼军”对北洋军阀的战斗。后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不久又考取苏俄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有不少师生后来分别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而他当时的思想却很混杂，早已看过《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却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面对国共两党的斗争，他竟置身事外，潜心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因博览群书，故被同学戏称为托尔斯泰。1927 年回国后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等职。直到 1931 年“九一八”后，因写抗日文章，批评蒋介石政府的

文提出，就引起了提倡“国防文学”，且自居为左翼文坛领导者的大大不满，于是大开笔仗。冯雪峰为了顾全党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大局，建议并代病中的鲁迅起草了一篇正面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文章，同时纠正论争双方的偏向。点名绀弩，不仅因为他曾响应胡风的意见，还因为他与周扬、夏衍等“国防文学派”的关系也不错，不像胡风那样对立。后来我见夏衍晚年在为《聂绀弩还活着》一书所作的《代序》中说：绀弩“他很珍视友谊，他和胡风关系好，但不少文艺上的观点两人并不一致，有过争论，这无碍于他们的私人友谊。胡风被批，他不跟着反胡。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他是支持胡风的，在口头上和我争论过，这也无碍于我们的友谊。”确实，绀弩此人非争领导权之类，而且是难得的能把友谊和文艺观点、政治观点分开的人。

然而，当年绀弩看到这个批评时却很不解，本想再写文章，但胡风对他说，鲁迅和冯雪峰希望我们不要再写了。为了顾全大局，也出于对前辈的尊敬，他再也没有辩解过，也不记恨冯雪峰。这场左翼文坛内部的论争果真也在雪峰的斡旋下平静下来。不料，这一历史公案在新中国竟被反复颠倒，成了打人的靶子。正如他在诗中嘲笑的那样：“千手观音千管笔，一行和尚一行钟。”他与我相识之初缄口不谈“两个口号”之争，即出于对这种歪风的深恶痛疾；而他后来之所以跟我讲这一段往事，也是因为出现了一位当年论争者讨伐冯雪峰的文章。尽管他和这位作者交谊不薄，但对友人鞭尸的行为极度不满。由此他更钦佩冯雪峰在周扬等被打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有落井下石的行为，这也是他在重病垂危之际，颤巍巍地写下绝笔《雪峰十年祭》诗二首的原因。“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表达了他对这位光明磊落、始终顾全大局的革命前辈的敬意。

### 三

早抛小布方巾去，时有普罗灵感来。  
刚见论争通俗化，忽惊名列索维埃。  
长征五岳皆平地，小饮三江一酒杯。

不抵抗政策而遭监视。他逃往日本,结识大同乡胡风,由其介绍参加“左联”,共同宣传抗日,1933年又一起被日方驱逐回国。1934年他由同乡吴奚如(共产党中央特科成员,曾为周恩来秘书)等介绍入共产党,曾被派往国民党康泽处刺探情报。但他主要从事小说、杂文等创作,因编副刊《动向》而与鲁迅相熟,并与萧军、萧红夫妇结为好友。这些友人无不敬重鲁迅和冯雪峰,因此在文坛常被视为鲁迅派或雪峰派。

其实,雪峰对亲近的作家要求更严,责令胡风、绉弩等顾全大局,不再参与两个口号的论争便是一例。不过,他也很信任这些友人。1936年9月,冯雪峰首次见到绉弩,便决定委派关系广泛的绉弩护送刚从南京逃出来的丁玲去西安,以便前往延安。当绉弩完成任务回到上海的那一天,正值举行盛大的鲁迅葬礼,绉弩即参加这一项由冯雪峰积极策划的活动,将灵柩护送到万国公墓。这是他们相交相知友谊的开始。

### 四

小帽短衣傲一时,灵山献颂见襟期。

头颅险在上饶砍,名姓岂惟中国知。

扬州明月茅台酒,鲁迅文章画室诗。

他人有此或非乐,我老是乡将不辞。

上面这首七律是《雪峰六十》的第二首,是绉弩抒写对雪峰的进一步“认知”和崇敬。

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绉弩即参加救亡演剧一队,离开了上海。而雪峰却因为不同意博古所阐述的以改变红军、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来求取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也不同意王明他们在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与博古发生激烈的争吵,乃至执拗地向党请了长假,回到老家创作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当1939年深秋绉弩从皖南新四军转至浙江金华,参与邵荃麟等编辑的《东南战线》、《文化战士》、《刀与笔》等刊物时,恰巧雪峰也在金华找到邵荃麟,向其倾诉了他与博古的矛盾、争执,及未按组织要求去延安的缘由;同时汇报了自己在乡下写作及帮助建立宣传抗日政工队的情况。1939年冬,恢复了组织关系的雪峰,成为新成立的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显然,当时住在

荃麟家的绉弩,对雪峰这时期的工作和思想是了然于心的,对雪峰刚直不阿、坚定不移的脾性,有了贴近的了解,因此更加崇敬,但绉弩深知如此性格者,很难见容于世。在延安,在大后方,绉弩都听到过某些人对雪峰和鲁迅关系的诽谤,不禁又为其添愁。

1940年春末,绉弩被邵荃麟推荐到桂林任《力报》副刊《新垦地》主编。次年1月,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雪峰未及及时按邵荃麟之嘱撤至桂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押至上饶集中营。在敌人酷刑、苦役、疾病、死亡面前,他不仅誓不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在报上发表与共产党无关系的声明,还串联难友,策划越狱;而且透过铁窗,仰望遥遥相对的雄伟挺拔的灵山,神思飞扬,奋笔创作长诗《灵山歌》,歌颂曾在那里辗转战斗的太平军和方志敏烈士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他还写下几十首短诗,结集为《真实的歌》,抒写了不为敌人脚镣手铐锁住思想和灵魂。这些诗在两年后雪峰因病被保释出狱辗转至重庆时,陆续出版。其时,绉弩也在重庆,他读了这些正气冲天的长歌短诗,不禁针对那些无稽的诽谤,表达自己由衷地推崇鲁迅文章画室诗,“他人有此或非乐,我老是乡将不辞”。

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后雪峰去了上海,他们间很少联系,但仍相互关心着。1946年,任中国劳动协会重庆福利社主任的绉弩妻子周颖及20余位同志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冯雪峰积极参与营救,终于获释。其后,绉弩去香港写了无数短小精悍针砭时政的杂文,雪峰则在上海创作众多隐喻人生和社会的寓言,在不同的地区和岗位上摧毁旧社会,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 五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1976年农历除夕,冯雪峰病危住院,次日走完了73年坎坷的人生路,含冤而死。而与他同岁,生于除夕的聂绉弩,却在这一年“四人帮”倒台后不久的10月,阴错阳差地以国民党战犯的

身份从无期徒刑的牢狱中被特赦生回。当他得知可敬的前辈雪峰死了，悲从中来，痛惜知己：“天晴其奈君行早，人死何殊睡不醒。风雨频仍家国事，人琴一恸辈行情。枕箱关死千枝笔，忆鲁全书未著成。”痛定思痛，在这一年的12月21日手录《挽雪峰前辈四首》定稿，以志纪念。挽诗一经传出，便广为流传。本节开首所录的即其中第一首，第二联“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尤深入人心，因为他高度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遭遇和难为人知的心情，而这正是绉弩对雪峰和自己最最痛苦、忧愁的“识知”。



左起：萧军、胡风、聂绉弩在一起

绉弩对雪峰最为亲近的“识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雪峰领导下较长期工作之后。1951年3月，明知京城矛盾多的雪峰，以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原则说服自己，离开上海进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任后他选的副手中就有聂绉弩。当时绉弩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欲回京与家小团聚。但在工作安排上，不是他看不得上级的官气，就是上级嫌他太自由主义。雪峰却说：“绉弩这个人桀骜不驯，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因为他知道惯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绉弩，工作效率颇高。况且绉弩写的那些名文如《韩康的药店》、《论申公豹》、《论通天教主》、《论武二郎》、《探春论》等，都显示了丰富扎实的历史、文学功力和敏锐的历史穿透力，所以雪峰毫不犹豫地委任绉弩为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二编室）主任。绉弩也没有辜负雪峰的信任。

这一年9月绉弩一上任，就接受雪峰的指示：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雪峰强调整理遗产，就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不能随意删改古书，但可以通过注释条目再加上有分析的出版前言予以出版。这些提示对解放初期的出版工作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当时具体执行这些指示的便是绉弩。

他们商定首先整理人民性很强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绉弩积极搜罗各种繁简版本及有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考订。在雪峰的支持下，绉弩还亲自前往传说中的施耐庵故乡苏北兴化及扬州、南京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绉弩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水浒》五论，影响极大，他被全国各地邀请前去演讲达50余次。雪峰也在百忙中撰写了长文《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陆续在他主编的《文艺报》发表，起到了极好的先期宣传效果。因此当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重新校订、注释并有绉弩《前言》的七十一回《水浒传》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它视为新中国出版界的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雪峰和绉弩还想方设法罗致人才，研究整理《楚辞》、《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绉弩的工作方式很特别，如许多人回忆的那样：他住在出版社，习惯于晚上工作，很晚起床。常常衣冠不整就来办公室。谈工作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然不时会联想起工作上的问题，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有些工作，就这样定下来。

尽管在雪峰和绉弩的领导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出一本古典书籍，在社会上都产生很大的反响，但人事部却责难绉弩领导无方，一位新来的

副社长也把“二编室”作为整顿的试点,并与雪峰闹矛盾。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借“三反”运动之机,以官僚主义之名大肆攻击雪峰。对此,不怕别人说自己什么的绀弩,一反他平时不关心政治会议的常态,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把对方夸大之词,不实之情,非善意的气度,批驳得淋漓尽致。

但更大的风暴紧接而来。批判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时绀弩突然被监禁反省,逼迫他交代和胡风的关系,以及与某些国民党员如康泽等的交往。心怀坦白的绀弩便在检查书上一开始就自我定性:“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实事求是地说明交情之深;至于和康泽等交往,则是为了给党搞情报和策反,当然也是鉴于跟他们有旧交情。如此深挖思想的交心,却依然不被信任。尽管内查外调后,打不成胡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却非要给他扣上一顶“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帽子,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和撤职)。整个古典部也被打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小集团”。雪峰十分反感对绀弩等的打击,但他已无发言权,一股“用人不当,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炮火早已投向他,更何况其时他正在为《文艺报》写的一条按语而大受责难。

冯雪峰万万没有想到,他支持发表的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竟会因自己写的一条简单的按语,遭到《人民日报》发文字质问,被批为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是

“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大批判。当他得知这是党为了进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只得按上面下达的口径写检查。即使这样,他仍被当成替罪羊,撤去《文艺报》主编职。到了1957年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时,雪峰又被点名。紧接着便是抖出1936年那篇经他笔录,鲁迅修改过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各种批判文章信口雌黄,无视原稿中鲁迅亲手批评“四条汉子”的笔迹,硬给雪峰安上“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对此,雪峰实难想通,他多次认真地深挖自己在对待周扬关系上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但都得不到谅解。他被告知:只要安上述罪名的口径写出检查,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即可保留党籍。一生视党为生命的雪峰,又一次牺牲了自我。结果,他仍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在通过开除的决议时,他竟举起了自己的手;最后又向支部书记声明:“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待回归办公室和家里时,他才独自伏案痛哭。这是何等的“锥心泣血”?又是何等的“手仇头”呵?

当早已成“右派分子”的绀弩惊闻雪峰所遭到的毁灭性打击时,他想到了殷纣王挖老臣比干之心的故事。“哀莫大于心死”,他连筒筒菜——

无心菜都不敢买了,然而还得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他只能以散诞的语言和行为表达自己的悲愤,说:“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可是,组织上又以照顾年老的为名,把他们留在社里。绀弩却再也不愿看已变了颜色的“故旧”的面孔,也不愿做愚弱国民的“示众”教材,毅然去了北大



聂绀弩夫妇

荒。

## 六

荒原霭霭雪霜中,每与人谈冯雪峰。  
天下寓言能几手,酒边危语亦孤忠。  
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掷空山万壑风。  
言下挺胸复昂首,自家仿佛即冯翁。

这是《雪峰六十》的第三首,表达了绀弩在困苦中仍难忘雪峰高洁的品格和文学贡献。

1961年绀弩从北大荒回京,即去看望雪峰,并赠以诗,曰:

三年劳顿各东西,都在烟云变幻中。  
何物于天不肖狗,此心无地避鸡虫。  
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掷空山万壑风。  
岁序循环终古事,带来春讯是初冬。

此时雪峰和绀弩都被摘了“右派”帽子,他俩都曾出现幻想,故有“带来春讯是初冬”句。但他们不改的“此心”,又怎能有地避“鸡虫”?又怎能不被“天”当肖狗?他们只不过是“脱帽”右派,依然身在另册。当雪峰被告知他不宜创作描写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他伤心欲绝,只得把这部蕴积了他20多年心血的书稿,投入炉火,转而构思写太平天国兴衰的《小天堂》。其思考即如绀弩在《雪峰南寻洪杨遗迹(四首)》中所写的:“大事何因终债了,百年谁有一言乎”,旨在总结前人尚未说出的失败原因,以警世人。这时绀弩的幻想也打破了。他原想发表早在50年代就积累资料写成的古典文学论文,未料肯发表他论文的报刊《文学遗产》因不合潮流而停刊。他只得通过旧体诗与三五知友交流情感,雪峰便是他的知友之一。在他后来出版的《散宜生诗》中有多首赠雪峰诗,其中有一首即题为《雪峰以诗助依韵奉答(二首)》,诗曰:

新题材更新思想,新语言兼新感情。  
君每言之何切切,我能为之肯惺惺。  
人逢寻壑常孤往,船到穿桥自直行。  
他日吾诗光景好,雪峰高耸大河横。  
丁香花下读君诗,红在篇章紫在枝。  
我本黔驴无武技,君之塞马有归时。  
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  
最解庄生齐物论,无非物论本非齐。

从中可见他俩经常切磋诗艺,交流诗情。绀弩曾在《赠雪峰(二首)》诗之二中赞美雪峰:“君意掘泉比井深”。可惜雪峰的旧体诗不知何故仅存几首,其中有一首《塞童》:

天赐塞童千里驹,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马术,立即颠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祸福玄谈只自欺。

而上述绀弩“奉答”之二,恰恰是对《塞童》的唱和。显然绀弩并不像雪峰那样,一意从自身来找残缺的原因,倒是认定了“出水才看两腿泥”这一生活的真理,及“物论本非齐”的事实。正如他后来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说是北大荒的伐木劳动,产生了“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的体会,因此醒悟到“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之喻,隐含了“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的哲理。他从无期徒刑的绝境中生还后,更借用周文王九个“乱臣”中的“散宜生”之名为号,命所作的诗为《散宜生诗》,谓:“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事实岂止“而已”,这几百首“散宜生”旧体格律诗,已被公认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他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史诗上独一无二的”。绀弩不意自己会获得如此崇高的赞美,而这特色中不正有着雪峰对他的勉励,不正应着了绀弩的预言:“他日吾诗光景好,雪峰高耸大河横”!

综观现已收集的聂绀弩旧体诗中有关雪峰的诗,共有9组18首,在赠友人诗中无论是数量和内容上,都属最为丰富。还有一首最近才从关押他的司法机关档案中发现的无题诗,诗云: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  
不穷不老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虫。

未想这首蛰居于北京半壁街的小诗,竟成了判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由此可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草木皆兵矣!

读绀弩赠、挽雪峰诗,犹如进入二人相交相知40载的情谊中,不由为两人的真性情所感动,为他俩坎坷的遭遇而感慨,为他们的思索而再思。遂发为文,纪念我尊敬的两位前辈百年诞辰。

(责任编辑 方实)

# 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

● 刘书旺 刘小清

## “第三种人”苏汶率先启衅

20世纪30年代初,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第三种人”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

“第三种人”与“新月派”“自由人”不同,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绅士政客、学者教授,而是同左联有着很深交往甚至参加过左联的“同人”,他们也曾翻译过苏联的文艺著作,并自称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其代表人物即苏汶。

苏汶原名戴光崇,又名杜衡,1926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不久即与就读于大同大学的施蛰存和就读于震旦大学的戴望舒相识。这年3月,他们共同创办了《瓔珞》旬刊。1926年正是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7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10月,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革命前进的步伐吸引了苏汶与他的朋友,于是,他们停办了《瓔珞》,走出文学殿堂,投身到实际斗争中。苏汶与施蛰存、戴望舒一同加入了共青团。当时他们三人同住一个宿舍,可谓形影不离。特别是组织交给他们散发传单任务的时候,他们往往一个在前注意巡捕;一个殿后,提防有人跟踪;而中间一人则将预先准备好的传单塞入老百姓家的信箱、门缝。一日,苏汶与戴望舒到一个团小组所在地活动,遭便衣警察逮捕,后经保释出狱。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骤然紧张,他们随后即离开上海。苏汶与望舒同回杭州,而施蛰存则回松江老家。不久,苏汶因“心境非常沉闷”,遂与戴望舒一道来到松江。这样,苏汶、施蛰存和戴望舒在松江一起从事文学

创作和翻译,办起了“文学工场”。其间,冯雪峰因北京军警在北新书局抄到他的一部译稿,扉页写有“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为此遭到通缉,被迫南下到施蛰存家。冯雪峰是颇负盛名的湖畔诗社的诗人,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共,既有铮铮硬骨,又重友情义气。冯雪峰的到来为“文学工场”增添了新鲜活力。在冯雪峰的影响下,“文学工场”开始翻译苏联的进步文学作品,苏汶亦由此受到进步文学的熏陶。1928年初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的同学刘呐鸥从台湾抵上海,在虹口江湾租了幢三层小洋楼。此后,戴望舒、施蛰存应邀搬到小楼同住。随后冯雪峰、苏汶亦抵上海。这样,“文学工场”一班人全部移师上海。1929年到1930初,普罗文学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左联成立时,冯雪峰是发起人之一,故而在他的介绍下,苏汶和戴望舒均参加了在上海中华艺大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同时也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

从苏汶的这段经历来看,他已经从一个自由文学人进入了左翼文学的队伍。然而,苏汶在左翼文学阵营的后院“放了一把火”。

1932年5月,施蛰存在上海创办了《现代》杂志,并声明“本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不难看出施蛰存似乎想达到某种超脱,然而他未免率真。就在左联正集中火力批判“自由人”胡秋原时,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扯起了“第三种人”的旗帜,开辟了新论战“战场”。

苏汶关于“第三种人”的典型表述是:

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

施蛰存对苏汶的“第三种人”是这样理解的:

这话是讲得很明白的。所谓“知识阶级的自由人”,是指胡秋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及其文艺理论。所谓“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在这两种人的理论指挥棒之下,作家,第三种人,被搞得昏头转向,莫知适从。作家要向文艺理论家的指挥棒下争取创作自由,这就是苏汶写作此文的动机。不是很明白吗?“第三种人”应该解释为不受理论家瞎指挥的作家。

然而,左联对“第三种人”的理解却并非如此。“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化的压迫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们就公开打出小资产阶级的旗帜,声称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作家,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而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算是‘第三种人’。他们在国民党压迫左翼作家,限制自由创作的情况下,不向国民党去争取创作自由,而向左翼方面去争取创作自由。”曾经担任过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的任白戈的这番话则体现了当时左联对“第三种人”的定性。

## 左翼阵线不相信“不偏不倚”

事实上,苏汶并未成为如他所说的“第三种人”,而是在声援胡秋原。他讥讽“文学是个卖淫妇,资产阶级想占有她,无产阶级也想占有她,于是文学便只好从良。”同时,他亦认为“左翼文坛霸占着文学”,使“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画之类;而作家也不再是作家了,变为煽动家之类。”

左联阵营最早对“第三种人”进行痛斥的是署名易嘉的文章:

事实上,文学也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有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

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

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的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他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

继之,周扬又写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一文,参与对苏汶“第三种人”的批判。

面对来自左联的声讨,苏汶又先后在《现代》上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左翼文学即是文学“受某种政治势力的干涉”;成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留声机,于是高声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

苏汶扛着“第三种人”的大旗,攻击左翼文艺的言论激怒了左联盟主鲁迅,鲁迅立刻写下檄文参加战斗,这便是鲁迅著名的杂文《论“第三种人”》,其中不无讽刺地说道: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面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鲁迅同时又针对苏汶关于“第三种人”因为害怕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被迫搁笔的观点,作了反驳: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家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预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鲁迅的《论“第三种人”》是左翼文坛对“第三种人”论战的最有分量的一篇檄文。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鲁迅的这篇驳斥苏汶观点的文章却是先交给了苏汶,并由他转交《现代》杂志发

表的。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左联对“第三种人”的论战,尚未形成水火不相融的局面,鲁迅对于苏汶,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用说理的态度,希望他能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冯雪峰生前回忆说:“鲁迅《论‘第三种人’》最后一句‘怎么办呢?’是我加上的,引用苏汶的原话,意在给对方留了后路。”

当年苏汶收到鲁迅《论“第三种人”》的手稿时,其心态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并未将此稿扣下,而是坦然地交给施蛰存并在《现代》上刊发。这一细节可以说明当时这种论争,既有双方观点上的不妥协,又有私人情感上的包容,既有斗争上的激烈,又有方式上的平缓。“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林默涵在建国后一次谈到当年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时,也有过类似之说:“鲁迅……那篇《论‘第三种人’》的文章,在理论上毫不妥协,指出作家超阶级的不可能,同时又有劝诱他们认识真理之意,而不是简单地骂。等到他们真正变成了国民党的鹰犬时,鲁迅先生就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了。”

### “雨巷诗人”戴望舒等 成为“苏汶之流”

当上海文坛围绕“第三种人”论战正酣时,与苏汶、施蛰存当年同在“文学工场”以后被称为“雨巷诗人”的戴望舒此时正在塞纳河畔的巴黎,戴望舒是自费赴法国索尔邦大学旁听的。学习期间,戴望舒选编了自己的诗集《望舒草》,并且翻译了《紫恋》、《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以及《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为此,他与法国左翼作家过从甚密。1933年3月21日,他参加了法国文艺家协会召开的大会,并应施蛰存之约,为《现代》专门写了《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

戴望舒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风闻国内左翼文坛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故而在文章的最后专门提及这一问题并表明观点。这位也曾是左联盟员的青年诗人说:“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他始终是一个忠实

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中国的革命作家有这种“愚蒙的见解”。继之,戴望舒又说:“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戴望舒当年曾与苏汶、施蛰存形影相伴,同气相求,故而对“第三种人”的同情完全在预料之中。本来这篇发表在《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的文章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鲁迅读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戴望舒在万里之遥的欧洲仍写文章呼应“第三种人”颇有些不吐不快。于是挥笔写了《又论“第三种人”》:

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它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

鲁迅在分析了每个阶级都有“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后,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是“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这才“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杂文中,点到了苏汶、韩侍桁、杨邨人之流的“第三种文学”。显然,在鲁迅的眼中,“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除苏汶外,还有韩侍桁、杨邨人。

韩侍桁是由冯雪峰介绍加入左联的。此前,他因在《语丝》上发表几篇译作而与鲁迅相识,并常有通信。他抵上海后,在鲁迅的帮助下,住进景云里与鲁迅相邻的一幢楼房的三楼,二楼住的是柔石。当时,韩侍桁与冯雪峰、柔石以及魏金枝等成为常在鲁迅身边的进步文学青年。

1931年秋,韩侍桁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当他返回上海时,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已近

尾声。为此,冯雪峰专门向韩介绍了这次论战前后的情况。韩侍桁自己说:“杜衡(苏汶)提出‘第三种人’口号时,我还在广州,根本没有参与这个事情。到了1933年,我才写了几篇有关‘第三种人’的文章,可见我卷入得比较晚。但我有个想法却为时已久,我认为提无产阶级文学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搞无产阶级文学的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不是无产阶级,他们对于无产阶级政治只是隔靴搔痒的理解。而在文学方面也没有一部像高尔基的《母亲》那样有切身体会的作品。我认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的形势下,并不是非此即彼,还有另外的道路,小资产阶级文学还有发展的可能。所以我赞成‘第三种文学’的主张。”由此可见,韩侍桁是自己主动投入“第三种人”怀抱的。

杨邨人是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成员,他早在1925年就读于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时即加入中共,当时董必武还担任了他入党仪式的监誓人。杨邨人因当时出版有中篇小说《失踪》以及《战线》、《狂澜》、《苦闷》3本作品集而在文坛享有知名度。1930年6月,杨邨人加入左联,以后又成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第一任党团书记,不久又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杨邨人与胡秋原、苏汶、韩侍桁均相识,并且接触频繁,因而很自然地在文学观点上受他们影响。杨邨人曾写有《论“第三种人”的文学》的文章,以“和左联诸同志讨论”,称“左联放弃了最大多数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现在应该扶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而转变战斗的对象向鸳鸯蝴蝶派进攻,并且左联不是共产党,不应该以政党的立场为文坛的立场而对于‘第三种人’的作家加以攻击和非难。”该文当时未能发表,以后他改写成《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发表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

## 歌特的文章及左联反思

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在上海文坛造成极大影响,也引起了各方关注。在此要特别提到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的署名“歌特”的文章,题目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

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继之,则论述了这种关门主义的首要表现在于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极左观点”;并称“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文章的结论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

歌特的观点高屋建瓴,显然不同凡响,给当时的左翼文化界震动很大。歌特是谁?一时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一答案在当时并未明朗,人们只能从文章的高度和语气中推测歌特一定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事实上,直到近几年我们才从史学家的有关研究论证中了解到,歌特即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

张闻天的文章当时确有拨冗之功效。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的回忆中,以大篇幅谈到了这篇文章,并认为它“无疑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确实,张闻天文章发表后,左联部分同人开始对这场论争进行反思。冯雪峰即分别以“洛扬”和“丹仁”署名,发表有《并非浪费的论争》和《关于“第三种人”的倾向与理论》两文。其中无论是观点和语气都显得较为宽容。文章提到:“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我们认为苏汶先生的“第三种文学”的真的出路,是这一种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义,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起来,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

很显然,冯雪峰的观点是受着张闻天文章的影响。事实上,鲁迅亦曾说过:“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茅盾当时也曾对夏衍和叶以群说过:“排斥小资产阶级作家,左联就不能发展,批‘第三种人’的调子,和过去批我的《从牯岭到东京》差不多。”言辞之间,不难读出茅盾对这场论争的基本态度。

在回望左联与“第三种人”论争的这段历史时,不能不特别提到“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苏汶的结局。抗战爆发后,苏汶便抵香港,与在香港办蔚蓝书屋的陶希圣搞在一起,以后又随陶希圣返重庆,投靠了国民党,进入中央日报社。同为“第三种人”的杨邨人在组织派其往洪湖苏区工作后,因根据地失陷而逃往汉口,叛党变节。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 (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 (全四卷)	萧延中 全价	88.60	10.00
之一 “传说”的传说		28.80	4.00
之二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20.00	4.00
之三 在历史的天平上		19.50	4.00
之四 思想的永生		20.30	4.00
回首残阳已含山	殷 毅	16.00	4.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4.00
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朱永红 (全四卷)	69.80	7.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程门立雪忆胡绳	郑 惠	12.00	3.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4.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4.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航天情——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16.00	4.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 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 (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 (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是由《党的文献》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旨在将从“文化大革命”前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多年间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依据翔实可靠的材料,以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呈现给读者,从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所走过的这段历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这部长达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是在军委张震副主席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由萧克将军题写书名。此书重点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概述了正面战场的战况和战绩,回顾了成就与过失,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借以启迪后人,指导未来。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本书展示了过去13年的大脉络,书中牵涉众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叙述了很多小人物和小事情。内容浩繁,见解独到,既有极强的政治震撼力,又有历史的穿透力。它展示伟人风范,却让普通人的悲欢成为众目所矚,它针砭世情时弊,却让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 名将辈出的 云南陆军讲武堂

● 徐 平 张志军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开办于1909年。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讲武堂(天津)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三大讲武堂。

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堃经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高尔登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学科主要进行军事理论教育,术科是为配合军事理论教育而进行的实际技能训练。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如唐继尧、李烈钧、刘存厚、罗佩金、顾品珍、方声涛、王柏龄、杨杰等。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邻省甚至邻国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据不完

全统计,从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鲜、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200余名。

1930年,龙云在讲武学校成立滇军教导团(全称“讨逆军第十三路军教导团”),龙自兼团长,除步、骑、炮、工四兵科外,增设宪兵、经理、交通三个区队以培养专业军官。教导团共办三期。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学校共办22期,包括校内举办的各种培训队、班,共培养各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

1938年,按黄埔军校系列,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黄埔军校的9个分校,均由蒋介石兼校长,具体实行主任负责制,昆明分校由龙云兼主任。依照黄埔军校系列定为黄埔第十一、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期,培训各类学员近8000人。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9月,第五分校奉令停办。

云南讲武堂师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

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开办时所聘任的38名教职员中,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分子占了绝大多数,总办、监督、提调三个最重要职务始终都掌握在同盟会会员手中,各兵科科长、执事官等也都是同盟会会员或革命分子。革命党人不断向学员灌输“推翻帝制,打倒列强,富国强兵”等训示,成为学员的奋斗目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

纷纷响应,相继光复独立。为布置起义,昆明革命党人从10月16日到28日短短的十多天里,先后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了具体起义日期,并对起义的步骤、兵力和进攻路线都作了详细规定。10月30日,农历重阳节,起义爆发后,讲武堂师生立即投入战斗,总办李根源、教官唐继尧、刘存厚、张子贞、王兆祥、孙永安、王廷治等分别率领起义学生和部队占领城门、总督府和城内其他重要机关。作为这次起义主要军事力量的讲武堂师生,第一次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这所近代化军事院校卓越的教育成果。起义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经过十几个小时激战,于31日下午控制了全城。

昆明起义后,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一批讲武堂主要官员、教官调军政府任要职而成为领导核心,如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总长,唐继尧、刘存厚任参谋部次长,李鸿祥任政务厅厅长……

1915年12月1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消息传来,全国一片声讨,云南首先发动起义。12月25日,震惊全国的护国武装首义正式开始。云南组织了三支护国军和一支挺进军,唐继尧被推为云南都督总揽全局。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黄毓成任挺进军司令,策应各路。护国军上至将帅,下至排、连长,绝大多数出身讲武堂(学校)。

护国滇军出师云南后,各省纷纷起兵响应,广西、贵州、陕西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逆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不久,袁即忧郁而死。云南首义,各省响应,再造共和的伟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12月25

日被定为“云南护国首义纪念日”。

1917年7月,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独揽国政,废除《约法》,解散国会。8月,唐继尧以“维护约法,以靖国难”的口号,联合滇、川、黔军,组成靖国联军,参加护法战争。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任命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共同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其中,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靖国滇军,是军政府所依靠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一位法国观察家在《香港时报》评论说,他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特别是滇军军官要比广西、广东的显然要高明得多。……滇军素质上优越得多的原因,是他们在讲武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学校学习炮术、识图,认真进行夜间演习……”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滇军积极响应,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织滇军北伐军,原讲武学校校长、云南省省长兼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自兼滇军北伐军总司令,原讲武学校教官张开儒任副司令,以讲武堂毕业生杨希闵、杨蓁、金汉

鼎分任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任先遣军司令。讲武堂毕业生朱培德部,成为大元帅府拱卫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金汉鼎部编为第九军,范石生部编为第十六军,讲武堂前教官杨杰部编为第十八军,皆奋战在北伐前线。朱培德、杨杰还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参谋长。讲武堂毕业生、贵州省省长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派胡瑛、谷正伦两部进攻广西军阀陆荣廷,策应北伐,巩固了大本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讲武堂和讲武学校毕业生纷纷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军长曾万钟、孙渡、卢汉、王甲本、杨宏光,在中条山会战、台儿庄会战、湘桂战役、江西战役、长沙



蔡 锷

会战等重大战役中,浴血奋战,杀敌报国。军长唐淮源、王甲本,师长寸性奇,旅长陈中书,团长尉迟毓鸣、黄仙谷、薛金吾、潘尔伯、董文英等一批讲武堂毕业军官血洒疆场,壮烈殉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领导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同日寇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

解放战争中,不少讲武堂将领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加入人民阵营。领导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领导云南起义的龙云、卢汉、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第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等,对促进东北和云南的解放进程,起了积极作用。

云南讲武堂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出自这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崔庸健次帅,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大将。

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革命军的摇篮,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将星闪烁,冠盖云集,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人,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中较著名的有:

教官和官佐:

李根源 上将,陕西省省长,粤滇军总司令)

顾品琰 上将,滇军总司令,云南督军,云南省省长)

唐继尧 上将,云南督军兼省长,靖国军总司令,建国联军总司令)

李烈钧 上将,江西都督,护法军政府总参谋长)

张开儒 上将,滇军总司令,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罗佩金 上将,护理四川督军,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刘存厚 上将,四川督军,四川陆军检阅使)

赵又新( 上将,川滇黔靖国军第二军总司令)

杨 杰 上将,陆军大学校长,代理参谋总长)

毕业生:

朱 德 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



朱 德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叶剑英( 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崔庸健 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武元甲 大将,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朱培德 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代训练总监)

金汉鼎 上将,代理滇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范石生 上将,滇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胡 璜 上将,云南戒严司令部司令)

盛世才 上将,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赖心辉 上将,四川边防军总指挥,四川省省长,第二十二军军长)

龙 云 二级上将,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卢 汉 上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

(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迈出封建国门的 首批留美学生

● 木 华

中国留学海外的历史，最初萌发于明末，有一个叫殷实勤的学士，因偶然与一个来自西亚地区的教士认识，从他那里了解了不少中东、中欧地区的经济文化，从而生出了“去外面看看”的念头。但当他想请人造舰“出去”时，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他便决定带上八名弟子想通过西边去“外面”看，但途中却被抢匪洗劫一空。随后有人请军队相助，想去海外，因而引起朝廷关注而下令严禁“海外交流”之行为，并于1754年，杀了三个逮皇令者。再次真正出现这种与海外交流的声音，则已是在清末了。按照中国人几千年的思

维习惯，他们对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兴趣。他们只愿意“就地繁殖”——包括子孙的延续和文化的继承，这使中国人几乎毁灭性地强迫自然资源维持着他们世世代代的生存。在中国，背井离乡可谓最悲惨的境遇。而对于那些走进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中国人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中国人曾经固执地认为：“外部世界即为‘蛮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真的看见了来自外部世界的“蛮夷”，中国人把他们描述为：“鹰鼻、猫眼、红胡、灰毛长满全身，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发光，到了中午就睁不开眼睛，说话的声音像猴子叫，浑身发臭，吃东西用手抓，等等。”

西方舰炮轰开国门，中国人被迫接受外部世界。一个叫容闳的中国青年，第一个举起了海外留学的大旗

19世纪中叶，由于国门被西方的舰炮轰开，中国人开始被迫地接受外部世界。当这种被迫转变为对外部世界有了不再盲目自大的认识后，1872年，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促成了这个古老国家第一次派出留学生赴美学习。1847年，一个叫布朗的美国传教士因“身体虚弱”，辞去了澳门马礼逊中学校长的职务，准备偕夫人回国，他愿意带“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虽然大多数中国人对“野蛮人居住的地方”极其恐怖，但学生中竟有一名叫容闳的人，因想见世面而“惟愿与赴美”。容闳被布朗带入美国，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1855年学成回国。



曾国藩

因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容闳更念中国之国民身受无限痛苦”,认为要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只有让更多人能接受到“文明之教育”。

1868年,一直追随曾国藩创办洋务的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曾向曾国藩力荐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设备,以创建日后著



首批留美学生,詹天佑也在其中

名的江南制造局。因为容闳刚一得知丁日昌成为朝廷命官,立即向他陈述中国应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后来,丁日昌在其奏折中写道:“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但是,一个巡抚在满朝文武中毕竟人微言轻,更何况出国留学乃中国前所未有之举,因此丁日昌的建议在朝中无人响应。两年以后,天津发生了一起诱拐儿童事件,百姓相传是外国传教士将中国婴儿“剜眼掏心”,于是聚众冲进教堂杀死了几十名外国人。外国人也开枪打伤了天津百姓。“天津教案”引发了洋人对清廷的严厉威胁,清廷只有派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赴天津处理此事。容闳知道这是一个契机,他与丁日昌一起赶赴天津,向曾国藩和李鸿章再次提出了应当选派学生去西方学习。曾国藩和李鸿章一生都在不断面对洋人的嚣张气焰,因此他们知道先进的科技知识对改造落后之中国是多么必要。

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朝廷,言:“丁禹生(丁日昌,字禹生)中丞屡来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国自强。”曾国藩和李鸿章均为大清国举足轻重之臣,因此他们的恳请很快得到了同治皇帝的恩准。清廷为此特别制定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容闳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副监督。

中国聪颖子弟,在让西方人领略到东方人的智慧时,也让大清国不安。于是,一纸皇令,把他们从太平洋彼岸召回……

大清国要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了,这一事件立即在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有着几千年祖先训导的中国,把孩子送到遥远的‘蛮夷’去读书,这简直是一种本末倒置……‘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尽管朝廷声明为留学生出所需资金,但举国“体面”之人仍对此事鄙夷不屑。容闳无奈,只能去偏僻的广东、香港,说服那些低层的贫困人家,才最后凑足了30名学童。穷人送子出洋的动机是:与其让孩子在家缺吃少穿,不如给了管吃管住的朝廷。1872年8月12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上海登船启程赴美。这几十名学童梳着辫子,穿着朝廷“以数千金为之”的长袍马褂,去往大洋彼岸的异国开始了留学生活,他们全部安排在普通的美国人家。只是学习的日期没有明确规定,说是“学成回国”——“中国聪颖子弟,可兼尽西人之长矣。”但到底怎样才算是学成与兼尽?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一去竟达十年之久!这期间,除了这些留学生的父母和定期为他们提供银两,大部分中国

人都将他们遗忘了。

只有到了 1876 年,清廷一名叫李圭的海关官员赴美参加博览会回国后,才将留学生的情况向朝廷一一禀告:“其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所著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美国地土论》、《风俗记》……亦尚通顺。每篇后附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尝观其寓西人绅士家,颇得群居切磋之乐。”即使于千万人中“仍能言动自如,无畏怯态”。当被询问博览会有何益处时,竟答曰: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合各国交谊,益处甚大。李圭对此行不禁慨叹道:“他年期满学成,体用兼备,翊赞



李鸿章

国家,宏图丕烈,斯不贡圣朝作人之盛意也!”然而,1881年,大清国要求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立即中断学业回国的一纸命令到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清廷忽然发现这些中国孩子已经完全西方化。他们穿上洋人的衣服,把大清国的辫子剪了。更不像话的是,人人做了一条假辫子“以在中国官员接见时使用”。他们完全都说美国话,中国话反而说得不地道了,骂起大清国来比洋人更起劲。而且,他们的头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些学生拒绝向朝廷官员和孔子牌位行磕头之礼。人人开口闭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大清花费大笔银两,难道最终要培养出一群朝廷的敌人吗?

海外留学,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不是天朝中心,西方也并非外部的蛮夷。惟有取长补短,中国人才不受欺凌

大清国驻美公使陈兰彬与留学事务总办吴

嘉善上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教,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1881年7月,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在阔别家乡近10年后回国了。中国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知识的进程就这样中断了。但是,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和致力于洋务运动的官员开创的留学教育,无疑对改变封建中国因循守旧的现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19世纪末,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更是令中国已不可能停下迈向世界的脚步。1876年,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再派中国学子赴德学习陆军军事技能;1877年,1881年,1886年,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

楨联衔上书:三次派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学习海军军事技术。后来战死于黄海的大清国北洋舰队管带邓世昌、牺牲于威海卫陷落之日的大清国北洋海军副提督刘步蟾,以及于1912年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的著名思想家严复,都出于这些留学生中。至于中国官派的第一批留学生,其中梁敦彦成为民国外交部长,蔡绍基成为北洋大学校长,詹天佑则成为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当年詹天佑的父亲送子出洋时曾向朝廷画押:“兹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穿行在中国首都北郊苍翠山岭中的火车,依旧行驶在詹天佑设计和建造的铁轨之上,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成的第一条铁路。至此,因闭关锁国而故步自封了上千年的所有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不是天朝的“中心”,西方也不是外部的“蛮夷”,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真正兴旺发达。(责任编辑 刘家驹)

# 对《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的订正与补充

## ● 高 放

贵刊今年第3期刊载的《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有一处写得不对。原文这样说：“‘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其实“八大”党章第三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即是说，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隔五年代表实行换届选举，如同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这本来是“八大”对发展党内民主的一种制度创新。可惜这个新规定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八大”第二次会议没有在1957年按期召开。拖到1958年5月才举行。“八大”第三次会议再没有下文了。“九大”一直推迟到1969年4月才揭幕，这是严重破坏党章的“创举”。更有甚者，“九大”在极左路线干扰下，随意修改党章，改变了“八大”规定的年会制与常任制相结合的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的新制度。“九大”党章第八条规定：“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每隔五年才举行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做法一直保留至今。应该唤起全党共识，尽快恢复“八大”的制度创新。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还使我们得知：朱德、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在当选九届中央委员时得票率那么低（只有50%多），而普通工人代表王白旦却是唯一与毛主席一样得到百分之百全票者。这次异常的选举，揭开了一个长久未解的谜底，即当选的中央委员，除毛泽东、林彪排在最前面外，为什么破天荒的第一次一律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而不按得票多少次序排列？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也是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而在“九大”之前，我们党长期以来中委和候补中委一直是按得票多少次序排列的。我认为这个好传统也应该尽快全面恢复（从1982年“十二大”起我们只是恢复了候补中委按得票多少排列）。

## 关于王云五生平的一点补充

### ● 史济永

读《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出版界巨子王云五传奇》一文，使我想起先父史久芸逝世前向我谈及自己生平时提到的有关王云五的一些情况。

先父于1915年以“练习生”（即学徒）考入商务印书馆。他在王云五手下工作多年，可能因个人经历的相似（先父也是只读过几年私塾，靠工作中自学成才）和勤恳的工作态度而得到王云五的赏识和重用，两人私交亦较好。先父对王云五在文化事业方面的业绩甚为敬重，而对他后期离开商务到国民党政府为官颇感惋惜。据先父所知，王云五对共产党是同情的，对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很敬仰。共产党曾邀请王云五到解放区参观考察，王欣然同意且极为兴奋。原已订好机票准备动身（具体时间我已记

不清了），不料临行前夜突发高烧未能成行，以后一直没机会再去。先父以为如那次能成行必会加强王云五后来不去做官的决心。1946年蒋介石游说王云五出任经济部长，王一直未同意，但蒋在王并未答应的情况下即在各大报登出王云五上任的消息，逼他就范。王去南京后和我父亲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了，但先父记得王曾说过：发行金圆券并非他的主意，他只是奉命无奈行事而已。但此举却是他后来被列为战犯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当年的历史环境，这些事先父从不敢对别人说，在对我说时也告诫我不可与外人知道。我想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今天，后人对王云五的介绍和功过应该有一个全面和客观的评述。

# 经验的汲取

## 精神现象零拾之三

● 丁 聪  
陈 益 文 画



董卓表示了一点惊叹,王允就要杀他。有人为蔡邕说了两句话,意思是说,蔡有史才,又掌握许多史料,留下他,让他续成后史,也是一桩好事。现在为了一点小错杀他,不是太失人心了吗?不料王允回答道:“当初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作谤书流传于后世。今天不杀蔡邕,难道再让他写书来讥议我们吗?”于是,蔡邕终于丢掉了性命。王允以杀戮来统一思想,因此我们今天无法再看到蔡邕对汉代史实的评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复杂的精神现象,不能以简单的办法对待。一件史事,一段历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依据于各自掌握的不同史料以及不同的侧重点,并非只有一个结论,一种观点。就像一部《红楼梦》,犹如鲁迅所说,可以“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果再做补充,还有考据家看见曹氏家史,政治家看见四大家族,臆想家看到太极结构,等等,等等,何况当代人人经历的史事呢?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往往并不是当时就可以看清的,即便后世,许多事情如秦始皇的功过,争论了两千余年也不见得就能一致,又何必强求一致?允许不同的看法存在,给后人留下些检验、思考的余地,会更有益于经验的汲取,也会使后世的步伐走得更坚实一些。

世界是复杂的,反映复杂世界的精神现象也是复杂的。因此处理精神现象问题,不能简单、划一,要求完全的一致,禁止发表不同意见,如中国几千年只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只会导致精神之花的畸形与凋残。诗曰:

复杂问题复杂看,简单划一实堪叹。

千年不醒圣人梦,赢得东园百卉弹。

人类社会能不断前行,原因之一是在记取前人的教训。所以古人有“吃一堑,长一智”;“前车覆,后车诫”;“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一些聪明的谚语与箴言。中国重史,历朝历代修史不断,固然有颂功德、立贤传的意图,但以史为鉴,以正得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故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后,上表道:“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一部好的史书,如果不能给后人留下经验与教训,只一味歌功颂德,是不会有长久价值的,而因风转舵,反复编造史实以媚上,更适足遗讥于后人。

但精神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同样的历史事实,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司马迁的《史记》,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今天已为定评。但当初看法并不相同。有人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赞成他对历史实事的陈述与评价;也有人认为他违背了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思想没有与当权者完全一致,即所谓“是非颇异于圣人”,因而只是文辞可观,思想则过于“自由化”了;更有甚者,一笔抹煞,称之为“谤书”,甚至其人也该杀。东汉末年,司徒王允伙同吕布杀了董卓,同秉朝政(这事在《三国演义》里写得绘声绘色,那连环计的故事成了后世戏曲中传演不衰的剧目)。当王允掌权之时,蔡邕因为对杀

# 炎黄春秋

2003/6(总第135期)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执行主编:吴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郝爱存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电话:68522852 68534879 68532048

传真:68532569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e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